

2000

年

日中

關係發展史

著 李季

李季著

二千年中日關係發展史



第一冊

學用社發行

有 所 權 版

著 季 李

史 展 發 係 關 日 中 年 千 二

冊 一 第

角 九 幣 國 價 實



發 行 者 學 用 社 531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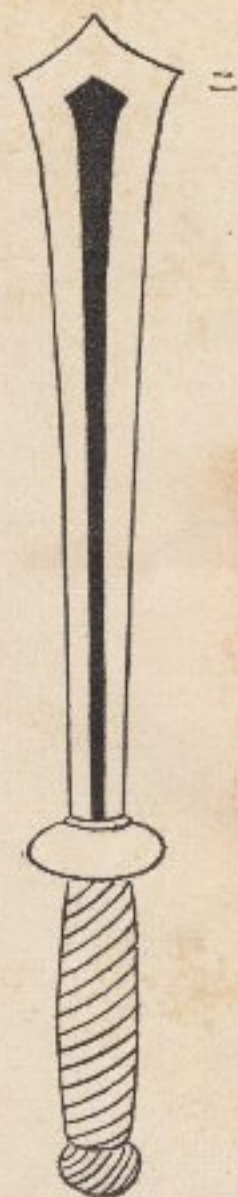
廣 西 柳 州 四 大 路

民 國 37.7.27

代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出 版

器神國傳的本日



一八咫鏡

二草薙劍

三八坂瓊曲玉



三



漢魏頒給日本國王的金印

二



一



三



漢委奴國王印 二

漢委奴國王印 一

魏親倭國王印 三

序言

八一三的大炮一轟，上海一般文化人的飯碗幾乎全被震破了，數年來以譯述爲生的我，自然不是例外。向來的生活打斷了，大時代的巨輪轉動了，我們怎樣參加呢？怎樣去從事『營務之急』呢？『投筆從戎』罷！這是中國書生的一句豪語，並且曾見諸實行，我倘若轉去二十年，的確要這樣幹，我的志向自然不在『立功異域，以取封侯』，而是要拿着槍桿子，跑上前線，痛痛快快地拚個你死我活，一洩胸中的悶氣！但現在已是中年人了，二十年來的著述生活把我的體力弄衰弱了，此時還要『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確打一個人不贏。

槍既不能拿，還是拿筆罷。筆上怎樣表見呢？當開戰初期，有許多人報上發表一種千篇一律的文章，說日本的根基怎樣淺薄，牠決不能持久，我們如能支持六

個月，牠一定會崩潰——當時的羣衆大都相信這種說法。我依常識判斷，知道決無此事。這種自欺欺人的宣傳雖可取快一時，但終于會使羣衆失望，並發生不信任的心理。此項工作我是不能夠做的。還有許多人在報上對日本人盡譏笑怒罵的能事，甚至於說他們原來都是小鬼，自有我國學生前去渡種，他們才漸漸高大起來，現在他們來打我們，無異兒子打老子。像這樣藉謾罵來洩憤的低級趣味的勾當，更是不屑爲的。

這樣看來，我雖是一個筆不停揮的人，然要在這一次大事變中來拿筆，也就有些幹不來。槍與筆兩種最重要的武器，我都無法運用，真有

揮筆揮刀無是處，

昂藏七尺愧平生！

之感。我既遭遇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事業，自然要積極地參加。但什麼是最有效的
方法呢？徬徨復徬徨，八月已過去！

大約是九月初的某一天，一位朋友忽然來找我，說有幾個同鄉擬研究中日問題，出版中英文的小冊子，要我加入。我當時回答道：「好是好的，不過我對於這一道是門外漢，又不懂日文，現在「臨渴掘井」，實在來不及！」但因爲參加的人還有兩位是舊相識，既承盛意相邀，也就不好拒絕，遂答應了。八九個人經過幾次集會之後，終於決定組織一個中日問題研究社，推我起草社章，旋經通過，並舉我爲編輯主任。我們的團體人數雖少，然就外國文字講，有懂日文的，有懂法文的，有懂德文的，並有精通英文的；就學科講，有研究社會科學的，有研究自然科學的，有研究文學的，有研究美術的，也有研究歷史的。如果分工合作，而又持之以恆，我相信總可以弄出相當的成績來。當時大家都很樂觀，很興奮，馬上開始分頭籌集款項，搜羅書籍，滿擬羣策羣力地努力幹一下，藉盡自己所能盡和所應盡的責任。

可是在這前方而兼後方的上海，生活的鐵鞭打在我們的身上，實在比飛機大炮

轟炸的威脅，直接而有力的多！歷時不久，所謂中日問題研究社的社員幾乎跑光了！我呢，對於生活的壓迫，本來是家常便飯，這裏如有最後的一口飯可吃，決不輕動。一因茫茫禹甸，無處安身，俯仰依人，素所深恥，動也沒有好處；二因我有大批的英德文書寄在南市，（後來都化爲灰燼！）有大批的線裝書放在身邊，牠們都是我二十年來辛苦得來和用慣了的工具，此時既無法運走，而又不能拋棄，否則就會減少我的工作效能，動也實在只有害處。於是決定鼓起我的硬勁來硬擋。生活雖被深深壓在水平線以下，但七挪八扯地過，也還不必鑽入難民收容所，去領略那擁擠不堪而又強迫閉惰的非人生活的滋味，總算是幸運的。因此，我的心中十分滿足，我的精神更加倍振奮。

「一不做，二不休，」是我向來做事的態度。我們的社雖已烟消雲散，僅剩我一個光桿，但光桿也自有光桿的幹法，我不獨未曾因此灰心短氣，反而愈加堅決地決定依賴自己的力量，獨自幹下去。于是一面搜羅關於中日問題的書籍，日夜翻

閱，一面也挨衣烏愛喔地學幾句日文。這樣在飛機大炮合奏的交響曲中，或其餘音
嫋嫋，縈迴腦際的時候，極緊張而又極嚴肅地幹了半年多，畢竟弄出一點頭緒；便
動手寫起來，現已草就六章，自成一個段落，特先付排，作為第一冊。

一年來看過的中日問題的書報也不少，心中發生許多感想，今特趁着做序言的
機會，寫出一二，就正于國人之前。

中日的摩擦，雖肇端于唐，宋，然要到明，清和民國，才日趨劇烈而頻繁。當
明清時，每逢中日多事之秋，輒能刺激一班文人學士，甚至于統兵大員，著作或編
纂關於日本，中日，中日鮮等問題的書籍。明代這一類的專著在三十種以上，（有
許多有目無書，恐已散失。）而以胡宗憲——本應為鄭若曾——的籌海圖編十三
卷，宋應昌的經略復國要編十四卷，鄭若曾的江南經略八卷為最著名。到了清季，
對於日本很有幾部巨著，如姚文棟的日本國志十卷，日本地理兵要十卷，日本海圖
一百五十餘幀，舟路圖說五十餘幀，傅雲龍的游歷日本圖經三十卷，黃遵憲的日本

國志四十卷，王先謙的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陳家麟的東槎聞見錄四卷是。其他如遊記，瑣識，短篇，或詩詞等，更不勝枚舉。

民國成立以來，中日的衝突雖層出不窮，但關於日本或中日問題的著作，真是少得可憐！直至九一八的前夕，才陸續出了一些書，不過比較值得提及的，也只有寥寥三數種。九一八和二二八以後，智識分子被飛機大炮驚醒了，情形便大不相同，研究日本或中日問題的報章論文，專門雜誌，小冊子，叢書，以及大部頭的著作，真如雨後春筍，蓬蓬勃勃地產生出來了。如日本研究會小冊叢書至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止已出至八十五種，王芸生輯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至民國二十三年五月止已出至第七卷，足以代表數量之多！

可是把我們對日本或中日問題的研究，和日本人對中國或中日問題的研究比較一下，無論何時，國人總不免有『小巫見大巫，神氣彈矣』之嘆！當四十二年前，黃遵憲很感慨地說：

「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國之事，纖悉皆知，而宋人視我國事，如隔十重雲霧。』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已足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論議也者，可不謂狹隘歟？」（見黃氏日本國志）

（續二頁）

然這還可以前清末葉，閉關自守的積習未除，國內青年對於日籍很少接觸的機會爲解。即黃遵憲所謂「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歷世紀載又不詳其事，安所憑藉以爲考證之資？」（見同書同頁）及十年前，戴季陶估計我國留日學生至少有十萬人的時候，情形並不見得好些，所以他更十分沉痛地說：

「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坊店裏去看，日本所做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地理，歷史，各種方面，分門別類的，

有幾千種。每一個月雜誌上所登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陸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長住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單是每年出版的叢書，每冊在五百頁以上，每部在十冊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著，也有百餘卷。「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裏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願意見，這真叫做「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了。（見戴季陶日本論二至三頁，民國十七年民智書局出版）

就是當三年前，我國留日學生的數目又已增加，而國人研究日本或中日問題正在極盛的時代，學者們仍舊非常悲觀，例如馮家昇說：

「總之，日人對於我國東北的研究，不論古今，不論那一科，無不有突飛

猛進的成績。返看我國，事事落後，又事事顛頂，真不禁令人長嘆息！按中日戰前有「朝鮮學」，朝鮮以滅；日俄戰前有「滿鮮學」，遼省以陷；「一九一八」以前有「滿蒙學」，四省以亡。今之日人又高唱所謂「東亞學」了，嗚呼！劍及履及，事至迫矣，請看明日之東亞，將爲誰家之天下？願我國人醒一醒吧！」（見禹貢五卷六期馮家昇日人對於我東北的研究近狀六頁）

我們的文化人，特別是我們的十幾萬留日學生不大爭氣，對於日本或中日問題研究得太少，對祖國不能作有力的貢獻，這當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許多年來，一般文化人多痛罵軍人槍口對內，自相殘殺，沒有作對外作戰的準備，這固然是對的；但如反躬自問，自己在文化方面又有什麼準備？像日本紀州名醫新宮涼庭所謂的「筆鋒扶破姦凶膽，勝鬪驕胡百萬兵！」（見大日本史講座第十七卷中山久四郎支那史籍上的日本史二〇〇頁，昭和十一年再版）

的著作，我們的著作界恐怕連影子也沒有！文武兩方對比起來，不還是半斤與八兩

麼？！

不過這個問題也是相當複雜的，現在專門來罵拿筆桿的人，不獨沒有用處，並且也不大公平。因為即就清末姚，傅，黃，王，諸人的著作講，雖不見得怎樣精密，然多是花費十幾年或幾年的工夫著成的，都有一讀的價值；可是無論中日問題鬧得多麼兇險，讀書界不讀這些書，圖書館也大都未曾收藏這些書。姚文棟的著作係光緒年間出版，時間並不長久，但我跑過上海許多圖書館，都沒有找到，再徧尋舊書店，仍舊撲個空，最後託友人去找他的令孫——即地理學家姚明輝——他的也因兵亂遺失了。本地人在本地刊佈的書，於短短的期間內消滅淨盡，這是讀者不需要的明證。普通讀者不用說，連二十幾年來，總抱着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一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的裝置起來，」（見日本論一至二頁）並於民國六年在民國日報

上登過一篇連載四十天的批評日本的文章，又於十七年刊佈日本論的戴季陶也自承「除了三十年前黃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國誌而外，我沒有看見有甚麼專

論日本的書籍。」（見同書一頁）

其實他不獨沒有看見姚傳王，陳四氏的著作，即黃公度的也未曾會過面，故把日本國志寫作日本國誌。連做日本論的人都不肯去找這一類的書讀一讀，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他們辛辛苦苦著了書，沒有人肯去讀，硬要他們學太史公一樣，「藏之名山，傳與其人，」也難乎其爲著作家了！

可是現在大時代已經到了，中日已經達到總結賬的時期了。我們的總賬如果還不開出來，所謂文化人實在是太不負責任，無論有何種口實，都不能解脫自己的罪戾！我是在這種意旨上，不願自己才力的薄弱，與生活的困苦，也不管一切工具的不完備，與材料的缺乏，毅然決然來擔負這種人所不願意幹的重任。我在軍事上雖已不能做一個前哨的小兵，但在思想上和學術上始終願作一個披荆斬棘的小卒。雖

則披荆斬棘是困難的工作，而小卒更不會有多大的成就，但沒有整千整萬的小卒執行初步的工作，永遠造不成一個大將的勝利與成功。況且拋軌可以引玉，我們爲什麼不盡自己的力量幹一下呢？

還有一層，我們如果知道日本人對於中國或中日問題的研究達到什麼程度，自己更應該起來幹，並且不能不幹。請聽我盡情一說。

我們在上面徵引黃，戴，馮三人的話一致推崇日人，貶責國人，這在鞭策國人自勵，警惕國人自強一點上，原是應該的，沒有可非難的地方。但國人如果老是一廂相傳的籠統的贊揚和貶責，而沒有進一步的精密分析與批評，獨立研究與創造，那不過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結果，在一方面會發生盲目崇拜他人的言行，在另一方面會呈出自餒以至自暴自棄的心理。倘若真正達到這種地步，便是在思想上和學術上向他人『屈膝』！

關於『屈膝』的問題，日本現在談得很起勁，牠已明白宣佈要中國『屈膝』，

所以我趁此機會，對這個問題要發揮幾句。大家應當注意：膝這個東西是一種大怪物：牠如果不肯屈，那無論遇着怎樣大的困難，始終不會屈，古人且不顧「爲五斗米折腰」，（見晉書九四卷陶潛傳一六頁）更談不到「屈膝」；但牠如果肯屈，那無論在什麼場所，便會視爲唯一無二的救命法寶，我們的習語中所謂「婢膝」，就是一個顯例。當南宋時，高宗將向金人「屈膝」，胡銓痛哭流涕地上疏抗爭道：

「此膝一屈，不可復伸！」（見宋史三七四卷胡銓傳二頁）

這確是一種殘酷的真理！全中國人應當記取的。我們的祖先早經指出「玉碎」「瓦全」的兩條路，就是屈膝與不屈膝的另一種說明。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膝頭看做蝦子，以爲能屈能伸，可以自由運用，指揮如意的。其實，依我的觀察，因爲先天與後天的培養不同，自然與社會的環境各別，膝頭遂分兩種：一種是硬如鐵，一種是軟如綿的；軟如綿的固然沒有法子使牠硬如鐵，但硬如鐵的一屈之後，便會變成軟如綿。（所謂「百鍊鋼化成繞指柔。」）所以胡銓有「此膝一屈，不可復伸」的痛

語。我現在也可以把前人兩句膾炙人口的話改掉兩個字，警告國人道：

一屈膝成千古恨，

再回頭已百年身！

至於日人要中國「屈膝」，我們是不是會遵命，演成史記上所謂「詘膝請和」（按詘同屈）的結局？這要看我們受過無數慘酷的教訓後，有沒有把自己的膝頭鍛鍊得更堅硬，能不能始終使牠挺直，做個頂天立地的硬漢，甯為玉碎，毋為瓦全？將來的事實自可證明，不必多說。不過就思想上和學術上看，有少數所謂領袖人物確有屈膝的傾向，而在日本通中尤為顯著，如研究日本文學三十年的人會向大家保證，世間沒有文化侵略這回事，儘可相信他人的文化，（詳情見後）而日本話比日本人說得還好的人竟以「恐日病」著名，這不是在思想和學術上向他人「屈膝」是什麼？！

這種傾向在現今的情勢之下，自然不發生多大的影響，不過牠一有更順利的機

會，即會發生牠的作用，顯出牠的威力。根本防禦的方法，是在思想上和學術上先整頓我們的陣容，鞏固我們的壁壘，使我們的智識青年知己知彼，不為他人的虛聲所恫嚇，而失去自信心，以致一見人，膝頭骨馬上就軟下來，搖搖欲拜了。

現在先來考察日本的發展。我們知道，日本的歷史比我們的少一半，牠的原始國家在漢魏時代才成立，牠的文字在東晉時代才假自我國，以後幾乎事事模仿我們，明初，日使瞎哩噠哈觀見時所吟的

『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見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四十卷日本部紀事之三）

是日本人自誇之處，也是他們最高的理想。後來他們固然也有獨立的發展，和特殊的文化，但就大體講，一直至七十年前——即至明治維新前——大都事事落在我們的後面；他們在各方面的雄飛猛進，只是最近半世紀的事。我們雖然欽佩他們的努力，足資取法，但在中國或中日問題的研究上，說句不客氣的話，一因根基淺薄，

肩背單寒，二因別有懷抱，無心深入，並沒有多大的成就。

記得日本某學者曾說，中國在二千年前就造了一道萬里長城，表示中國不要滿洲與蒙古，表示牠和牠們沒有關係。又如矢野仁一許多年來發表滿蒙藏非支那本土論，滿蒙非支那本來之領土，歷史上滿洲的支那主權無根據論，日本在滿蒙的正當地位等論文，以及本書第四章所提及的青柳南冥否定箕子的朝鮮是在現今朝鮮半島的議論，都是別有作用，各爲其國的「特別研究」，暫時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列。卽就一班比較持科學態度的學者而論，他們對於與現實無關或很少關係的中國古史上的倭奴問題，卑彌呼問題，邪馬臺問題等等，討論了幾百年或二千年以上，何曾有什麼滿意的解決？

總說一句，我們不要把量與質混爲一談，以爲量的多就等於質的美！「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這只有舊式的日本士夫是如此，（恰和從前的英法德學者懂拉丁文一樣）雖屬佳事，但我們也沒有聽見他們對於中國書和中國事

曾有何種了不得的新發見。每年出版關於中國的叢書，「每冊在五百頁以上，每部在十冊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著，也有百餘卷，」這自然表見日本人的努力，但此等作品多係片斷的東西，或個別的研究，很少達到綜合的。至於所謂「朝鮮學」，「滿鮮學」，「滿蒙學」，「東亞學」，大都是「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也！」這是武力的理論化；而「朝鮮以滅」，「遼省以陷」，「四省以亡」，仍舊是武力的結果，並非什麼學什麼學的產兒，換句話來說，並非如德國一個大社會學者所說的「學說一入羣衆中，便會變成物質的勢力」那樣的東西。所以日本人對中國或中日問題的學理，並不是怎樣高明而忠實的真理，令我們只有五體投地，無話可說的。

現在試以日本一部談中日問題的著名的綜合著作爲例，誠如譯者所說：

「卽以日本史料而論，古代史籍，只存片斷，近人研究，又多限於一題；

其能綜合二千年之史實，作有系統的敘述者，亦惟木宮秦彥之中日交通史最稱

完善。」（見陳捷譯的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萬有文庫本第一冊譯者序一頁）

所謂『最稱完善』，自然是就日文這一類著作中比較說的，自我們看來，這部巨著雖值得一讀，但距真正的『完善』二字尚遠。據譯者說，全書共有四十萬字，然書中起首談倭國與漢魏之交通一章不滿四千字，把我們史籍上好些重要的材料都遺落了，（如魏正始元年『東倭重譯納貢，』司馬師作相，倭使『又數至』之類。）即對於倭國與漢魏交通的原因，及其發展的跡象，也未曾指明出來，只把許多事實平鋪直敘地羅列着，就算了事。又一項第一段對於漢武帝在朝鮮所置真番郡的位置，解釋錯誤，二項第二段對於魏明帝景初二年倭女王遣使奉獻一事，『二』為『三』之誤，也不能根據史實改正過來。並且倭國和倭面土國明明各為一個國名，竟被解作倭之奴國和倭之面土國，變成二二得四了！至於誤解我國漢書和魏志上所謂倭人是指『北九州之住民』，輕斥後漢書關於倭人通漢的記述為『無價值之可言』，猶其餘事。

我這段批評並不是挾着什麼仇恨或競爭的心理，要想毀滅木宮秦彥的著作，和周作人說「在中國比較常有的」態度一樣：「把腳盆裏的孩子，連水一起潑了去，」這就是說：「因為憎惡暴力的關係，翻過來打倒一切，以為日本無文化。」（見日本管窺二十和十九頁，民國二五年宇宙風社出版）中日交通史確是一部取材比較豐富和態度比較公正的書，我在拙著中駁斥牠的地方固多，但徵引牠的地方也不少，我並不完全否定牠的價值。這裏取出其中起首描寫中日交通的一章來批評，用意只在指明日本學者也是人，並不是超人，因此，就是他們內中「最稱全善」的著作，也免不了錯誤百出的毛病。我們不要震於他們學術的發達，著作的豐富，便盲目崇拜，顯出「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的樣子來。

在另一方面，還有一點是急待討論的。周作人以一種十分冷酷的態度告訴人們說：

「近時有些時髦的呼聲，如文化侵略或文化漢奸等，不過據我看來，文化

在這種關係上也是有點無能爲力的。」（見日本管窺一七至一八頁）

的確，自他看來，一國或一民族的文化總是好的，不過牠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不一定靠得住，所以他說：「一個民族的代表可以有兩種，一是政治軍事方面的所謂英雄，一是藝術學方面的賢哲。此二者原來都是人生活動的一面，但趨向並不同，有時常至背馳。」（見同書二〇至二二頁）「故文化的高明與現實的粗惡，常不一致。……今若任人領略高等文化之美，即將使其對於醜惡愚劣的設施，感到嫌惡，故如以真的文化傳播作專制或侵略的先鋒，恰是南轅而北其轍，對於外國之「文化事業」所以實是可爲而不可爲，此種事業往往有名無實，亦正非無故耳。」（見同書一八至一九頁）

周作人這一類的說法，在某種保留的條件之下，也未嘗沒有一面的真理，不過他竟出以全稱肯定的口吻，那簡直是胡說八道！政治和軍事上既有侵略，文化上也同樣有侵略，並且如果做得巧妙的話，絕對沒有政治上軍事上那種「醜惡愚劣的設

施」，可以使人們心悅誠服地接受，不「感到嫌惡」。這一點凡稍有常識的人都懂得，用不着多所說明。就是周作人的下意識又何嘗沒有感覺到？所以他於不知不覺之間，對於文化加上一個形容詞，叫做「高等文化」，「真的文化」，可見除此以外，也還有低等文化，偽的文化，而「文化侵略或文化漢奸等」呼聲，正自有其立論的根據，不得因自己不喜「時髦」，便加以否定。周作人最後也許要說，即真有此事，識貨的人自然不會上當。我們的回答是：研究日本文學三十年的高等華人周作人或者懂得（？）那些是「高等文化」，那些是低等文化，那些是「真的文化」，那些是偽的文化，至於普通的讀者除掉極端顯明的外，是難於識別，容易受騙的。周作人以為世間沒有文化侵略這件事，我們不妨舉一二例子給他看。

所謂文化侵略是什麼？簡單說一句，就是從侵略者的立場所傳播的有利于自己的意識。牠的範圍十分廣大，凡言語，文字和圖畫等等都是牠的工具，而學說或理論為其中主要的一種。例如後漢書載光武時，「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

綏。』（見同書一一五卷六頁）而『漢委奴國王』的金印也於乾隆年間在筑前出土，所謂委奴，明明是一個國名，絲毫沒有疑義。但日本學者們以為日本古代一個大國（也有認為即現今『萬世一系』的皇室所建立的國家的）向中國納貢，未免丟臉，所以由三宅米吉用大氣力去『考證』，說是應讀為『漢之委（倭）之奴之國』，這就是說，委奴是兩個國名，向中國納貢的不是倭國，而是倭國所屬的一個小國——即奴國。木宮泰彥並且宣佈『此說今已為學界之定說。』（詳情見本書第六章二項第一目）此說傳播到中國來，已經有人毫不遲疑加以接受的。（參看日本研究一卷一號陳樂素魏志倭人傳研究十九頁）

又如箕子因武王克殷，避往朝鮮，因以立國，這是我們的古籍上記載得十分明白的事。但日本學者們以為中國這樣早就在現今的朝鮮半島立定腳跟，實在可惡，便由青柳南冥根據我們的史記，前漢書，後漢書，魏略，魏志，和晉書等等去『考證』，證據不足，他就實行偽造，把前漢書地理志遼東郡險瀆縣下懸劭注的『朝鮮

王滿都也」一語改作「朝鮮王舊都也」。於是宣佈箕子的都城在現今的遼西郡，箕子的朝鮮與現今的朝鮮半島不發生關係。（詳情見本書第四章二項第四目甲）這種說法傳播到中國來，似乎也已經發生了影響，因為有人不宣佈理由，硬說箕子的朝鮮「必不在今朝鮮境」，而在現今的遼東。（參看本書第四章二項第四目乙）

像這樣爲着本國的方便而矯揉造作的學說，向我們傳播，就是文化侵略，我們倘於不知不覺之間，接受這種學說，就是被侵略。知道有文化侵略，而鄙視爲低等文化或偽的文化，「卑卑不足道也」，不惟不予以揭穿，反而向大家宣佈，請放心，沒有文化侵略，這就是文化漢奸。做過二十多年大學教授的周作人真正不懂得這些麼？不見得罷！

現在再回轉去講日本學者的著作。我們曾稱所謂「朝鮮學」，「滿鮮學」，「滿蒙學」，「東亞學」是「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也！」這自然因其別有作用，多非真理，含有幾分輕蔑的意味，但絕不能用一種消極的態度去對付牠，和周大教

授一樣，以爲僞的文化根本沒有價值，我不曉牠，『如以真的文化傳播作專制或侵略的先鋒，恰是南轅而北其轍』！我們應當知道，問題並不是這樣簡單的：真的中間雜有僞的，僞的中間也含有真的，真僞夾雜，使人難於辨別，一經和牠接觸，就會於不知不覺之間，大上其當！總之，自己不動手，任聽人家幹，只於坐在『寒齋吃苦茶』之後，向大家保證沒有『文化侵略』，『文化在這種關係上也是有點無能爲力的，』或一味悲觀嘆氣，自怨自艾，都是有害無益的，最重要的是自己起來幹！

尤其關於中日間的事件，既涉及雙方，這筆賬便應由雙方各開一分，不能任聽一方開，更不要把對方所開的賬目翻譯過來，加以籠統的贊揚，即心滿意足。因爲雙方的利害既不一致，難免不存私心，尤其在一方開賬，一方不開賬的時候，最容易予這種私心以發洩的機會。因此，日本學者們所開的賬總有些靠不住；即使是比較忠實的，也有漏賬，如木宮泰彥的例子是；如果不忠實的話，那簡直會造僞賬，

如青柳南冥的例子是！

這樣看來，我們自己應該動手幹，我們實在不能不幹！沒有思想和學術上的自由獨立，得不到民族與國家的自由獨立，這是一個最重要之點！

我的話也許說得太長，展開得太遠，現在應當總結起來說，我們對於中日的服應該共同努力來開一分，並且應該從頭開起。在古代我們是貸方，日本是借方，尤應特別注重這筆舊賬，因為日本完全是由此發跡的。不幸我們的著作家大部頭的著作都集中在現代，尤其集中在最近六十年，（如王芸生七大卷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是）或四十年，（如吳兆名四十萬字的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是）至多也只回轉去談明代的倭寇，（如柳詒徵江蘇明代倭寇事輯是）至關於古代的，除雜誌上的短篇或小冊子外，簡直沒有見過。（稽嘉音的兩大冊中日歷代戰史雖早於民國十九年出版，並且是從古代講起，但只是雜亂無章的材料，與幼稚可笑的議論的集合體，不足以言著作。）現代的中國人當然應懂得現代的中日關係。不過現代的中日關係是

由古代的中日關係中發展出來的，如果不知道古代的中日關係，便不能真正了解現代的中日關係。所以我們的工作應當首先尋源，並不是真正僅爲着貸方的緣故，才從頭幹起的。

上面的說法足以充分表現我爲什麼要研究中日問題，爲什麼要著二千年中日關係發展史。本書在名義上雖是講兩國二千年來相互關係的事實，但在實際上則追溯得更遠，也正是爲着尋源的緣故。

還有一層，單是這樣直系式地尋源，仍舊不夠，還須作傍系式地搜索。我們如果要想徹底了解中日關係，必須知道日本民族組織的成分，及其國家的起源，朝鮮民族組成的成分及其歷代興亡的大略。此外，我們有時可以從一個名稱的出現及其變遷，看出許多重要的史實，在這種場所，也自然不能輕輕放過，總說一句，本書的一，二，三，四章都是在這種意旨上草成的。

可是一，二，三，四章多係一種爭辯之作，即五，六章也稍微帶了這樣一種性

質。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就其中最重要的講，至少有下列三點：

第一，古代事遠年湮，傳說無定，於是引起種種解釋，各持一說，莫衷一是；我們要想得到一種適當的解決，不能不予以辨別。

第二，日本學者對於古代日本與漢魏的交通，有極多的考證，但大都很少滿意的結論；我們對於其中比較重要的問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故酌量重新提出來加以討論。

第三，日本學者常爲着自己民族或國家的利益，不惜矯揉造作地形成種種曲說，以爲本國佔取地步的張本，如日韓同種說就是一個顯例。我國的學者大概是因爲受了刺激太多和太劇烈的緣故，近幾年來也呈出這種傾向，如所謂殷鮮同種說，即其見端。一班主張這種學說的人在主觀上也許真有所見而云然，但在客觀上，因爲證據不健全，表現好像另有作用。我們是以真理爲依歸，絕對不主張造僞賬，凡遇有不正確的地方，便盡情加以指摘，一則因其與國內讀者接觸的機會最多，足以

發生不良的影響，二則因其爲本國學者的學說，本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不能隨便放過。然爭辯的文字更因此加多了。

講到爭辯的文字，我國至今還有人反對，以爲是擾亂了學術界的『安甯秩序』。但我們認許多複雜的問題非經過一番爭辯，是不容易明瞭的，所以常不得不這樣做。總之，種種歪曲事實的學說是我們前進途中的荆棘，而披荆斬棘正是我們的主要任務之一。我們不是爲着爭辯的緣故而爭辯，是爲着真理的緣故而爭辯，論我們的本心，真可以和孟子異口同聲地說：『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

末了，還有兩點須在這裏說幾句。第一，本書所涉的範圍異常廣大，所需的中文參考書非常之多，雖經友人的幫忙，各圖書館的協助，和我自己向各新舊書店的搜尋，羅致了大部分必要的材料，但仍有一小部分無從取得。不獨原來用中文著成的好些日本古籍及朝鮮古籍，想盡千方百計，借不到，買不到，就是國內新舊出版的書報，甚至於極普通的書報，也是如此。此項困難情形使我的工作進行受了相

當的影響：有時對於所引用的材料只能以間接的來源為滿足，有時對於本應徵用或參考的書籍，只聞其名，不能一觀其內容。這不是我圖方便，或不願慎重其事，實在是為當前的局勢所限，沒有辦法的。不過這種缺陷將來總有機會予以彌補。

第二，我們組織一個中日問題研究社，原擬出版各種中英文的書籍，因為關於中日關係的真相，國內人士固然常欠明瞭，而國際人士更是十分隔膜，否則即為日人偏面的宣傳所盪惑，（他們將英文出版的中日問題的書報大批地並經常地向國際方面輸送！）對我們先抱一種成見，不表同情。此外，英美人所著中日問題的書本來不多，關於古代的尤少，並且因為語言文字上的困難，不容易取得必要的材料，偵知個中的真相。所以我們不獨對於國內讀者應當供給這一類的讀物，即對於國際的讀者也應當供給同樣的讀物。因此，我的工作情形如果許可的話，我打算於短時期內親自將本書譯成英文，在國內或國外出版，使牠得與國際人士相見。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李季序於廣州

序
言

三〇

目次

序言

緒論

第一章 歷代對於日本的稱呼

(一) 名稱的重要

(二) 東夷——說文的夷字——甲文的夷字——漢族對東夷的印象——舊東

夷與新東夷

(三) 九夷——海內九夷與海外九夷——吠夷等九種——玄菟等九種

(四) 烏夷——胡渭的解釋——楊守敬的解釋

(五) 日下——郝懿行的解釋——唐玄宗和藤原朝臣字合的使用——假借

的例子……………一三

(六) 倭或倭奴……………一六

(1) 倭的名稱的出現——對於倭字出現於後漢的批評——董毅的論

斷——燕對朝鮮的經濟和政治勢力與對日本的影響……………一六

(2) 倭的名稱的由來……………二一

(甲) 日本學者對於本問題的提出……………二一

(乙) 對於內藤虎次郎和稻葉君山所主張的倭面土與倭奴音譯

的批評……………二二

(丙) 倭奴爲アイヌ音譯的直接和間接證據……………二七

(丁) 中日學者對於倭奴音譯理解的不同……………三二

(3) 日本古代的國號——諸神所命的名稱——雷同的名稱……………三五

(4) 倭奴含義的擴大並對於日本學者所持異議的批評……………三七

(甲)	史籍上的證據	三七
(乙)	木宮泰彥和西村翼次的異議	三八
(丙)	批評	三九
(七)	倭改稱日本的原因——新舊唐書的說明——二千六百年史的解釋 ——大百科事典的紀載	四二
(八)	倭在應用上意義的改變	四五
(九)	其他常見與罕見的名稱——牠們所表現的意義	四六
第二章 日本民族的成分與日本國家的起源		
(一)	問題的困難	五五
(二)	三五十萬年前的日本	五六
(三)	中國史籍與日本人種——古代史籍的失載——現代史籍的謬誤	五七
(四)	東西洋學者對於日本人種的學說	五九

- (1) 吳太伯後裔說……………五九
- (2) 通古斯族構成日本基本人種說……………六〇
- (甲) 構成日本民族的各族一瞥……………六〇
- (乙) 通古斯族來到日本的時期及其三次登陸的地點……………六二
- (丙) 骨子裏的問題……………六三
- (3) 三個類型說……………六五
- (4) 相近的三說……………六八
- (5) 混血的日本民族中的漢族……………七一
- (五) 日本民族的特長……………七四
- (六) 「神國」及其起源……………七六
- (七) 日本國家成立的時期問題……………七九
- (1) 界線確定的困難……………七九

(2)	各種不同的學說·····	八〇
(3)	神武紀元問題·····	八二
(4)	自神武至開化九個天皇是否存在的問題·····	八四
(5)	崇神的建國及其年代·····	八五
(甲)	國家成立的特徵·····	八五
(乙)	年代的研究·····	八七
(八)	漢代交通對日本建國的影響·····	九〇
(九)	野蠻與文明的界線·····	九二
第三章 朝鮮半島與中日關係上		
(一)	朝鮮在中日關係中所佔的重要位置·····	九五
(二)	朝鮮人種之謎·····	九七
(三)	日本學者的日韓同種說·····	九八

- (四) 中國學者的殷鮮同種說……………九九
- (1) 殷起東北與箕子據朝鮮的因果……………九九
- (2) 殷與朝鮮統治階級的關係……………一〇一
- (3) 附和的說法與另一主張……………一〇二
- (4) 批評……………一〇三
- (甲) 商起西方的證據……………一〇三
- (乙) 亳的地望問題……………一〇五
- (丙) 『海外有載』的海的問題……………一〇七
- (丁) 箕子在朝鮮的『原有根基』是什麼？……………一〇八
- (戊) 北燕朝鮮的方言區與髮飾之別……………一一〇
- (己) 沙鍋屯居民與朝鮮居民的關係……………一一二
- (庚) 殷商神話與夫餘神話的關係……………一一二

(辛)	結論	一一五
(五)	試解朝鮮人種之謎	一一六
(1)	殷與東夷的問題	一一六
(甲)	殷屬東夷的主張及其駁議	一一六
(乙)	周出於西戎的學說及其批評	一一一
(丙)	結論	一二五
(2)	貉爲東夷中的重要種族	一三〇
(3)	貉爲朝鮮的土著	一三二
(4)	東夷的種屬問題	一三六
(5)	朝鮮民族體質上的特點	一四〇
第四章 朝鮮半島與中日關係下		
(一)	檀君的朝鮮	一四三

- (二) 箕子的朝鮮……………一四四
- (1) 箕子能往朝鮮的前因……………一四四
- (2) 箕子往朝鮮是否集團的行動？……………一四六
- (3) 箕子到朝鮮後的設施及其影響……………一四九
- (4) 箕子的都城及其國土所在的問題……………一五一
- (甲) 日本學者的議論……………一五一
- (乙) 中國學者的議論……………一五七
- (丙) 結論……………一五九
- (5) 箕子的後裔……………一六三
- (三) 衛滿的朝鮮……………一六六
- (四) 漢魏郡縣的朝鮮……………一六八
- (1) 漢武帝經營朝鮮的遠因與近因……………一六八

- (2) 武帝經營朝鮮的意義……………一七〇
- (3) 四郡的位置及其合併……………一七二
- (4) 公孫氏的割據遼東與對朝鮮的新建置……………一七五
- (5) 魏明帝的收復朝鮮與毋丘儉的平高句麗……………一七七
- (五) 五胡亂華時代的朝鮮——慕容氏的進攻……………一七八
- (六) 高句麗……………一八〇
- (七) 三韓……………一八四
- (八) 百濟……………一八五
- (九) 新羅……………一八六
- (十) 高麗……………一八七
- (十一) 朝鮮……………一八八
- (十二) 任那與日本……………一九〇

- (十三) 新羅與日本……………一九二
- (十四) 百濟與日本……………一九三
- (十五) 高句麗與日本……………一九五
- (十六) 渤海與日本……………一九六
- (十七) 高麗與日本……………一九八
- (十八) 朝鮮與日本……………二〇一
- (十九) 大韓與日本……………二〇五

第五章 秦以前的中日關係

- (一) 中籍所紀有史以後最初的接觸……………二〇九

- (二) 徐福東渡的問題……………二一一

- (1) 中國方面……………二一一

- (甲) 史籍的記載……………二一一

(乙) 文人的吟咏……………二一八

(丙) 學者的議論……………二二一

(2) 日本方面……………二二三

(甲) 史籍的記載……………二二三

(乙) 學者的議論……………二二五

(3) 結論……………二二七

第六章 漢魏西晉時代的中日交通

(一) 前漢時的交通……………二三五

(1) 關於私人的……………二三五

(2) 關於國家的……………二三六

(甲) 前漢書的記載……………二三七

(乙) 後漢書與魏志的記載……………二四一

- (3) 日本出土銅器的證明……………二四四
- (二) 後漢時的交通……………二四六
- (1) 光武朝倭奴國的奉貢與受封……………二四六
- (2) 安帝朝倭國獻生口……………二五三
- (三) 魏時的交通……………二五六
- (1) 明帝朝倭女王國遣使朝獻……………二五六
- (甲) 朝獻年分與朝代的問題……………二五七
- (乙) 卑彌呼爲何人？……………二五九
- (丙) 封爵與賜物……………二六一
- (2) 廢帝朝魏倭使節的往來……………二六一
- (甲) 東倭重譯納貢……………二六二
- (乙) 帶方使者兩次赴倭……………二六七

- (丙) 倭新舊女王的謝恩與兩次奉獻……………二六九
- (四) 西晉時的交通……………二七一
- (1) 武帝朝倭人來貢方物……………二七一
- (2) 倭人曾否參加晉書所謂東夷諸國朝獻的問題……………二七五
- (五) 倭人朝獻的原因……………二八二
- (1) 一般的……………二八二
- (2) 特別的……………二八五
- (甲) 關於中國方面的……………二八五
- (乙) 關於倭國方面的……………二八七
- (六) 倭人在各方面發展狀況的一斑……………二八九
- (1) 一般的狀況……………二八九
- (2) 農工業初步的興盛……………二九〇

(3)	漁業的發達·····	二九二
(4)	商業的進展·····	二九三
(5)	治亂相尋的政局·····	二九四
(6)	等級森嚴的社會·····	二九七
(7)	對朝鮮半島南端的經營·····	二九八
(8)	中國文化的影響·····	二九九
(七)	結論·····	三〇一

緒論

「國于天地，必有與立。」這雖是二千年前的一句老話，但至今仍不失爲一種相對的真理。就亞洲而論，中華有四千六百年的歷史，開化最早，然日本也有二千年的歷史，可算是一個後起的與國。並且密邇比鄰，同文同種，雙方的關係不獨在海禁大開的現代最爲綜錯複雜，卽在閉關自守的古代，也跟着航海術的發展而日趨密切。孫武說得對：「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在全面抗戰的今日，將二千年來中日關係史的發展敘述出來，以供國內外人士的參考，也許不是一樁徒勞無功的事。

所謂中日關係，自然包括許多方面：舉凡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軍事的等等都在其內。總說一句：雙方的關係無論爲公爲私，爲多數人或少數人，爲局部或全部，只要對於任何一國的當時或前途具有相當的意義，深遠的影響，本書當或詳

或略地予以描寫，藉以闡明其間發展的跡象；至于兩國在各方面的發展狀況，當必要時，也將隨時隨地加以敘述或對比，使此項描寫不致成爲乾燥無味的死材料的堆積，而雙方關係的表現得以益增顯明。

第一章 歷代對於日本的稱呼

(一) 名稱的重要

古語說：『名者實之賓也。』這句話在許多場所確是如此。所以儒家最重正名，以爲『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對於凡百事物必予以適當的名稱，而史家大都爲碩學宏儒，自然也同樣注重正名。我們描寫二千年來的中日關係，先從名稱講起，用意雖不在乎『正名』，却要說明歷代對於日本的稱呼，以便表現其命名的由來，以及各種名稱在沿革中所含的意義。至于名的正與不正，言的順與不順，須着眼於當時的『實』，這就是說，須從當時歷史的背景去加以考察，固不能用現代的眼光，作爲評判的標準，這是人們應當注意的。

(二) 東夷——說文的夷字——甲文的夷字——漢族對東夷的印象——

舊東夷與新東夷

麥多克 (James Murdock) 以爲當紀元前後三四世紀的時候，

『中國……對於四裔的關係，在許多方面，和羅馬帝國對於日耳曼與不列顛的野蠻人及北方人民的關係，大概相似。』（見麥多克日本史第一卷三十一頁，一九一〇年東京出版——*A History of Japan*）

其實何止這個時代，遠在紀元前一千多年已是如此，我們的祖先于相形之下，對於四裔不免懷一種輕視的心理，不過其中也大有分別，首先便從名稱中表現出來了。

禮記王制篇說：

「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見禮記

注疏第十二卷三〇頁）

這就是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統稱爲四夷。（這自然只是就大體講的，其實夷或蠻，四方都有。參看崔東壁《通書第八冊豐鎬考信別錄七至九頁，亞東圖書館出版）在夷或蠻中，我們的祖先比較看得起第一種人，所以許慎說：

「夷，平也，從大從弓，東方之人也。」（見四部叢刊初編許氏說文解字十下二百）

段玉裁在他的說文解字注大部更加以發揮道：

「羊部曰：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西南夷人焦僥從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惟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按天大，地大，人亦大，大象人形，而夷篆從大，則與夏不殊，夏者中國之人也；從弓者肅慎氏貢楛矢石箘之類也。」（見段氏說文解字注十篇下七頁）

這種說法曾引起種種反對的議論，以爲「夷蓋從尸」，或「夷當從一弟」，而

『肅慎氏貢楛矢石磐之類』，係『強爲牽合』。（見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十下大部四五六九和四五六八頁）其實雙方的解釋都不對。夷字固然不是『從大從弓』，也不是『從尸』，或『從一弟』，而是從弓從矢。怎樣見得呢？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新獲卜辭寫本所載第一百五十片中的夷字（見一四五頁）爲𠄎。此字的左邊爲弓，右邊爲矢，而東夷以精製弓矢見稱，故卽以其特長代表其人，原無褒貶的意思存于其間。（如『小水緇出好弓，所謂『緇弓』是也。』——見後漢書一一五卷三頁）但話雖這樣說，我國向來對於東夷有些另眼相看，却是事實，如前漢書說：

『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見同書二八卷下地理志一四頁）

後漢書也說：

『夷者祗也，言仁而好生，萬物祗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

（見同書一一五卷東夷傳一頁）

然東夷這個名詞是統指古代海內外蒙昧人和野蠻人講的。八木獎三郎以爲

『夏，殷，周三代所謂東夷，乃自今山東省蔓延江蘇省海濱之野人，此可稱爲舊東夷。秦漢以後，以滿鮮等包括日本之一邊，可呼之曰新東夷。』（見禹貢半月刊四卷二期張傳瑞譯的八木榮三郎環居渤海灣之古代民族四六頁）

查殷周以來，自山東至江蘇沿海一帶的東夷所餘無幾，僅有萊夷，淮夷，徐夷等數種，當時所謂東夷，主要的已經是海外的，而不是海內的了。觀于殷周之際，箕子走朝鮮，『成王既伐東夷，息慎「按即肅慎」來賀，』（見史記四卷周本紀七頁）可以知道當時和以前（參看第三章第五項）就與這種『新東夷』有往來，他們並非『秦漢以後』才出現的。

（三）九夷——海內九夷與海外九夷——吠夷等九種

——玄菟等九種——

現在要問這樣的東夷到底有多少種？周禮說：

『四夷八蠻。』（見周禮注疏三三卷十頁）

爾雅說：

『九夷八狄。』（見爾雅注疏第六卷十一頁）

先儒對於這樣不同的數字議論紛紛，莫明所以，甚至於認

『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見古今圖書

集成邊裔典第一卷二頁）

在另一方面，現在却有人主張九夷不過『一而已』，例如姜亮夫說：

『九夷非有九種，（少于九種多于九種也）九也當是種族之名，向非數

名。』（見民族雜誌一卷十二期姜亮夫夏殷民族考二一〇七頁）

我們對於雙方的說法都不表贊同。因為所謂四夷九夷，不是表示種類的逐漸增多，就是在某一場所數目的增減，決不是『但言其非一而已』。至于夷人有時『少于九種或多于九種』，固是事實，但在某一時期恰為九種，更有可能，並且自九夷

這個名詞成立之後，數目卽有增減，而名稱仍沿用不變，也有可能。如認九夷爲「種族之名」，則常與之連在一起說的「八狄，七戎，六蠻」，也當各爲一「種族之名，向非數名」，然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可見「九夷」也當同樣是「數名」，不過我們可以斷定牠的起源是在海內的夷人，而不在海外的夷人中。現在再回轉去說，所謂「四夷」，究指那幾種人，無從查考。（周禮注疏三三卷十一頁的注釋對於四夷有兩說：一、「四夷，四方夷狄也。」二、「四夷，卽爲東夷也。」自以後說爲是，但無個別的名稱。）不過關於「九夷」却有海內與海外的區別。

韓非子說：

「周公旦……攻九夷而商蓋服矣。」（見百子全書韓非子七卷說林上九至十頁）

這就是指淮夷，其中當係分作九支，故稱九夷。又戰國策說：

「楚苞九夷，又方千里。」（見同書秦策五六頁，羣學社出版）

這還是上面所說的九夷，他們的所在地是在淮泗二水之間。

像這樣的九夷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之內，我們的對象是魏書所謂「九夷之國，世居海外」（見同書一〇〇卷百濟傳三頁）的九夷。關於這種九夷復有兩說：

一、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見後漢書一一五卷東夷傳一頁）

二、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驪，四、滿飾，五、晁夷，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見爾雅疏第七卷九頁）

第一說出自竹書紀年所記夏代的夷人，周所以爲「九夷，東夷也，有吠，于，方，黃，白，赤，玄，風，陽九種，箕子之封國，俗仁而壽，……即今朝鮮。」（見湖北先正遺書名義考五卷一六頁）然據朝鮮史籍所載，這些夷人所住的地方不限于現今的朝鮮，並沿及東北一帶，這自然較合實情，例如一部高麗文的史書說：

「小海（今黑龍江北邊）以南和瀛洲（今濟州）海以北的土地肥沃，最初

有黃夷，白夷，赤夷，玄夷，藍夷（一名風夷），陽夷，于夷，方夷，吠夷，九夷散居其間，以草爲衣，以果實爲食，夏則構巢以居，冬則營穴以處。後伏羲氏出，畫八卦，倡文化，遂有遷居于中國而從事倣效的，然留在本地的種族風俗愚昧，強者常奪弱者的巢穴，故無寧日。」（見金承學神檀民史一卷一頁，開天四千三百八十年，上海三一印書館出版）

這種說法如有幾分可信，則所謂黃夷等等還在石器時代，度一種蒙昧人的生活，當遠在箕子封國之前，談不到「俗仁」上去。然這不過是第三章的伏筆，我們現在注重的仍在第二說。

第二說所說的九夷，均有確定的地點或種族名，當較第一說更爲可靠。無論如何，兩相比較，所謂九夷已經因時代的不同，而內容大有區別：第一說所指，沒有日本，而第二說則包括日本。時代愈後，中國人心目中的海外九夷的確有日本在內。例如春秋時，孔子因「道不行」，常「欲居九夷」，有人以爲係淮泗之間的

九夷，其實這是天大的錯誤，沒有顧到：

一、孔子所說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見論語注疏五卷三頁）

二、孔子的身世。他的祖先宋人係殷王室的後裔，他是「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那種預言式的傳說中殷室的復興者和光大者，（殷族和他自己都有這種期望）到了晚年，此事在中國絕無實現的可能，所以他于感慨之餘，要和箕子去朝鮮一樣，向海外發展。

我們如果懂得這種事實，便知道孔子的目的地不是朝鮮，就是日本。日本史學界的泰斗重野安繹曾于明治四十年四月孔子祭典會演講，題為孔夫子與我大日本，以為孔子是山東人，乘船出渤海灣東渡，就會達到日本。又班固在前漢書中于敘述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之後，接着就是「夫樂浪海中有倭人」（見同書二八卷下，一四頁）一語，可知這種九夷包括日本在內，確為孔子欲居的目的地之一。

(四) 島夷——胡渭的解釋——楊守敬的解釋

可是時代向前推移，我們對於日本的稱呼也比較更切當，所以戰國時代偽造的禹貢便稱日本爲「島夷」，如九州中冀州一段的「島夷皮服」（見尚書注疏五卷六頁）和揚州一段的「島夷卉服」（見同書同卷一四頁）是。冀州約爲現今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黃河以北一帶地方，而揚州約爲現今安徽，江蘇，浙江諸省，在這些省分以東的「島夷」，重要的當然是日本。故清代精通輿地的學者胡渭對於上面所引的前一句的註釋是：

「海中之山，水繞其四面，斯謂之島。島夷唯倭韓可以當之。」（見胡渭禹貢錐旨二卷五七頁）

而他對子後一句的註釋是：

「唯古倭人東鯷諸國可以當之。」（見同書六卷五十頁）

史記對於「烏夷皮服」本作「烏夷皮服」，（見史記二卷夏本記二頁）鄭元以爲「烏夷，東北之民，搏食鳥獸者」，（見同書同頁）而楊守敬對於冀州外的烏夷指爲「三韓」，揚州外的烏夷指爲「琉球呂宋諸國」。（見楊氏歷代輿地險要圖禹貢九州圖）但古烏作鳥，所謂烏夷實係鳥夷，至于胡渭的解釋也較楊守敬爲妥當，因此沒有解作「搏食鳥獸」或刪除「倭人」的理由，並且用不着再加說明。

自現在看來，以上種種名稱雖不大雅觀，然就當時日本的文化程度講，（正在野蠻時代）實在是很有體面的。即在日本方面，原來也不一定以此爲忤，遲至清朝康熙末葉，日本熟讀中國經史並自稱「得明六經之道」的物雙松在致富春山人的書中，猶以「東夷之人」自居，試聽他說：

「迺以東夷之人而得聖人之道于遺經者，亦李王二先生之賜也。」（見傳雲龍游歷日本圖經二十八卷三二頁）

又日本許多學者自稱日本人以通古斯族爲基調，這個族名出源于雅庫特人（Yakut）

的語言，原意是指豬，這是經過撥特林克（Bothlinck）的攷證，而爲白鳥庫吉所承認的，所以他說：

『Tungus（通古斯）的名稱係 Tungus（豬）之轉，是雅庫特人首先給與其近鄰民族的貶稱。』（見史學雜誌二十一編四號三七七頁，白鳥庫吉東胡民族攷，明治四十三年出版）

以雅庫特人所給予的『豬』的名稱和中華所給予的『夷』的名稱相較，我們的祖先算是客氣多了。

（五）日下——郝懿行的解釋——唐玄宗和藤原朝臣字合的使用

——假借的例子

然所謂『東夷』，『烏夷』，都是東方各族共同的稱呼，並非日本所獨有，所謂『九夷』雖各有所指，但尚書，論語，周禮，禮記，爾雅等書的本文從未標出個

別的名稱，仍係泛指，在中日兩方的關係漸趨密切的時候，這些名稱都不大適用，當有一個特殊的專名詞出現，以供應用。號稱周公所作，孔門所增和漢儒所益的爾雅，其釋地篇說：

「瓠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見爾雅注疏六卷十一頁）
郝懿行對於第四個專名詞註釋道：

「日下者鄭樵以爲即今日本國也，邵氏正善以爲嵎夷；但嵎夷雖在東表，然是賓日之地，而無日下之名。」（見郝氏爾雅義疏萬有文庫本三冊八一頁）
郝氏不以邵氏的主張爲然，顯然傾向于鄭樵之說，其實稱日本爲日下，還遠在鄭氏之前，如唐玄宗賦詩賜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有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見傅雲龍游歷日本圖經十八卷一三頁，光緒十五年日本出版）

之句，所謂日下明明是指日本。又如藤原朝臣宇合在常陸贈倭判官留在京云：

『日下皇都君抱玉，雲端邊國我調絃，』（見日本研究一卷五號懷風藻八行的。）

也是用日下代替日本。這兩個例子可以表見當有唐一代，此項用法在中日兩國是通行的。

這樣看起來，日本曾被稱爲日下，毫無疑義。實則大有問題。爾雅釋地篇于上述四荒之後，接着說：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見爾雅義疏萬有文庫本第三冊二頁）

所謂四荒與中國的距離，比四海更遠，而四荒之外，還有四極，比四荒更遠。以當時的地理知識而論，最大限度只能知道四海，至于什麼『四荒』，『四極』，無非是想像之辭，未必實有其處。日本既如上所述，是在九夷之列——即在四海中——怎能同時居于四荒中？可見爾雅所說的日下不是指日本。不過自日本這個名詞出現

以後，人們因此聯想到日下，遂假借作日本的代名詞。這種用法在我國是常有的，例如史記說：

『……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見同書二卷

封禪書五頁）

這明明不是指日本，但後人却喜歡用「蓬萊」，「瀛洲」，或「蓬瀛」（如宋濂詩「紅雲起處是蓬瀛」）字樣作為日本的代名詞。以此例彼，日下原來不是指日本，也可想而知了。

（六）倭或倭奴

（1）倭的名稱的出現——對於倭字出現於後漢的批評——董毅的論斷

——燕對朝鮮的經濟和政治勢力與對日本的影響

然在周秦之際，中華對於日本有一個特有的和確定的專名詞，就是「倭」。如王充說：

「成王之時，……倭人貢暢。」（見王充論衡下冊恢國篇九十頁，梁溪岡書館出版）

山海經也說：

「南倭北倭屬燕。」（見山海經十二卷六頁）

不過說到這裏，又發生不同的意見，有人根據上述兩節和前漢書地理志，後漢書光武帝紀，安帝紀和東夷傳等等關於倭的記載，作出一種結論道：

「綜觀以上記錄，除山海經未可據外，論衡之作者王充爲光武時人，前漢書之撰者班固亦光武時人，而倭使之來，亦於光武時期，則可假定我國後漢初始知有倭，而所知不詳。」（見日本研究一卷一號，陳樂素魏志倭人傳研究一六頁，民國十九年上海新紀元月刊社出版）

這種假定是錯誤的。第一，說山海經「作于禹益」，固屬荒唐，但認牠「述于周秦」，却極正確，尤其是包括上面引文的海內經四篇以及海外經四篇，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序中已聲明爲「周秦所述」，何以「未可據」？第二，將後代人所紀前代的史實一概抹殺，而硬指爲後代人「始知有倭」，也不合邏輯。無論如何，我們即使可假定王充所說的「倭人」係出自追記，然「周秦所述」的山海經上的倭應爲那個時代已知有倭的證據。明董穀的平倭頌說：

「嬴秦伊始，是曰倭奴。」（見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四十卷日本部藝文一

之三）

一直至明代爲止，似乎還沒有人提及海內外經係「周秦所述」的話，董氏當另有所本，非憑空杜撰，否則他可以任意提早或拉遲些，不必恰恰指定在秦初。

然我們單根據「周秦所述」與「嬴秦伊始，是曰倭奴」兩點立論，還覺不夠，因爲董穀的論證既無從查考，而山海經內的海經八篇，現已有人——如陸侃如——

認爲係西漢時所作，（即使如此，也當然可記述周秦間的事。）仍應提出更爲堅強的證據才好。其實此項證據就在『南倭北倭屬燕』本身上面。這雖是談古代中日關係的人照例要徵引的一句話，但大都否定牠的實在的意義，至少是不注意牠的實在的意義，因此我們這裏須略加說明。

在上古交通不便利的時代，燕與倭幾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現在突來一句『南倭北倭屬燕』，有些令人莫明其妙。但我們如果將燕對朝鮮的關係考察一下，就不難推知個中的情節。蘇秦對燕文侯說過：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見戰

國策下冊燕策一頁，上海羣學社出版）

這可見燕與朝鮮的關係及其富強的一斑。然兩者的關係並不泛泛地止於這一點，貨殖傳更進一步告訴我們說：

『燕……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見史記一二九卷四頁）

這表見燕與朝鮮商業交通的密切。可是除這種關係以外，到了燕昭王時，因箕子的『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見三國志魏志三十卷八百小註所引魏略）

這當然就是史記所謂「……全燕時，管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見同書一一五卷朝鮮列傳一頁）一回事。關於眞番的地望，同書同頁索隱雖引應劭之說，以爲『元菟本眞番國』，然據楊守敬的考證，眞番實在朝鮮之南，卽在洌水之南，與三韓相接。燕的經濟和政治勢力既深入朝鮮半島，而半島與日本又僅隔一衣帶水，雙方早有往來，則燕之勢力波及日本，自無疑義，所以山海經有『南倭北倭屬燕』的話。這自然不是說，倭直接隸屬於燕，而是指倭實居于燕的影響之下。還有一層，日本的備前三原町附近曾有燕國的貨幣明刀出土，原田淑人說牠的『出土狀態不明，不能斷定牠底關係。』（見清華週刊三三卷五期，原田淑人由考古學

上看的中日文化底交涉五五頁）但我們以為參照上述各點，至少可以說燕和日本發生過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因此，認定倭這個名詞的出現，是在周秦之際而不在「後漢初」，總不算是武斷的話。（所謂九夷既包括日本在內，自然是有一個個別名稱的，不過不限定稱為倭。）

（2）倭的名稱的由來

（甲）日本學者對於本問題的提出

關於倭字出現的時期既大體確定了，現在要問我們的祖先何以稱日本為倭，日本人為倭人？

日本學者對於這個問題早經提出，並且作過答案。例如星野恆的日本國號考一文即引有下列二說：

一、『釋日本紀：問：唐國謂我國為倭奴國，其義如何？答：師說，此國之人

昔到彼國，唐人問云：「汝國之名稱如何？」自指東方答云：「和奴國耶」云云。「和奴」猶言我國，自其後謂之和奴國。」（見史學雜誌第三編三四五頁，明治二十五年出版）

二、「本居宣長的國號考所說倭的意思雖沒有明白說出這個名詞的由來，但漢書中將東夷天性柔順的話寫出來了。據班固的意思，倭字的本義是順貌，與說文上所說的意思相同。因其柔順，故呼爲倭人。不管怎樣，這只是就字面而聯想起來的。」（見同書同編同頁）

一二兩說所持的理由，實在過于牽強附會。因爲答者「我國耶」的自問即被譯作國名，未免滑稽！至于對「倭」字望文生義，扯到漢書上的「東夷天性柔順」，也有「專美」之嫌，其實所謂東夷是指九夷，他們共同的性質決不會轉化爲日本專名的。

（乙）對於內藤虎次郎和稻葉君山的倭面土與倭奴音譯的批評

既是這樣，倭字的來源到底是什麼？弘仁私記序說：

「日本古謂之倭國，但倭義未詳。或云「取我之音，漢人所名之字也。」

（見史學雜誌第三編三四五頁）

最後這句話是對的，不過沒有指出是何種名字之音。當然，這種工作其他日本學者也是做過的。明治四十四年六月，文藝第二卷第六號登出著名漢學家內藤虎次郎的倭面土國一文，首先說明今本後漢書東夷傳所載「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在北宋版通典中倭國作「倭面土國」，（在日本古版後漢書中也是如此。）而

「倭字的讀音，顏師古注「戈反，讀 Wa，今音則讀 Wo，委（紆詭反）——

這種讀法是由于篆隸字體的象形關係，見顧野王的玉篇——廣韻於詭切，讀 Wei）的讀音與倭不同，這是因為沒有顧到古今的音變，其實在古代委字與倭字讀音是相同的，詩經小雅「周道倭遲」，……就是明證。」（見內藤虎次郎

讀史叢錄六六至六七頁，昭和四年京都弘文堂書房出版）

他于是徵引詩經，通雅，爾雅正義，文選，列子，山海經，離騷，莊子等等上面大批的例子，證明委移二字同音，而移讀Ya。這樣一來，倭面土當讀作 Yamato，這就是說，倭面土是 Yamato 的音譯。

自內藤氏此文發表後，稻葉君山在同年八月考古學雜誌第一卷第十二號刊佈漢委奴國王印考一文，斷定委奴，倭奴，倭面土都是從 Yamato 譯出，牠們的表現不同，是由于聲音有緩急之差。

像這樣的說法，不獨在日本幾乎成爲定說，即在中國也接受過來了。如王輯五在師大月刊卅二週年紀念專號所發表的倭國考和在史學集刊第二號所發表的日本國號考，都介紹兩氏的主張，並且說：

「倭，倭奴及倭面土等名稱均由 Yamato 音譯出者，因其有略譯詳譯及時代前後之不同，故有不同文字表現之。質言之，倭奴 (Yadu) 爲 Yamato 之急

聲，倭爲 Yamato 或 Yadu 之頭音，倭面土與邪馬台爲 Yamato 音之直譯，均與日本人之所謂大和（Yamato）相當也。』（見史學集刊第二期一四七頁，民國二十五年國立北平研究院出版）

其實這一類的說法是應當分別考察的。第一，內藤虎次郎以爲「倭字的讀音，顏師古注一戈反，讀 Wa，今音則讀 Wo」，這句話不大正確，因爲古音「一」讀 ä，「戈」讀 ɣä，一戈反應讀 ä，（如用注音字母，則爲丫方丫，如用現在的上海音，則爲挨措反，讀矮。）至於今音應讀 O，他大概是爲着證明倭與委爲一聲之轉，故以委（Wei）爲準則，對於倭的發音都加上一個 W，未免弄巧反拙。（按麥多克的日本史譯倭爲 Wa，高德邁耶的日本古代史——A. Weterneyer: Japanische Frühgeschichte——譯倭爲 Wo，自然同樣不正確。）

第二，「古代委字與倭字讀音相同」，固然不錯，但委原來讀 ä 或 o，而不是讀 Wei。徐鍇說……

「委，隨也，從女，禾聲。」（見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十二下女部五五七九頁）

這比徐鉉所謂「委，曲也，取其禾穀垂穗委曲之貌，故從禾，於詭切。」（見同書同頁）要正確得多。所以向來研究小學的著作多反對大徐而贊成小徐之說，例如諧聲補逸說：「委古音于戈反，」而「今音轉委爲於詭切。」（見同書五五八一頁）五翼說：「古音委與阿通，老子所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是也。偏旁加人，則樂浪倭人之倭。」（見同書同頁）因此，在我們的場所，無論如何，牽扯不到「倭遲」，「威夷」這一類的例子上去，而倭字不獨始終應讀 a 或 o，即委字也應從這種讀法，如「漢委奴國王」印上的「委」（讀決不 Wei）字是。

第三，我們的場所的「委」字既如上所述，不讀「於詭切」而讀「于戈反」，所以內藤虎次郎舉出十幾個例子去證明委移二字同音，因而歸結到倭面土是 *Yamato* 的音譯一點，是枉費氣力，並不中肯。不過倭移也是一聲之轉，認倭面土爲 *Yamato*

Yamato 的音譯當然說得通；可是與後漢書東夷傳的邪馬台或邪摩推，隋書倭國傳的羅堆，以及通典東夷上的邪摩堆同爲 Yamato 的音譯相較，便沒有那麼妥當了。

第四，倭而士如果可算作 Yamato 的音譯，倭奴便絕對談不到這一點。因為倘若硬要牽扯上去，不獨倭字須轉爲移字的音，就是奴字也當轉爲ㄋ或ㄛ的音。一個名詞的音譯本是一樁簡單和直截了當的事，現在却要兜兩個圈子，然後譯音，豈非古今中外的奇談？至於「倭奴爲 Yamato 之急聲」的說法是強詞奪理，毫無足取的。

(丙) 倭奴爲アイヌ音譯的直接和間接證據

然所謂倭奴或倭到底是從什麼名詞譯出的呢？舊唐書說：

「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見同書一九九卷上日本傳一〇頁）

可見倭原是一種族的名稱；然倭並非種名的全音，只是牠的首音。王先謙說：

「自山海經以降皆稱倭，……云倭奴，長言之也。」（見王氏日本源流考）

二二卷一頁)

實則「倭奴」是種名的全音，「稱倭」，係省文，在中國史籍中也多有全音的，如後漢書記載光武中元二年：

「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見同書一卷下光武帝紀一〇頁）

唐書也說：

「日本，古倭奴也。」（見同書二二〇卷東夷傳一一頁）

這是兩個顯明的例子。我們仔細審查構成日本民族的主要各族，（詳情見第二章）只有一「アイヌ」最為切合，「倭奴」二字是這個種族正確的音譯，至多不過是牠的急聲罷了。（即省掉其中的「イ」）查「アイヌ」的英譯為 Ainu，如同樣省掉「In」而為「Ainu」，與「倭奴」二字的音仍完全相符。考這一族來到日本最早，幾乎佔領過日本全部，甚至於達到琉球；周末伸張經濟和政治勢力於朝鮮半島的燕會和他們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知道他們種族的名稱，因直譯其音為「倭」或「倭

「奴」，這是很可能的，並且也是必然的。至於 *Yamto* 與「倭奴」二字聲音相去既遠，原來又不過一地名，絕不能與 *Ainu* 相提並論。

再考我們在上面所引的山海經中所謂「南倭北倭」的所在，據中山久四郎說：

「南倭係我九州南部及琉球諸島。」（見大日本史講座第十七卷，中山久四郎支那史籍上的日本史二〇頁，昭和十一年東京雄山閣再版）

而新井白石的蝦夷志則認

「北倭係蝦夷。」（見同書同卷同頁）

這和 *Ainu* 曾經佔領的地方，範圍相同，所以將 *Ainu* 譯作「倭奴」，是更有理由了。

還有一層，據一位對於古代日本有相當研究的作者大衛斯 (*F. H. H. Davis*) 說：*Ainu* 說……

「這個退化的種族……對於日本已經留下一個永久的標誌，即好幾百種地

理名詞的標誌。」（見大衛斯從神代到青島陷落的日本四頁，一九一六年倫敦出版——Japan, from the Age of the Gods to the Fall of Tsingtau）

例如『日本著名的山“Fuji”（富士）是“Ainu Huchi”或“Fuchi”——即火神——的訛轉』，而『日本古代國號“Yamato”（大和）這個名詞是出自“Ainu”語，原來是指栗樹間的一個池。』（見同書同頁）以上種種雖不是“Ainu”得譯作『倭奴』的直接證據，然由此可見“Ainu”在古代日本勢力的強大，與影響的深遠，而日文中的“アイヌ”必為這個種族名稱的音譯。我們的祖先用此名稱去代表日本和日本人，也是當然的。

可是說到這裏，人們又有不同的意見，以為“Ainu”通常譯作『阿夷奴』，『阿奴』，『哀奴』，或『蝦夷』，尤其是後面這個譯名不獨現在是如此，即在唐代也已經是這樣：如唐書載『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夷人皆朝。』（見同書二二〇卷一頁）因此有人認『倭奴』非“Ainu”的音譯，實另有含義。例如稽素青

說：

「蠻奴與流入之滿洲，蒙古，馬來諸族混合，成爲矮小之日本人，華人以其矮小，名之曰倭。」（見稽嘉青中日歷代戰史第一冊一七頁，民國二五年上海再版）

這種主張實在過於牽強，殊不足取。第一，倭奴二字如果不是“Ainu”的音譯，而只是華人因日本人矮小，給予此名，那應當稱爲「矮奴」，如辭源所載的一樣；因爲倭與矮含義迥異，絕不能作爲牠的替身。第二，即退一萬步，假定倭奴等於矮奴，然後漢書却說：

「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見同書一一五卷六頁）

所謂女王國就是通常所稱的倭奴國，或「大倭」國，即所假定的「矮奴國」，但其南四千餘里復有一個「朱儒國」，如果是兩個「矮奴國」並舉，殊無意義，如果是

女王國人對朱儒國人變成「矮子中的長子」，因而稱前者爲「矮奴國」，後者爲「朱儒國」，更是滑稽。所以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

現在總括起來說，倭奴確是 *Ainu* 的音譯，而阿夷奴和蝦夷也同樣是牠的音譯。一個外國專名詞因時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譯法，是常有的事，絲毫不足爲怪。在三者之中以阿夷奴爲最正確，蝦夷不僅爲音譯，且具有意譯的意味，恰和哥溫 (*Gowen*) 所說的「一樣」。

「倭人……叢叢的鬍子往往要垂到腰間，爲了這種情形，所以被稱爲蝦夷。」（見陳彬龢譯的哥溫日本歷史大綱二六頁，民國二二年商務出版）

(丁) 中日學者對於倭奴音譯理解的不同

關於倭奴是 *Ainu* 的音譯一點，一望而知，在我國原來是不成問題的，而最先看出來的似乎是黃遵憲，他曾說過：

「日本土人即蝦夷，……日本稱爲毛人，（亦呼爲委奴。）古所謂長鬚國

也。』(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帙黃氏日本雜事二八三頁)

最近的出版物如吳貫因的史之梯，謝六逸的日本文學史以及張原譯的哈耶瑪的日本等等都一致承認“Ainu”即倭奴。然在日本方面恰恰相反，許多著名的學者對於倭奴作種種可能與不可能的推測(詳情見後)，偏偏不涉及“Ainu”，這並不是他們真正「熟視無睹」，只因這一族早被征服，過着文化落後的淒慘生活，最爲他們所鄙視，故不願意說出倭奴音譯的真正來源，而故佈迷陣，以眩人耳目。但無論如何，我們的問題算是解決了的。不過擁護他們主張的人也仍舊振振有詞地說：

「Ainu 讀音雖可讀作倭奴國，倭國雖亦可解作倭奴國之略稱，然Ainu 音決不能譯作倭面土也。」(見史學集刊第二期王輯五日本國號考一四四頁)

這種理由是不健全的。我們現在再鄭重聲明一次：倭奴是“Ainu”的音譯，係

一個種族名，出現於周秦之際，而倭面土或邪馬臺是“Yamato”的音譯，係一個國名，出現於後漢之初，(如淳對前漢書地理志倭人所注的如墨委面四字倘若依內藤

虎次郎的解釋，係兩個國名，而委面即倭面土，那麼，此名稱便出現於前漢；不過如淳的說法意義不明，而內藤氏的主張有些勉強罷了。（兩者原有區別，不能混爲一談。但倭面土或邪馬臺恰爲當時一個主要的國家，具有代表其牠國家的優越性，所以我們的史籍有時直截了當地稱牠爲倭奴國或倭國，（詳情見第六章十二項第一目）因此，把牠們混合起來了。可是我們却不能因這樣混雜的應用，承認倭面土國完完全全等於倭奴國或倭國，也不能因古版後漢書和通典對於安帝永初元年遣使奉獻的國家，不書作倭國而書作倭面土國，便承認倭國和倭面土國完全爲一物。倭面土或邪馬臺即後來日本人所稱的大和，（不過名義上是如此，參看第六章二項第一目）號稱爲現今「萬世一系」的皇室最先建都之處，這一族因此也稱爲「大和民族」。但大家應當注意，這個地名及因此而起的族名決不是倭奴，因爲舊唐書明明白白告訴我們說：「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試問稻葉君山等怎能抹殺這種歷史的事實，硬說倭或倭奴是 Yamato 的音譯？他們如果無法推翻上面的種種史實，那

就只好放棄他們的主張。

(3) 日本古代的國號——諸神所命的名稱——雷同的名稱

這個問題結束了，現在要涉及一個附帶的問題。就是蔡爾康在他的中東古今和戰端委考中曾引用我們在上節重新提出的舊唐書上的一句話，並加上一句按語道：

「日本者國名也，倭者種類名也，史氏誤矣！」（見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八册一七一頁）

然在實際上，蔡氏的話固然對，史氏的話也沒有誤，因為日本對外向來沒有正式的國號，史家迫不得已，只好將種名當作國名。日本在上古時雖稱為「大八島國」，豐原中國，瑞穗國，細戈千足國等，但和星野恆所說的一樣，那是「上世諸神所命」一名。見史學雜誌第二編星野恆日本號國考三三六頁。又曾稱為「中國」，如聖武天皇時（紀元七二四至七四八年），藤原廣嗣上疏說：

「北狄蝦夷，西戎牟俗，狼性易亂，野心難馴；往古已來，中國有聖則後服，朝堂有變則先叛。」（見源光國 大日本史第五冊一一七卷一二九頁，昭和四年東京出版）

清和天皇貞觀十二年（紀元八七〇年），太政官下符上總國，令教諭蝦夷道：

「折取夷種，散居中國，縱有盜賊，令其防禦。而今聞彼國夷俘，猶挾野心，未染華風，或行火燒民室，或持兵掠財物。」（見同書第八冊二四一卷蝦夷傳下三七三頁。）

像這樣「中國」及「華」的稱呼，和我們完全相同，不免有「東施效顰」之謂！此外，也曾稱為上面提到的大和國，和下面還要說及的秋津洲，及豐秋津州等等。但這一切名稱不獨為現今「萬世一系」的皇室所建的國家的專有品，與最初另一系統的國家——以邪馬臺國為代表——無關，並且從未見于前一種國家的國書中，（最早的國書自稱為「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

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見宋書九七卷倭國傳八頁）或其任何種公私的文件中，我們的史家無從知道，怎能怪他們採用種名爲國名呢？

(4) 倭奴含義的擴大並對於日本學者所持異議的批評

(甲) 史籍上的證據

倭奴二字原來雖僅指蝦夷，但旋（多去掉一個「奴」字。）具有一種擴大的意義，所謂「南倭北倭屬燕」，卽其見端。後來且用以兼指所有日本人及其國家，這也是勢所必至的。這和外國人稱中國爲支那（按支那爲秦音之轉，初時在外國文中爲 China，後轉訛爲 China，此字在德文中，仍讀爲「秦哪」）稱中國人爲支那人，或稱中國爲唐，稱中國人爲唐人一樣，不過前一例是以一個種族名代表一國人民及其國號，後兩例是以一個朝代名代表一個國號罷了。這是一國對於他國認識不足時應有的現象，絲毫不足爲怪的。因此，我們在唐以前的史籍，如前漢書，後漢書，魏

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南史，北史，隋書等對於日本全國統稱為倭（但隋書作倭，字同），對於日本全國的人統稱為倭人，今試舉數例如下：

一、前漢書：「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見同書二八卷下地理志一四頁）

二、後漢書：「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見同書一五卷東夷傳五頁）

三、三國志：「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見魏志三〇卷東夷傳一〇頁）

四、宋書：「倭國在高麗東南大海中，世修貢職，高祖永初二年詔曰：「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見同書九七卷夷蠻傳八頁）

（乙）木宮泰彥和西村眞次の異議

但日本的學者對於這種事實多不願承認，如木宮泰彥以爲「漢書與魏志之所謂

倭人，即指日本北九州之住民，已爲多數學者所承認。』而宋書『所謂倭，與漢書，魏志指北九州之倭者不同，實指日本而言也。通讀宋書以後之中國史籍中關於倭之記事，即可知之。』（見陳捷譯的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萬有文庫本第一冊一六和三四頁）即西村真次也說：『所謂「倭人」却成問題，有些學者將其解釋爲日本人，他們又有視爲印度納西亞人的，又其他學者視爲印度支那族。我贊成第三說：倭人就是與印度支那系的苗族有共同祖先的民族。』（見徐碧暉譯的西村真次日本文化史概論二四八頁，民國二五年商務出版）他並且確定後漢書和魏志『所謂倭人倭國並不指原日本人及其所建設的大和政府。』（見日本文化史概論九六頁）

（丙）批評

日本學者把宋書以前的史書所說的倭和倭人這樣解釋爲專指北九州及其居民，或印度支那族，完全喪失了我國古籍的本意，其錯誤並且顯而易見，今試簡單說明如下：

一、魏志東夷傳所舉屬於女王國的二十九個國，除狗邪韓國不計外，據內藤虎次郎的考證，不獨在九州與四國，並且遠達本州的大和，伊勢，近江，志摩，美濃，三河，遠江等處，即退一步，依照日本向來一班學者（如本居，吉田，松下諸氏）的解釋，也在九州，四國等處，（參看內藤虎次郎讀史叢錄卑彌呼考二二至三三頁）是所謂倭決不限于北九州。

還有一層，後漢書又說：

「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見同書一一五卷六頁）

魏志也說：

「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見三國志魏志三〇卷一〇頁）

有人以為後漢書的拘奴國就是魏志的狗奴國，其位置在南而不在東，然無論如何，

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的國家「皆倭種」，正是事實，並且「皆倭種」三字已經告訴我們不止一個國家。可見所謂「倭種」佔據的面積十分廣大，這自然不復是蝦夷，但也決非全屬印度支那族，而宋書以前的中國史籍始終沒有把大和族及其國家劃分在倭人與倭國的範圍之外，也至為明顯。（因為此族正居于女王國之東。）單是這些事實已經證明木宮，西村兩氏或「多數學者」的主張絲毫沒有根據！

二、況且前漢書和後漢書明明指出倭「凡百餘國」，是倭為這百餘國的總稱，沒有可疑的餘地。魏志和晉書雖稱「舊百餘國」，「舊有百餘小國」，表示魏晉時已因歸併，不復有如許國家存在，但也決不止上述的三十國，只要把魏志東夷傳檢查一下，就可以知道。日本許多學者完全不顧及這種事實，惟根據此等史籍所描寫的一個國度或一種服裝，斷章取義地確定牠們所謂倭或倭人是專指日本的某一處或某一族，（前者的例子是木宮泰義，後者的例子是西村真次。）這如何說得通？！

(七) 倭改稱日本的原因——新舊唐書的說明——二千六百年

史的解釋——大百科事典的記載

我們於指出中國史籍上所謂倭或倭奴的含義後，現在要問日本既已被稱爲倭，何以又更今名？關於這一點，我們的新舊唐書均有所說明，就是：

『日本古倭奴也。……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見唐書二二〇卷東夷傳一一頁）

『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爲日本。』（見舊唐書一九九卷上日本傳一〇頁）

唐高宗咸亨元年係紀元六七〇年，與白柳秀湖所說的日本這個名詞的出現期相差不過二三十年。據他說：

『稱日本全國爲 Yamato，神代時已是如此。Yamato 等于「倭」字，起于

鏡前委奴（伊觀）王通漢，中國人呼日本爲倭國。現在雖將全國寫作大倭，一國寫作大和，以示區別，然古代同用「倭」字，極易混淆。大倭相當于日本這個名稱，始于孝德天皇時代。（見白柳秀湖二千六百年史第九一四至九一五頁，大正八年東京東亞堂書房再版）

所謂孝德天皇時代係從紀元六四五年起至六五四年止，日本二字當然是最初用于本國，然後對中國改稱，故白柳氏的說法與唐書並沒有衝突。此外，日本大百科事典對於倭與日本這兩個名詞的說明引據更多，並且把許多學者對於日本這個名詞所爭議的起源于韓人著作一事都概括敘述出來了，尤足供參考，特一併介紹于下：

『國號古稱 Yamato。日本二字始見于奈良朝初期的日本書紀。…… Ya-

mato。是因畿內一國的大和地名而起。……日本二字的由來是緣我國在世界的最東端，所謂佔日出的位置。推古天皇致隋的國書有「日出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的話，就是這種意思。當時我帝國尙無國號，尙無公定的名稱，不過

對中國交通的必要上這樣稱呼罷了。……「倭」字始於古代中國呼東方海上的居民爲倭人，我國從前援中國人普通稱日本爲倭國的例子，也跟着使用這個「倭」字。這樣的用法很古，如宋書所收我雄略天皇的國書，有「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的名稱是。日本書紀的編者以「倭」的名稱出于中國人的稱呼，不足正式表現我帝國，遂避去「倭」字，改用新創的「日本」二字。日本二字作我國國號用，初見于孝德天皇的大化詔書。又日本紀引用的百濟記，百濟新撰等書係出自韓人手筆的古書，關於我國事，或書「本朝」，或書「大倭」，而韓人著的百濟本記用有「日本」字樣，例如關於繼體天皇事，作日本天皇，故有人認爲使用「日本」字樣，始於韓人。」（見大百科事典二〇卷六八頁，昭和九年東京平凡社出版）

由這一大段話看來，日本更改國名，實含有一種自覺的意味。我國自唐起，除

掉舊唐書的東夷傳並列倭國與日本外，其他史籍如唐書，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等都依「名從主人」的意旨，只有日本傳，不復有倭國傳了。

(八) 倭在應用上意義的改變

倭奴二字雖係音譯，但「奴」字畢竟免不了輕蔑的意味，所以我們的史籍多省去這個字，僅稱倭國或倭人，這樣一來，便絲毫不含有藐視的意義了。可是日本人既「惡其名不雅」，避去不用，我國人後來遂故意用「倭」字對日本表示輕蔑或斥責的意思：如明代受日本海盜的侵襲，當時稱爲「倭寇」，豐臣秀吉發兵侵朝鮮，目爲「倭賊」是。甚至于一句話中倭奴與日本並用，以示抑揚：

「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于日本者不下數千。」

(見胡宗憲——本應爲鄭若曾——籌海圖編十一卷一頁)

像這樣的例子自明清一直到現在，是時常可以遇見的。不過也不能一概而論；

「倭」字有時並不合貶責或輕蔑的意思，例如清初物變松與藪震菴的書說：

「其辭所以不傳之故，乃華音不便于倭口耳。」（見傅雲龍游歷日本圖經

二八卷三二頁）

這位日本學者華倭並舉，自然絲毫不帶褒貶的意味。就是我國人，于修詞或省略時，爲着避去多用日本字樣，也常代以「倭」字，並沒有特殊的用意。

（九）其他常見與罕見的名稱——牠們所表現的意義

現在總括起來說：我國自古至今對於日本的正式稱呼，至少有下列數種：即東夷，九夷，島夷，倭，倭奴，大倭，和日本。此外，隨便的稱呼，尤其是用于詩詞中的，爲數甚多，今試列舉我所知道的如下：

一、東洋，這本是和西洋相對的一個名詞，範圍甚廣，至少包含中國和日本，但在我國的用語上，多專指日本。

二、東瀛，係從前面提到的瀛洲轉變而來，專指日本。

三、扶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見梁書五四卷東夷傳十一頁）同書同頁又說：「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十餘里」，而「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是所謂扶桑，原來絕非指日本。可是藤野真子扶桑木記却說：「扶桑木者不知爲何樹，相傳皇祖神武天皇時稱本邦曰扶桑國，蓋取此以爲名。」（見傅雲龍游歷日本圖經二九卷五二頁）這是因我們後來稱日本爲扶桑，故託詞「相傳」，加以附會，原來決不如此。

以上三個名詞流行最爲普遍，例子隨在都是，用不着列舉出來。

四、東島，明成祖于永樂五年五月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曾稱其「昭全德于東島，播芳譽于中國。」（見傅雲龍游歷日本圖經十八卷四八頁）

五、三島，這是由蓬萊，方丈，瀛洲三島而得名的，雖有時也指英國（所謂「英倫三島」），但仍多指日本（其本部爲本州，四國，九州三大島），記得民國初

年北京某報罵寄居日本的黃興，兼白狼匪禍，曾有兩句得意之作，叫做：「黃鼠已浮三島去，白狼猶據兩河間。」

六、仙島，這當然也是由「三神山」之類而得名，劉滄的贈隱者所謂「五湖仙島幾年別，九轉藥爐深夜開。」（見全唐詩二二卷二六頁）猶具有神仙意味，但後來也指日本，如錢起重送陸侍御使日本，有「雲佩迎仙島，紅旗過蜃樓」（見同書九卷一五頁）之句。

七、沙島，這個名詞似乎不大遇到，但明僧來復送榮首座還日本却說：「蝦夷免偈迎沙島，龍伯分齋候水宮。」（見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四十卷日本部藝文二之三）

八、鬱島，這本是一個「莫須有」地方的名詞，徐陵的奉和山池詩所請「羅浮無定所，鬱島屢遷移」（見徐孝穆集一卷一二頁）是，但後來也指日本，如王維送祕書晁監還日本國的序中說：「扶桑若薺，鬱島如萍。」（見全唐詩五卷一七頁）

九、海東，這個名詞原指朝鮮，如韓致齋所著的海東釋史，即是三國初至高麗末的一部朝鮮史；但後來又用以指日本，如元吳萊論倭所謂「海東之地，曾不能當中國一大州」，明張應麒的一體和尚譚所謂「是宜衍兒孫之昌盛，續燈燄于海東也耶」（見傳雲龍游歷日本圖經十八卷四二和六三頁）是。

十、日東，這個名詞原出自周禮地官司徒所謂「日東則景夕多風。」（見周禮注疏十卷十一頁）後來用以指朝鮮，如唐沈頌的送金文學還日東，林寬的送人歸日東，曹松的送胡中丞使日東，元宋無的贈日東僧是，然旋也兼指日本，如明宋濂的賦日東曲，王守仁的送日東正使了菴和尚歸國序是。

十一、日邊，晉明帝幼時，長安使問日與長安孰遠，他答道：「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見晉書六卷明帝紀七頁）這原是一個普通名詞，但杜佑說過：「倭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故以爲稱。」（見通典一八五卷邊防一第六頁）人們也用以指日本，如釋無可的送朴山人歸日本，卽有「水從荒外積，人指日邊回」

（見全唐詩二九卷七四頁）之句。

十二、日域，楊雄說過「東震日域」（見前漢書八十七卷下楊雄傳下三頁）的話，顏師古對這個名詞的註釋是「日初出之處也。」（見同書同卷同頁）後來日本和渤海國都用此作日本的別名，如仁明天皇賜渤海國王勅書說：「飛颿不斷，望日域而忘遐。」渤海中台省牒文說：「扶桑崇浪，日域遐邦。」（見源光國大日本史第八册二三九卷渤海傳下三四九和三五二頁）又源義成上明景宗表說：「南桂海，北冰天，西月曙，東日域，同文同軌，相應相求。」（見傅雲龍游歷日本圖經十八卷六六頁）

十三、東域，這個名詞原指遼東，後漢末王烈避亂遼東，史稱「東域之人奉之若君。」（見魏志十一卷王烈傳小注九頁）但後來也指日本，方干送僧歸日本，便說：「西方向在星辰下，東域已過寅卯時。」（見全唐詩二四卷五一頁）

十四、東隅，馮異傳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見後漢書四十七卷三頁）

周所以爲「隅當作岫，卽書所謂岫夷，東方日出之地，故曰東岫。」（見湖北先正遺書名義考二卷一頁）因此也用以指日本，如趙擘送晁補闕歸日本國，所謂「西掖承休澣，東隅返故林」（見全唐詩五卷二八頁）是。

十五、東國，這個名詞原來是指朝鮮，徐世居等所著的東國通鑑，正是敘述朝鮮的歷史，但旋也兼指日本，如隋時智者大師告訴諸弟子：「吾滅後三百餘歲，生于東國，興隆佛法。」（見傳雲龍游歷日本圖經十八卷二十頁）釋圓鏡等復圓行等書，所謂「謹附書于東國，」（見同書同卷二一頁）都是指日本講的。

十六、東陬，日本「國王」源義政上明憲宗表，自稱「禹貢山川之外，身在東陬。」（見同書十八卷六七頁）

十七、蜻蛉國，日本「地東高西下，勢若蜻蛉，古亦曰蜻蛉國。」（見清文獻通考二九五卷四裔考三，第九頁）

十八、秋津洲，大日本史載神武天皇三十一年，「車駕巡幸，登腋上曠間丘，

迴望地形，稱其似蜻蛉之臂咕焉，由是有秋津洲之號。」（見同書第一册一卷第七頁）這種故事無論是否真實，我們可以知道上述蜻蛉國的所自出，至于這裏名稱的由來，據同書同頁的小註上說，是因「蜻蛉讀爲秋津。」黃遵憲敘述神武的歷史，稱其「國號秋津洲」。（見日本國志一卷二頁）

十九、豐秋津州，這本是八大洲的名稱之一，在我國的圖籍上也常有此名出現，如周海環的東洋歷史地圖第二圖和蘇甲榮的中國地理沿革圖所附古代世界圖，都稱日本爲「豐秋津州」。

在上列的名稱中，有些是由普通名詞變成專名詞的，至于以隨處可用的普通名詞指日本，還有許多，（如王維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主人孤島中」一句的孤島，和釋無可送林山人歸日本「浮天絕島來」一句的絕島是）自然不在徵引之列。可是上面所說的十九種，再加上從前提及的日下，蓬萊，瀛洲，蓬瀛四種，已經達二十三種，比我們史籍上對日本的正式稱呼多四倍以上。現在把牠們搜集起來，羅列在

這裏，有什麼意義呢？我以為至少可以從牠們看出三個要點：

一、中國對日本所用的別名之多，在古今中外的史籍上莫與比倫，這並不是一樁偶然的事；牠們充分表見兩國接觸的頻繁，與關係的密切。（至少在某個時期是如此。）

二、日本直至明治維新時代為止，雖事事落後，一切的一切幾乎唯中國的「馬首是瞻」，但上列名稱的含義絲毫不帶輕蔑日本的意味，有的（如仙島，蓬瀛之類）甚至於使牠幻化，成爲一個極樂世界，這可見中國人對日本的度量。

三、日本和中國的交接雖遠在朝鮮之後，日本從中國輸入文化雖以朝鮮爲媒介，但上列名稱中有的（如海東，日東，東國）本來專指朝鮮，後來不獨兼指日本，甚至爲牠所獨佔，「後來居上」，可見牠對中國的重要性確超過朝鮮。

可是這些名稱有的已不佔重要位置，有的已完全不通行，不爲一般人所知道，有的且變成普通名詞，可以到處應用了。

第二章 日本民族的成分與日本國家的起源

(一) 問題的困難

我們要徹底了解中日關係，應首先知道日本的民族係由何種成分構成，日本的國家於何時出現。可是這兩個問題最難解決，因為日本最古的史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遲至八世紀初葉才出現（唐睿宗玄宗時），不獨傳說無聞，紀載不備，而且有心作偽，虛構事實，遂使真相不明，成爲後人聚訟的焦點。關於第一個問題，除掉蝦夷，倭人和中韓移民外，不是充滿了神話，就是缺乏紀錄；關於第二個問題，則古史的作者鑑于中韓歷史的悠久，不免相形見絀，遂憑空編了一部古代史，雖則空無所有，却是矛盾百出，因此，我們要想清出一個條理來，也就很費氣力了。

(一) 二三十萬年前的日本

現在先談第一個問題，並從遠古講起。

日本原來與朝鮮聯在一起，為亞洲大陸的一部分，約當四五十萬年前，地殼起了劇烈的變動，使牠和大陸分離，成為大小不等的羣島。當人類最初出現于世界的時候，不用說，此等羣島是沒有人居住的；但約在三十五萬年前的當兒，便有人類活動的痕跡，因為在洪積期中部地層中曾發見二三塊技術粗劣的打製石塊，可說是由他們遺留下來的。不過一到洪積期的後期，有火山的大活動，遂使這種人完全歸于消滅。

直至沖積期的初期，大陸方面才又有新石器時代的人種來到日本，他們的遺骨和現代日本人大不相同，因此在日本民族的形成中所佔的成分很少。

(三) 中國史籍與日本人種——古代史籍的失載——現代史

籍的謬誤

自此以後，各方面有新的人種繼續前來，形成各種族的大匯合。但牠們的來源因記載無聞，後代多弄不清楚。我國史籍的紀錄本來爲日本古代史料最大的來源，可是在這一點上，正和羅斯（John Ross）所說的一樣：

「關於中國和牠的「四海」的各種野蠻人的接觸，雖有充分的，並且顯然正確的記載，但我們對於那些「蠻夷」之邦的言語或種族想要找到何種批評的分析，那是徒勞無功的。」（見羅氏古代和現代高麗史一頁——History of Korea, Ancient & Modern）

我們從中國古史中既找不着材料，對於現代的史籍更屬無望，如果偶有一二的話，也就不是科學的探求，而只是一種盲目的猜測，如劉錦藻說到日本，以爲

「變法才四十年，煥然改觀，寢寢欲與列強抗衡，豈其黃帝子孫，與我爲同種耶？何興之暴也！或曰其祖爲蝦夷，或曰大和種，要之爲秦時徐福避亂入海，留居其地者近是。」（見清續文獻通考二九六卷一頁）

黃遵憲對於日本是比較有研究的，他竟以堅決的口吻，主張中日同種，他說：「今日日本人實與我同種，彼土相傳本如此：寬文中作日本通鑑，以謂周吳泰伯後，源光國驅之曰：謂泰伯後，是以我爲附庸國也，遂削之。至賴襄作日本政紀，并秦人徐福來亦屏而不書，是皆儒者拘墟之見。夫源氏謂有所不知，闕疑可也，明明紀載，卽祖宗出于微賤，亦非臣子所得妄削，况聖賢裔乎？若以同族爲附庸，則晉，鄭，魯，衛，何以稱兄弟之國？」（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帙黃氏日本雜事二八三頁）

此外，姚文棟的東槎二十二種中雖列有日本民族考一種，似未完成行世，至于傳雲龍的游歷日本圖經，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和王先謙的日本源流考雖都是大部頭

的書，但沒有涉及日本的種族問題，殊使我們失望。

(四) 東西洋學者對於日本人種的學說

(1) 吳太伯後裔說

現在要問：日本自身向來對於這個問題的解說又是怎樣的？晉書說：

「倭人……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見同書九七卷倭人傳三頁）

木宮秦彥以爲「漢人思想，每喜謂四方夷狄之祖先，與己等同族。」（見中日交通史中譯本一册一五頁）這裏如果找不出證據，他們也許又要疑晉書的說法只是我們史家的託詞。其實日本當時視中國爲上國，因太伯曾「奔荆蠻，文身斷髮」，（見史記三一卷吳太伯世家一頁）故依據這個相同之點，自附于太伯以爲榮。自此

以後，常有人附和此說，如作日本書紀纂疏的藤原兼原，私修國史的釋圓月，儒士道春父子，著本朝通鑑的鵜峯，以及考古學者藤井貞都是。

(2) 通古斯族構成日本基本人種說

(甲) 構成日本民族的各族一瞥

除此以外，還有日韓同種說；明治以來，日本民族出自某種族的說法更紛紛並起，莫衷一是。但自人類學，考古學，民俗學，語言學的研究逐漸發達，與西方學者的先導指示途徑以後，日本學者才一反向來日本民族出自某一種族的說法，盛倡幾個種族混合的學說。現在特介紹日本一種最流行的代表的學說——史學界的權威西村眞次的學說——如下：

「日本人爲混血民衆。作爲構成日本人的種要素，我可舉出如下六種族，此外還可推想出二三種族來。」

(1) 黑膚，反唇，鬚毛的存在，可證明爲黑人種尼格里托 (Negrito) 的動因。其移住的年代，至少約在紀元前三千年以前。

(2) 附近四周沒有類緣的蝦夷族之棲息，其祖先卽舊蝦夷族 (Paleo-Ainu) 之移住於日本，非常古遠，其年代從土地的堆積率計算起來，至少使我們承認在紀元前二千年頃。

(3) 從體質及文化兩方面可證明通古斯族集團的移住於日本島羣，以此爲日本人的基調。其移住年代較舊蝦夷稍後，所以不會更古於紀元前千八百年代。

(4) 印度納西亞人 (Indonesians) 從先島羣島至薩隅半島等上陸，是沒有可疑的餘地。古史上「華人」就是。

(5) 印度支那人 (Indo-Chinese) 從中國南部移住到九州地方，也是很明顯的。

(6) 漢族即原中國人 (Proto-Chinese)，移住於日本，比較晚些。這竟繼續至歷史時代。

(7) 此外，在歷史時代大概也有若干的馬來種族 (Malayans) 進來。

(8) 羅馬鼻及猶太鼻的存在，就是唆示日本人的人種要素中，間接或直接的混有西方種的血液。

(9) 又有非常廣頭的動力的存在，不能不視為表示蒙古人 (Mongols) 的血液的混淆。『(見徐碧暉譯的西村真次日本文化史概論六二至六三頁)

(乙) 通古斯族來到日本的時期及其三次登陸的地點

在以上一至六的六個主要種族中，通古斯族又是主要中的主要種族，西村真次並根據哈忒登 (Huntington) 博士大陸方面六〇〇年為一週期的乾濕交代的氣候變化的說法，假定這種「原日本人」的日本移住為紀元前一八〇〇年，一二〇〇年，六〇〇年，『或』紀元前五五〇年，一一五〇年，一七五〇年。』(見同書九二頁和

九七頁)至於通古斯族在日本民族中混血的比例雖不能用正確的數字表現出來，但從姿態等等的研究，據說要佔到百分之六十。

這個通古斯族來到日本，不獨有一定的時期，而且也有確切的地點，就是：

「其中的一部分約與蝦夷人同時，也由間宮海峽而入日本，居於出羽及越後。這一部分是通古斯族中最先來日的。第二次是在滿洲方面的通古斯族發生南下運動而入朝鮮，其中的一部分留於朝鮮，另一部分渡日本海，以出雲為中心而行殖民。我國古代史中的出雲民族即這種通古斯族的移民。第三次則最遲，大陸地方和朝鮮半島的通古斯族對馬海峽，在九州登陸，以日向為中心而擴張其勢力。第一和第二次來日的通古斯族即古代史上所謂國津神，最後來日的即古代史上所謂天孫族。」(見佐野學日本歷史研究三三頁，昭和五年東京希冀閣出版)

(丙) 骨子裏的問題

通古斯族來到日本的時期和地點，既經他們說得這樣確切，似乎應當可信。但有人以為日本學者所主張和日本一般人所歡迎的通古斯族構成日本民族主要成分的學說，係一種別有作用，自欺欺人之談，沒有科學的根據。因為當紀元前四千年頃，中國人（漢族）從西方向東和東南推進，驅逐原來居於黃河與揚子江下游的通古斯族，遁入東北，當紀元前二千年頃，中國人又向東北驅逐南部通古斯族遁入西北。（參看謝婁科溝婁夫北中國的人類學第一〇四頁，一九二三年上海出版——*Shirokogoroff: 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他們自居於通古斯族，用意不外好藉口原來從大陸來，現在要回大陸去；並且進而宣傳日，韓，滿，蒙，中亞，土耳其，芬蘭，匈牙利為烏拉阿爾泰族（*Ural-Altaiic*），以與漢族對抗。

在事實上是否如此，要把通古斯族是否構成日本民族的『基調』這個問題解決後，才能判斷出來。現在關於這個問題的各種科學的研究方在進展中，還難獲得一種確切不移的定論。不過西洋學者涉及通古斯族時，總不提到日本，論到日本人種

時，也不說及通古斯族。如有名的大英百科全書（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通古斯族條（見同書二二卷五四九頁，一九二九年十四版）即未嘗涉及日本和朝鮮，謝婁科溝婁夫北中國的人類學所刊的三次種族遷徙圖，（第一次在紀元前四千年頃，第二次在紀元前二千年頃，第三次在紀元一至四世紀。）通古斯族雖向東北遷徙，不獨未達到日本，並且沒有侵入朝鮮。（參看同書一〇九，一一一和一一三頁。）就是我們根據中西史籍的記載，研究朝鮮的種族，也沒有發見通古斯族佔何種重要的成分。（參看本書第三章五六兩項）所謂通古斯族第二次南下，留一部分於朝鮮，未必可信，因此另一部分渡過日本海，也有些成問題了。

（3）三個類型說

在另一方面，前東京帝國大學醫學教授別爾慈（H. BERN）對於日本人作過詳盡的人類學的研究，是很負盛名的，他將住於日本羣島的人種分作三個不同的類型，

即：甲、滿洲高麗型，乙、蒙古型，丙、馬來或印度納西亞型。

「第一型在各上等階級中較爲普遍，牠的特點是非常的高而瘦，臉稍長，眼多少有點斜，鼻如鷹嘴，額稍向後退，手很勻稱。一種最可信的假設是，這個型的人係高麗殖民的後裔，他們在有史以前的時期，由朝鮮半島經過沖島，定居於日本西海岸的出雲。第二型是蒙古種。在日本不常遇到這個類型，也許是因在順利的社會條件之下，牠便轉入滿洲高麗型。牠的特點是臉寬，額骨突出，眼斜，鼻多少有點扁平，口闊。形體的構造十分強固結實；不過最後這個特點殆不能稱爲模範的。關於蒙古人達到本島的道路，沒有滿意的學說，然他們於某一時期的來到是無可懷疑的。就日本民族的元素講，比這兩個類型更重要的是馬來人或印度納西亞人。身材矮小，體格勻稱，額骨突出，臉通常是圓的，鼻頸均短，牙床骨凸出的傾向十分顯著，胸寬而有良好的發育，身軀長，手小而美麗——這個類型幾乎發見於所有亞洲大陸東岸的島中和南部中

國，以及朝鮮半島的極西南部。牠被那稱為黑潮的熱潮向北推送，似乎是在日本主要羣島的極南部九州登陸，終於由此向北推進，克服牠的滿洲高麗的先驅者，即克服出雲的殖民。然以上三個類型沒有能視為日本最早的居民的。在他們之前有一個種族的移民似乎是於大陸和附近的羣島間還沒有造成廣大海峽的時候，從亞洲東北渡海而來。這種人即蝦夷人，通常是認為日本土著的。他們曾經佔領全國，但逐漸被滿洲高麗人和馬來人或印度納西亞人驅逐，向北方退去，一直至僅剩少數人，殘存於北方的蝦夷島為止。他們和第二第三類型一樣，是身材短而大的，但和兩者不同的地方是眉突出，髮稠密，眼圓而深陷，睫毛長而分歧，鼻垂直，臉和全身多毛。總說一句，蝦夷人對於歐洲人，比對於構成日本人口其他任何類型，表現要接近得多。然人們不要認這些不同的元素的痕跡是指明日本人種的缺乏統一性。在許多世紀的過程中已經完全形成一種融合，就是蝦夷人，現在雖有殘存的一小部分獨立生存着，然對於他們的征

服者也已經留下明白的痕跡。」（見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二卷九〇〇至九〇一頁）

別爾慈所說構成日本民族的三個類型既首先列出滿洲高麗型，自然也包括通古斯族在內，不過牠所佔的成分遠不及日本學者上面一說那樣重要，是不待言的。

(4) 相近的三說

此外，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拉岡累特 (K. S. Latourrette) 對於日本種族的分析，也和別爾慈氏大致相同。他說：

「我們對遠古人種學上所知道的還很尠，所以要去作毫厘不爽的斷定日本民族在血胤上的一切關係，卻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我們現在僅可以說，日本人的血統上受之於滿洲人，高麗人及馬來人者，最爲顯著。除了這些混合之外，尚有與蒙古人混血者，或也有與漢人混血者，還有其他一部分，尙屬無知之

數。」（見梁大鵬譯的拉圖累特日本的發展一六頁，民國二十二年商務出版）像這樣的學說不獨出現於西洋學者的著作上，即在日本學者的研究中也表現類似的意見，例如栗山周一說：

「構成現在日本民族之血統，與其說含北方民族系之成分多於南方，勿寧謂含南方民族系之成分多於北方。」（見禹貢四卷十二期四百所引栗山周一日本國史時代研究三章三節）

又濱田耕作對於這個問題說得更詳細：

「關於日本民族的人種位置，歷來議論紛歧，唯在學術上，大體已達到不可移動的結論了。日本人種是混合南方系和北方系，一如動物植物兩界那樣，這絕無可疑。屬於北方系的，是和此刻尚存在的蝦夷一樣的特徵的人種，這個人種合以南方馬來的印度納西亞族的要素，以及朝鮮與中國民族，而成爲一種混合民族；這自其爲烏國看來，是大可以有的事。」

這種人種的混合，有史以後到現在，也繼續實行着；不過大體上，蝦夷人種和南方馬來人種恐怕是很古以前就混合，而造成所謂「原日本人」(Proto-Japanese)。換言之，蝦夷之爲其基礎人種之一，是無可疑的。但是九州或西南日本，南方人種的分子較多，而在東北日本，則蝦夷的分子居多。至於韓民族及其他之混合，恐怕是在有史以前，所以我以爲「原日本人」的成立，比一部分學者所信者要古得多，大約可以溯到紀元前數百年或上千年。」(見輔仁學誌二卷二期，張我軍譯的濱田耕作自考古學上觀察東亞文明之黎明五二和五三頁)

以上四說雖不完全相同，但相差無幾，而與西村真次等所假定的三次來日的古斯族構成日本民族基調的主張，却大相懸殊。不過他們所謂馬來人，不是現在說馬來語的人種，而是『原馬來種』(Proto-Malay)，即別爾慈所謂『幾乎發見於所有亞洲大陸東岸的島中和南部中國以及朝鮮半島的極西南部』的類型。

(5) 混血的日本民族中的漢族

日本民族的成分十分複雜，上面各節已充分表現出來了。（然這只是就學者間的論證講的，至於日本民間的說法還不在內，民衆中現在最流行的一種說法是，他們爲高加索種，從林邑——即安南——方面轉入日本的。）日本的「學者」如大隈重信等在一方面雖還不願拋棄他們的統治階級是高天原降生的純粹型神奇的人種那種神話，（所謂「統治之大權在神之子孫。」——見大隈重信等著的日本開國五十年史萬有文庫本第一冊二頁）在另一方面却以此自詡，以爲「各國民衆未有混集多種之血如日本者。」（見同書同冊一二頁）或「日本爲島國，遠於大陸，具潮流氣候之便，島嶼之布置適宜，因是得聚衆多之人種，而化成之爲日本民族。大陸則不可望其如此。」（見同書同冊一五頁）

在這「多種之血」或「衆多之人種」中，漢族即居其一，這是沒有疑問的。不

適當上古時代，漢族在中國有廣大的土地可資發展，用不着成羣結隊地遠涉海洋，遷居日本羣島。後來因內部的爭鬥，政治上的壓迫，前去避難的大概也不在少數，但因年代久遠，文獻無存，也就使後人不能知道牠的真相。當日本國家成立以前，有一個所謂『銅鐸族』來到日本，有的認為即中國的苗族，有的認為出雲族，有的認為中國的秦人系，雖都沒有成爲定論，然我們不妨將最後一說介紹於此，以備將來的證驗。據栗山周一說：

『銅鐸民族之興盛時代，概以西紀前二百年前後爲中心，而上溯至西紀前四五百百年。若由此點觀之，但馬民族說和秦人說確爲最有力者。蓋小形厚手之古型銅鐸多發掘於山陰方面，漸延及於北陸，而與由出雲至半島慶州者亦有連絡。且太古時代之交通路線亦由但馬，出雲延及半島者，而模仿大陸系古墳之方墳系統，亦散在於此交通線上者。據神話傳說上，出雲系民族亦沿此交通路線漸次向近畿地方發展者。並且繁榮於奈良及平安之秦氏，當聖德太子時代已

有非常之勢力。秦氏一族之涉渡及其歸化年代，在從來之日本史上，雖皆列爲有史時代之史實，然此必爲天降民族及倭國建國以前之事實無疑。換言之，秦代滅亡，固不出西紀前二〇六年，而秦氏之大舉由半島南下，沿山陰之交通路而繁殖於近畿之中心地域者，似亦以西紀前二〇六年爲中心也。」（見禹貢四卷十二期三百所引日本闕史時代研究二章四節）

由此看來，秦氏一族來到日本，遠在日本國家成立（詳情見後）之前。當仁德天皇（崇神天皇後的第七代）時，秦氏流徙各處，天皇使人「搜索鳩集，得九十二部，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人。」（見源光國大日本史第五冊一〇七卷一七頁所引姓氏錄）可見這一集團的人數相當地多，內中也許有一部分恰如栗山周一所說，係於史前時代達到日本的。

然無論此事是否真實，漢族在日本民族中所佔的成分不多，因而所具的勢力甚小，這從此民族的體質與漢族的差異，以及仁德天皇前，「秦氏分散，不屬秦造，

臣連等恣驅使之。」（見大日本史五册一〇七卷一七頁）等事實中可以看出來，否則漢族的文化較牠族爲高，早應取得支配的地位，發生決切的影響了。

（五）日本民族的特長

我們對於漢族在日本民族中所佔的位置既略有所知，現在要問這個混血的民族到底有什麼特長？西村眞次說：

「從技術上去觀察日本人，雖不富於創造性，却有極豐富的模仿性，而且有把無論怎樣的原形也可自由改造，使適應於他們自己的生活的適應性，及培養之使其生長的可動性，所以能採用所接觸到的異種族的技術，以豐富自己的文化生活。這種性能正似通古斯族，尤其是藝術的才能頗似通古斯族裏面的黑斤族（Goldi）。」（見日本文化史概論中譯本五三頁）

每個民族雖不限定具有創造性，但必然具有模仿性，否則牠是很難生存的，所

以單具有模仿性，是很平常的事。不過日本人具有「極豐富的模仿性」，却不能不算是一種特長，因為佐野學說得對：

「烏國的日本要發展像亞利安系，印度系，中國系那樣的大文明，在客觀上爲不可能。這種國家特長於敏銳地吸收國際文明。任何民族絕不能孤立地生活着，在世界歷史上必然佔有某種地位，從原始的日本到資本主義的日本所受國外文明的影響很深。」（見佐野學日本歷史研究二七頁）

日本民族如果沒有豐富的模仿性，則原始的日本即很難吸收中國古代的文明，現代的日本也很難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而日本即使不淪爲牠國的附庸或殖民地，也決不會達到目前發展的高度。這種特長是具有創造性的漢族所感覺缺乏的。烏國的日本民族能盡量發揮牠所能有的特長，當然值得我們的注意，故特別提出來說一下。

(六) 『神國』及其起源

但在另一方面，日本好些學者因現代日本的勃興，莫明所以，遂傲然自得，自視爲神奇，而大談其神話！如黑川真賴以爲西洋人是由猿變來的，而日本人則爲神之子孫。『神之子孫』當然是超羣出衆，『神氣十足』的，所以大隈重信很自信地告訴我們說：

『日本民族其傳說與歷史苟無以翹異於同洲諸族也者，未必能發此光彩。』

『其歷史一如完璧，綿綿二千五百年以至今日，其能如是者原因雖多，試提其要，有三端焉。』第一就是『繼紹神國，久而健存！』（見大隈重信等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一冊一頁）他反覆闡揚古代的思想，以爲『惟日本以神傳之國而永健在，故稱曰至貴之邦。』『日本有古語曰「加彌那加拉麼彌哥挪希羅希眉斯窟尼」，漢譯云「惟神之國」，意謂神孫統治如神世之邦也。』（見同書同冊二和三頁）甚至於赤

裸裸地說：『日本稱曰神國。』『日本人常自信云，日本爲神國。』（同書同冊二和五百）

然我們現在要問這個所謂『神國』或『繼紹神國』的國家是怎樣起源的？

『天祖大日靈尊治高天原，是爲天照大神。天照大神之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娶高皇產靈尊女栲幡千千姬，生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天祖既命羣神，平定下土，迺使天孫降居葦原中國而爲之主，賜以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劍三種寶物，因謂之曰：「豐葦原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爾宜就而治焉，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於是瓊瓊杵尊離天磐座，降於日向高千穗峯，遂到吾田，娶大山祇女木華開邪姬，生彥火火出見尊。彥火火出見尊娶海神豐玉彥女豐玉姬，生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上世之事，年代悠遠，神異不測，總而稱之曰神代云。』（見源光國大日本史第一冊一卷二頁，

昭和三年東京出版）

這就是所謂五世地神，推而上之，還有『耦生之神』，『獨化之神』和『造化之祖』一大串，這裏用不着多說。第五世地神甚不合尊的第四子，就是所謂開國的神武天皇。他年十五立爲太子，四十五，以『西州久被王化，東土未服從』，率師東征，所向克捷；于是下令奠都于大和畝傍山東南橿原之地，年五十二，卽天皇位于橿原宮。當時爲紀元前六六〇年，卽我國周惠王十七年。

像這樣國家起源的神話，日本資產階級頭腦冬烘的學者雖還在津津樂道，（如矢野恆太三年前出版的日本國勢圖解第一頁就是『日本自天孫降臨以來，』而對於天孫的小註是『日本開國始祖天照大神之孫』。而『天照大神』的『神話』雖『至今小學孩童亦皆誦之』，（見大隈重信等日本開國五十年史第一冊六頁）但受過科學洗禮的作史者已經拋棄這種傳統的神話了。

其實我們如果把這種神話放在科學的洪爐裏面熔化一下，牠馬上就會現出原形來。上面所謂『治高天原』的『天照大神』是一個『女神』，那正是女性本位的氏

族社會中的翦影，不過被傳說把輻升到天上去神化了。自天照以後，盡是男性相承的局面，女性的權威無所表見，這當然是因那時已經轉入男性本位的民族社會。

自氏族社會崩潰後，社會的體制爲之一變，原始國家乘機出現。日本羣島的西部以至中部此項原始國家，在最初隨地都是，後來逐漸合併，大概至少形成三個系統。我們所講的是其中之一，即現今「萬世一系」的皇室所建立的國家系統。

當遷入日本羣島的北方系和南方系種族，以及其他各族經過長期的接觸，爭鬥，而逐漸混合成爲「原日本人」或大和族時，因集團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而有農業的發展；更因財富的增加，階級的發生，農業共產社會才崩潰，原始國家乃應運而生。

(七) 日本國家成立的時期問題

(1) 界線確定的困難

像這樣原始國家的出現到底在什麼時候？

這個問題比第一個問題更難解決，因為關於種族問題，有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民俗學等等的材料可資憑藉，有現存的民族可作參驗，較易着手；至于原始國家的成立，要劃出一條鴻溝，本來就有些困難，正如佐野學所說的一樣：

「日本國家于何時成立？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並不僅因文獻不足的緣故。根本理由是在從農業共產社會向原始國家的推移，並不經過所謂政治革命那樣鮮明的飛躍過程，却慢慢進行着。在私有財產制不曾確立的農業共產社會中沒有嚴格的階級的分裂，因此不會經過激烈和急劇的政治革命，即達到原始的國家。」（見日本歷史研究四五頁）

不過單是這一點，也還有辦法，因為無論如何，總有蛛絲馬跡可尋的。

這個問題最困難的一點是在日本的古代史多屬虛構，很少史實的影子，令人難于捉摸，因此日本學者對於他們國家起源的時期，遂有各種不同的推測，今特隨手邊書籍的方便，介紹數說如下：

一、野呂榮太郎以爲

『關於日本國家之紀元，實在異說紛紜，莫衷一是。或主以神武即位爲紀元（西歷前六六〇年），或主以大化革新爲紀元（西歷六四六年），其間相差至千三百餘年，當然都是難以承認的。我們以綜合並分析遺傳于今日的材料的结果，乃知欲求日本國家組織成立的端緒，大概以崇神天皇（西歷紀元前九六——二九年）至垂仁天皇（西歷紀元前二九——紀元七〇年）之頃爲相當。』

（見各國經濟史中樊仲雲譯的野呂榮太郎日本經濟史一頁，民國十八年新生命書局出版）

二、佐野學以爲

『就日本講，以日向及大和爲中心的原始國家的成立，是在紀元一世紀前後，至于征服的國家的成立可信在紀元三世紀前後。這種推測是以朝鮮和中國當時的狀況爲主要的根據，特別是以中國古代文獻的記載爲根據。』（見日本歷史研究四六頁）

三、西村眞次則根據『在滿洲的鴨綠江畔所發掘的高句麗廣開土王碑的碑銘上記載日本軍爲援助加羅，紀元三九一年渡海入朝鮮半島，與百殘（百濟）新羅作戰』的事實，認

『日本國家的成立可視爲紀元四世紀晚期，但到有外征的實力，總要相當的年數，所以其建國視爲在紀元二，三世紀之間是最妥當吧。』（見日本文化史概論中譯本九六頁）

以上三說對於日本國家起源所擬定的時期雖各有不同，而其拋棄紀元前六六〇年神武建國的主張則一致。那本來是寧樂時代的計算，自德川時代以來日本好些學者即已覺得牠的謬誤，如藤井貞幹，本居宣長和那珂通世等都認神武創業的年代應比日本書紀所載的退後六百年或六百餘年。一直到現在，這一說仍佔勢力，如野呂榮太郎宣稱：

「神武紀元大體與西歷紀元同時，則爲諸家一致的見解。」（見各國經濟史中樊仲雲譯的野呂榮太郎日本經濟史一百頁）

福田德三也說：

「神日本磐余彥尊」定居於今日大和的橿原，即皇帝位。……依久米邦武氏等新思想的大學者言，……爲耶穌紀元時代，說此較爲真實。」（見金奎光譯的福田德三日本經濟史論六頁，民國十九年上海華通書局出版）

(4) 自神武至開化九個天皇是否存在的問題

但我們以為這種辦法仍不切實際，因為神武建國的事根本不可信，即繼起的所謂綏靖，安寧，懿德，孝昭，孝安，孝靈，孝元，開化諸天皇也只有即位和崩的年，別無史實可徵，更談不到成立國家的痕跡。日本史上稱為『太平無事之世』，（見高桑駒吉日本通史九頁，大正元年東京弘道館出版）其實當時還在農業共產社會的階段，大家都度一種平等的和平凡的生活，無事可傳，故沒有留下一點傳說。

總說一句，自神武至開化九個天皇，人多疑為子虛烏有，憑空假設的。即不然，日本史上所謂『追證』（內中孝昭，孝安，孝靈，孝元完全是抄襲我國前後漢的帝號）也就不是簡單的追證，而是和我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之舉，事同一律。現在即再退一步，承認日本實有這九個天皇，那也決不是國家成立後的皇帝，而是氏族社會的酋長，和我國史書上所謂黃帝，堯帝，舜帝，沒有兩樣，這是

可以斷言的。

(5) 崇神的建國及其年代

(甲) 國家成立的特徵

但問題馬上又來了：我們既已看出日本史上有上述三種可能——尤其是第一種可能——的事，何以只有九代？因為到第十代崇神天皇時，情形便不相同了。據日史所載，崇神

「十年癸巳秋七月二十四日己酉，詔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今既禮神祇，災害悉息；然遠荒之人，未霑王化，其選羣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意。』九月九日甲午，遣大彥命于北陸，武濤川別于東海，彥五十狹芹彥命于西道，丹波道主命于丹波，命曰：『有不受教者，舉兵伐之。』既而共授印綬爲將軍，將軍始于此。及發，會武埴安彥反，與妻吾田媛欲襲帝京，即使大彥命，

彥五十狹芹彥命，彥國討之，武埴安彥，吾田媛伏誅。冬十月乙卯朔，詔萃臣曰：「反者伏誅，畿內無事，唯海外荒俗，騷動未止，四道將軍其速發。」二十二日丙子，大彥命等各赴四道。」（見源光國大日本史第一冊二卷一七至一八頁）

像這樣設置將軍，從事于內外的討討與鎮撫，已經是原始和征服國家成立的表現，或和野呂榮太郎所說的一樣：

「崇神天皇時代之派遣四道將軍，便是爲的要維持並擴充此階級「指氏（即氏上的氏人）的支配階級」的支配權所設的常備軍。」（見各國經濟史中日本經濟史二頁）

當崇神之世，疆土日見擴充，新設置十個國；到了晚年，朝鮮半島南部的任那國且遣使朝貢，這和前代的局面，迥然不同了。

還有一層，當崇神時，始校人民戶口，課男女調役，開溝洫，勸農事，造舟

船，像這樣賦稅的確立，農工業的發展，與生產力的增加，（一方是由于技術的進步，一方是由于宰制牠族和同族中其牠部分的結果。）都是前代所沒有的。

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看，我們可以斷定日本原始和征服國家的起源是在崇神時代。他在日本史上稱爲「御肇國天皇」，即含有始建國家的第一代天皇的意思；所謂神武天皇也許就是他，因輾轉相傳而化爲二人。然不管怎樣，崇神建國的事，可說沒有什麼疑問的了。

佐野學和西村真次等將日本原始和征服國家的成立劃作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並且相距甚遠。就日本各地最初出現的國家和後來大規模的征服國家講，當然有這樣的時期，不過單就現今「萬世一系」的皇室所自出的崇神講，其建立原始和征服國家的時期雖也分得開，但連接在一起，因爲當他的時代，他那一集團中原始國家的條件俱已成熟，遂建立了這種國家；後來因國力膨脹，又轉變爲征服的國家了。

（乙）年代的研究

然崇神的年代究竟相當於紀元那一個時期？日本史上關於古代諸天皇的紀年既絕對不可靠，而後來減縮六百年的主張也仍舊不合實情，所以我們必須另尋方法解決這個問題。稻葉君山贊成吉田東伍的判斷，他說到魏志并辰傳所記瀛盧國與倭接界一事，以爲

「吾人採錄此記載之際，爲考其適當之年代，則曾經文學博士吉田東伍君之推定，斷爲崇神天皇之時，與後漢靈帝之朝相當。」（見東北叢刊第十六期楊成能譯的稻葉君山滿洲發達史四頁）

所謂「靈帝之朝」是從紀元一六八年起至一八九年止，即二世紀的下半期，然那珂通世所推定的崇神時代則爲三世紀的上半期，他以爲

「崇神天皇崩歿之年爲西紀二五八年。」（見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中譯本第一冊六三頁小註）

這兩種主張到底那一種是對的？因爲文獻不足的緣故，當然也不容易確定。不

邁栗山周一曾提出一種年代的平平均計算法，很可供我們的參考，他說：

「孝安天皇在位一百二年，垂仁天皇在位一百年，應神天皇在位一百一十年，其記事年代，殊屬荒謬；惟自第十七代履中天皇以降，其所載即位年代尚屬近似。按自履中天皇至最近第一百二十三代大正天皇，共一百零七代，計一千五百二十六年，每代平均在位年數約當十四年強。」（見師大月刊十四期八九頁所引栗山周一日本闕史時代研究）

據日史所載，履中天皇元年爲紀元四〇〇年，但於宋文帝元嘉二年（紀元四二五年）遣使來中國通聘的仍是仁德天皇（所謂倭王讚），而履中元年實爲四二八年，這是星野恆，那珂通世，和吉田東伍的考證所一致承認的。所以上述每代的平均年數恰爲十四年，如依此去計算崇神至仁德天皇七代的總年數，爲九十八年，則崇神即位元年應爲三三〇年。不過這種平均法對於我們的場所並不適用，因爲這裏的代數太少，不容易得着近似的數字。查自推古天皇對隋朝遣使通聘以來，日史籍紀事

的年代和我國史籍紀事的年代處處相符，總算可靠，但我們如拿推古下一代的舒明至天武天皇七代的總年數（共五十八年）平均一下，每代為八年強。在另一方面，我們如再拿更後的後花園至後水尾天皇七代的總年數（共二〇一年）平均一下，每代為二十九年弱。兩相對比，前七個天皇在位的平均年數和後七個天皇相差三四倍之多！日史載崇神至仁德天皇共有四九六年，每代平均為七十一年弱，這雖絕對不可靠，但我們如果用真實可靠的七個天皇的平均年數去相比擬，那自然也只能採取最大的數字，這就是說，每代二十九年的數字。這樣一來，崇神元年約在紀元二二七年頃，這和那珂通世的推算相近，我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

（八）漢代交通對日本建國的影響

這樣看來，日本現今一脈相承的國家遲至我們的三國初年才建立起來。然各地原始國家的組織遠在此時以前，我們從後漢書的東夷傳關於倭人的描寫，即可見一

班。但這種國家的成立也不會早於前漢，却不是一樁偶然的事。關於這一點，日本學者也已經承認了，例如稻葉君山說：

「按之彼時之史乘，有樂浪海中倭人遣使來聘者三十餘國之記載，可見當時日本海表搖動之狀矣。此時日本之祖先遣使聘問中國者，雖有種種之意味，由吾人觀之，無非受漢人威力壓迫之所致，而因是以喚起國民之覺醒，遂促起其肇造國家之思想焉。此吾人對於武帝之經營朝鮮絕對不認其為僅從事朝鮮地方之漢人殖民也。」（見東北叢刊十六期楊成能譯的稻葉氏滿洲發達史二頁）這種說法雖看出漢武帝的經營朝鮮（詳情見第四章四項）對日本所發生的重大影響，但過於淺薄，並且犯了唯心論的毛病，因為第一，「日本之祖先遣使聘問中國」，主要的是有所希求，至於感覺「漢人威力壓迫」，實居其次；第二，「肇造國家」需要一定的條件，否則即有「漢人威力壓迫」，也無從發生這種「思想」，更談不到「肇造國家」的行動。然濱田耕作的觀察却較此深刻多了，他說：

「……西日本在王莽時代（即西紀一世紀時），大體上石器時代已經告終，因受漢文化的影響，纔能進入金屬時代文化的黎明期。這一點，不能不說是日本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劃期事件。然而漢文化是鐵器時代之物，所以縱然有銅劍等類的輸入，但是大體上，是鐵器時代的文明。所以日本和南朝鮮地方從石器時代便一躍而入鐵器時代了。」（見楊鍊譯的濱田耕作東亞文明的曙光四五至四六頁，民國二四年商務出版）

日本是因自前漢起，與中國有較密切的交通，輸入了中國進步的技術，提高了農工業的生產力，使財富增加，階級產生，然後國家乃應運而生，並不是單純地「受漢人威力壓迫」，就可以「促起其肇造國家之思想」和行動的。

（九）野蠻與文明的界線

日本國家的起源大都為中國文化輸入的結果，日本學者所宣稱的日本「因受這

漢文化的影響，……從石器時代便一躍而入鐵器時代』，正是一種忠實的報告。這一大飛躍的確是『日本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劃期事件』，也是日本和中國最初的較密切交通中最大的成績。但我們花許多篇幅，詳細探討日本國家的起源，用意還不在闡明這一點，而在確定野蠻與文明的線界。摩爾根 Lewis H. Morgan) 在他的有名的古代社會 (Ancient Society) 第一章說明政府的兩種企圖：一種是氏族的和社會的，形成一個社會；一種是政治的，形成一個國家——前者建立在個人及氏族制度上面，後者建立在領土及財產上面，第一種是古代社會政治的企圖，第二種是現代社會或文明社會的企圖。他說：

『這裏可以預先說明，一切政府形態是歸到兩種通常的企圖，所謂企圖，係用在牠的科學的意義上。這兩種企圖在基礎上是根本不同的。第一種在時代的順序中，建立在個人和純粹個人的關係上，可以區別為一個社會。氏族是這種組織的單位；……第二種建立在領土和財產上，可以區別為一個國家。政治

的社會是組織在領土的地域上，藉領土的關係而與財產及個人發生關係。……當這種企圖出現時，將和本書所認識的區別一樣，便在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間劃着一條明確的界線。」（見同書六至七頁，芝加哥出版）

日本要到後漢甚至三國時代，才『在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間劃着一條明確的界線』，牠進入文明社會，不獨比中國遲得多，並且也比朝鮮遲得多。

第三章 朝鮮半島與中日關係上

(一) 朝鮮在中日關係中所佔的重要位置

講到中日關係，朝鮮的確是一個最重要的要素，因為牠在古代是雙方連鎖中的一環，倘若沒有牠，雙方的接觸雖非不可能，但決不會有那樣容易，並且也許要延遲至若干世代。牠在中古和現代是雙方爭鬥中的導火線，倘若沒有牠，唐朝白江口之戰，明萬曆二十年之戰，清光緒甲午之戰，都不致發生；尤其是最後一次戰爭，對於雙方的國運，所關甚大。所以我們要敘述中日關係的發展，不能不時時涉及朝鮮。

還有一事在古代本來不成問題，在現代竟成爲中日許多學者聚精會神，爭奇鬥

勝的中心點，就是朝鮮半島的種族問題。牠與中日為鄰，牠的居民含有原中國人和原日本人的血統，是絕對沒有疑問的；但他們却憑這一點關係，硬將朝鮮人拉在自己的懷抱中，以為各自在過去，現在或未來支配朝鮮的理論的根據，因此將朝鮮種族的真相弄得模糊不清了。我們現在如果要談朝鮮半島與中日關係，應當首先徹底討論並解決這個問題，一則可以顯出朝鮮人的本來面目，二則可以表現雙方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別有懷抱的用心，也許由此可防止將來一些無謂的糾紛。

此外，朝鮮的情形和日本完全不同，牠有三千多年的歷史，而又建立過許多國家，即就國號而論，也變更過若干次，和日本的歷史短而由一個「萬世一系」的皇室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除掉原始國家的階段和南北朝分立一個短期的局面不計）相較，算是複雜多了。因此，我們對於朝鮮半島的歷史及其對中日兩方的關係，也應當提綱挈領地說一下，使人們對牠預先有一種大體的認識，才容易明白中日間的許多關係。

(一) 朝鮮人種之謎

朝鮮半島位於亞細亞大陸的東陲，居黃海和日本海之間，由半島的東南端，利用日本海左旋的回流，很容易達到日本，故日鮮交通遠在有史以前；而中鮮因為境域相接，交通也極早，觀於第一章三項所說的九夷，就可以知道一二。我們現在要認識朝鮮，同樣當從構成朝鮮民族的人種入手，因為牠和中日兩國是有最密切的關係。可是這個問題比我們在第二章所遇着的日本人種的問題還要困難，牠簡直是一個謎。所以佛爾 (Joseph H. Ford) 說……

「住在這個半島的民族，其來源只能出於猜測，正和日本人的來源一樣。

……」 (見佛爾高麗紀事二八頁，一九一一年倫敦出版——The Story of

Korea)

(三) 日本學者的日韓同種說

猜測或猜謎，本來是有閒的學者們最感興趣的一樁事，何況這種猜謎還帶有一種政治作用，更不能不盡力做一下。茲先從日本說起。

日本早就有日韓同種說出現，至德川時代，考古學者藤井貞以爲日本自應神天皇起，卽變爲韓種。（在此以前，他以爲是吳太伯後裔）明治以來，星野恆和久米邦武等復盛倡日韓同種說，附和的人日見增加。一直到現在，甚至於還有人借重神話，去和朝鮮人攀同宗：例如朝鮮研究會的主幹青柳南冥說：

『檀君與日本的天降神族爲同種族，曾協力經略東方，一征服熊襲蝦夷族，一征服穢貊及其他蠻族，神族所向，殆成破竹之勢，……現今的日本諸島及朝鮮半島與遼東地方悉屈服於我神族的政治之下。』（見青柳氏朝鮮四千年

史檀君朝鮮五頁，大正七年四版）

齊柳氏既從神話中找着日韓兩民族的聯繫，遂由此達到他的最得意的結論道：

『吾人現代日鮮民族間關係的形成，確係由遠祖時代即隸屬於同一神系，而今兩民族的融合，當認為數千年前遠祖的抱負所致，天運竟能致時代於古時的期望，此同系統民族的融合更當無疑，而其明顯好像遠望月之出山一樣。』
(見同書六頁)

像這樣藉「遠祖」的威靈，祝兩民族的「融合」，因而大談其「天運」，以冀達到「古時的期望」，其用心真算是「良苦」了！

(四) 中國學者的殷鮮同種說

(1) 殷起東北與箕子據朝鮮的因果

日本學者爲着證明日韓關係的密切，便自通古斯族起至神話止，想盡方法，把

兩國緊緊地綁在一起。中國學者在這一方面也就不肯示弱，因為他們提出一種殷鮮同種說，與之對峙，不獨旗鼓相當，而且說來有聲有色，至少比青柳南冥之流專乞靈於神話，大談其「神族」，「神系」的，要高明得多。現在試舉一二例如下。

自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見觀堂集林十卷）中說過商人起源於「東土」以後，附和的議論盛極一時，傅斯年且更進一步，說殷的老家原在東北。他的論證約分四項：一、根據安特生在奉天沙鍋屯發掘一穴居留遺，與河南滎池縣仰韶村所發見的相合，為「同一的民族與文化的部類」；並根據步達生對兩地人骨遺留的研究所證明的「沙鍋屯居民與仰韶居民並與今日北部中國人為一類」；二、夫餘的神話與殷相同，三、由殷商，朝鮮，肅慎等地名的核比，推知中國史的初期，渤海兩岸是一體；四、諸史所記東北部族的習俗生活等與漢人有一共同的基本成分，轉與漠北的牧族，西域的胡人，截然不同。在這幾點中他尤其着重下面的「證據」：

「殷商與東北之關係……，更有他事可以為證者，一曰毫之地望，二曰朝

鮮與箕子之故事。毫之所在，經王國維證其爲山陽郡薄縣（今山東省曹縣），其說至確，而京兆杜陵西毫之說，自不能成立。……商之起源，當在今河北北，暨於濟水入海處。湯之先世溯濟水而上，至於商丘。詩所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者，其海外當卽渤海之東，是湯之先世已據東北爲大國矣。……至於朝鮮與箕子之故事，實不啻指示吾人曰，商與東北本有一密切關係，故於喪敗之後，猶能退保遼東，而周公成王征東夷之兵力終不及也。不然，以喪敗之餘燼，焉能越遼海而王朝鮮？必其原有根基，然後可據地理的遼遠形勢以自保也。以此二事，可知商之興也，自東北來，商之亡也，向東北去。」（見傅斯年編的東北史綱第一卷古代之東北二四頁，民國二一年出版）

（2）殷與朝鮮統治階級的關係

傅斯年所謂東北主要的是指東三省，但朝鮮（當周漢時代，牠的北境包括現今

遼寧省的一部，牠的南境僅及朝鮮半島的一部分。）也包括在內。他同謂殷鮮同種僅指朝鮮的統治階級，並非鮮民全體，所以他說：「箕氏衛氏之朝鮮，統治者雖遷自中國，其大部居民中應有不少之濊貊舊族。」（見同書同卷一〇九頁）這句話好像是指統治者都遷自中國，實則不然，因為「其大部居民中」既只有「不少之濊貊舊族」，其餘一部分當為與殷同族的土著，觀於他說「所謂遼東半島者或自始便與山東半島為同一民族所居」，（見同書同卷一一〇頁）就可以知道。

（3）附和的說法與另一主張

白傅斯年此說一出，贊成與附和的大有人在。如姜亮夫在他的夏殷民族考的長文中，除掉徵引傅氏所介紹的安特生和步遠生等的報告外，並說：

「我以為朝鮮本是殷民族的分布之地，箕子是他們團體中的近於祭師的團員，而當時的遼東朝鮮半島，或者還未成深洋，其交通的道路，不必起程於山

海關一帶。」（見民族雜誌二卷一期一五四頁）

此外，衛聚賢又說：

「高麗本爲夏殷混合種的漢人。」（見學術月刊一卷二，三期合刊衛氏讀殷商民族發源地質疑後一一頁）

這樣看來，問題愈弄愈複雜了。不過主要的還是第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一經解決，第二個問題也可連帶解決。

（4）批評

（甲）商起西方的證據

我們於介紹上列的主張後，現在當進而加以詳盡的批評。要確定殷是否同種，當研究般的老家是否在東北。傅斯年指明商起東北的重要證據之一是「亳之地」在「山陽郡薄縣」，其實這是一種「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說法，殊屬謬

誤。不過我們要辨正這一點，須先從『湯之先世』說起。

史記說：『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生契，……封於商，賜姓子氏。』（見同書三卷殷本紀一頁）我們現在再來看同卷同頁的註釋：

一、『集解：『駟案 淮南子曰：『有娥在不周之北。』正義：按記云：『桀敗於有娥之墟。』有娥當在蒲州也。』

二、『集解：鄭玄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

三、『正義：『括地志云：『故子城在涇州華城縣東北八十里，蓋子姓之別邑。』』

這裏明白指出有娥，商，子城都在西方。『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

合，名曰不周。』（見山海經十六卷七頁）『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見萬有文庫本 屈原賦注一卷一一頁）所謂不周山是在崑崙山西北，可知有娥實遠在西北方，正義以爲在蒲州，未必可靠；卽退一步，承認其確實，也在今山西的西

南隅（即永濟縣），逼近陝西，仍舊是在西方，是商代發跡於西方，至爲明顯。不意王國維竟強指商爲商邱，世本居篇「契居蕃」的蕃爲前漢書地理志魯國的蕃縣，（實則闕駟早經說明，「蕃在鄭西」，而鄭本西周畿內地，在今陝西華縣境。）傅斯年依據王說，作成他的商起東北的主張，根基未免太薄弱了！

（乙） 亳的地望問題

現在再來說亳。太史公說過：

「……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見史記十五卷六國表一頁）
同書同頁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鄭樵也說：

「亳，故京兆杜縣有亳亭是也。杜城今在長安南，故司馬遷云：「禹興西羌，湯起亳也。」」（見通志四一卷都邑略二頁）

杜佑同樣告訴我們：

『成湯居西亳。』（見通典一七七卷州郡七第三頁）

史記，通志，通典一致承認湯初起時所居的亳是在西方，我們對於這一點，還可提出一種證據來，就是：

『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見四部叢刊初編尚書大傳二卷三一頁）

假使湯當時不居現今陝西的東南，而是和王國維所說的一樣，居山東的西南，他又怎能獲得漢南四十國的歸附？

既是這樣，王國維對於亳在漢之山陽郡薄縣的說法完全是錯的麼？却又不盡然。這個問題是十分複雜的。湯最初所居的雖是關中的亳，但旋因勢力膨脹，向東發展，其新都的地方，仍名爲亳。像這樣挾着地名遷徙的例子，不獨在中國史上屢見不鮮，即在西洋史上也往往如此，絕不足怪。因此，我們只要把前漢書地理志翻開來看，也可以再遇着兩個亳。即河南郡偃師下註明『尸鄉，湯所都』，（見同書二

八卷上，八頁）山陽郡薄縣下臣瓚注『湯所都』。（見同書同卷十一頁）後人因周書立政篇有『三亳阪尹』一語，遂競道『三亳』之說：有的認穀熟爲南亳，即湯都，蒙爲北亳，即景亳，湯所受命，偃師爲西亳，盤庚所徙（皇甫謐）；有的認湯立景亳於偃師，建爲帝都，建東亳於商邱，仍西亳於商州（魏源）。但把這兩說合併來看，已經不是『三亳』，而是五亳了！我們這裏的任務不在詳細考證這些亳（並且材料也不夠），只在指出，湯即使都過『漢之山陽郡薄縣』，也不過是向東發展後一個時期的事。不意傅斯年僅根據這一偏的事實，劇然斷定商起東北，並宣布『京兆杜陵西亳之說，自不能成立』，不知道他何以如此武斷？

（丙）『海外有截』的海的問題

他又把海外解作『渤海之東』，尤覺牽強，因爲古代的地理知識不正確，以爲中國四境都有海環繞，故動稱『四海』，如他所引的長發上面一章的玄鳥即有『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的話。又如我們在第一章所引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

謂之四海。」以及管仲對齊桓公所說的

「西海致比翼之鳥。」（見前漢書二五卷上郊祀志三頁）

司馬錯勸秦惠王伐蜀所說的

「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見戰國策上册秦策二四頁）

試問這些「海」何嘗是什麼真正的汪洋大海？我們現在再回到本問題上去。「湯之先世」與西方的關係前面已經簡單說過。後來「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見周易注疏十卷二十頁）穆公述文王斥責殷商，也說「內爨於中國，覃及鬼方。」（見毛詩注疏二五卷六頁）後書，通典和通考都認鬼方爲西戎。可見商和西方實有許多關係，所謂「海外有截」，與其強指爲「渤海之東」，不如指爲「西海」或「西海」一帶，較爲妥貼。現在即退一步，承認是指「渤海之東」，也不能作商起東北的證據。

（丁）箕子在朝鮮的「原有根基」是什麼？

傅斯年因箕子「王朝鮮」，便以爲他「原有根基」，這不獨是一句沒有證據的空話，並且也不合邏輯，因爲一種勢力被另一種較強大的勢力驅走，侵入一個抵抗力薄弱的區域以自保，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事，用不着「原有根基」，才辦得到。例如周太王之子太伯因避季歷，

「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見史記三一卷吳太伯世家一頁）

試問太伯在這種「斷髮文身」和「南蠻鴉舌之人」的異族中有什麼「根基」，何以能爲之君長？太伯君臨荊蠻，固然遠不及箕子君臨朝鮮的規模廣大，然他是在承平之時，箕子則於喪亂之餘，挾五千人同往與殷族素有往來並向來慕化的東夷，（詳情見後）何求而不得？要說「原有根基」，根基卽在於此。至於把這句話憑白解作同種，那是令人不可思議的！倘若真是這樣，人們也可以說：周與荊蠻爲同族，周之興也，自東南來，周之窮也，向東南去。可是沒有人能夠這樣大胆主張。由此可

見傅斯年商起東北的另一重要證據也是不能成立的。

(戊) 北燕朝鮮的方言區與髮飾之別

然傅斯年是在竭九牛二虎之力，形成這一主張，所以證據還多着呢，不過時代較晚一些罷了。尤其是方言一書，他認為『最要之材料』，書中將北燕朝鮮列為一個方言區域，據他的意見，

『朝鮮洌水間，就人民論，久爲諸夏，故周漢輶軒使者得以之與中原舊國並論，若徒然于武昭後始移民，不能立成此一特殊之方言區也。』（見東北史綱一卷古代之東北三一至三二頁）

其次另一種最重要的材料是：

『古代人最重髮飾，髮飾之別，竟是民族之別。中國人束髮加冠，南蠻斷髮文身，北狄被髮左衽。此一分布之形勢，在古代東北若合符然。最北之挹婁人，編髮者也，中間之夫餘，句驪，濊貊，用弁或幘，明其與中國大同。其南

部之韓族，則「魁頭露紒」。……然則雖不編髮，亦非弁冠，此事可供分別民族之資。」（見同書同卷一一六頁）

「髮飾」既「竟是民族之別」，而「夫餘，句驪，濊貊用弁或幘，明其與中國大同」，傅斯年說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難道他真的認那些用弁或幘的「夫餘，句驪，濊貊」人都是中國人，或大部分是中國人？這不獨在殷代絕不是那麼一回事，即在漢以後也仍舊如此。因為東漢的王充說過：

「巴蜀越嶲，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見論衡下冊核蜀篇九一頁）

遼東是傅斯年所認為「或自始便與山東半島為同一民族所居」的，樂浪在朝鮮半島的西北，也是他所認為殷族「原有根基」的地方，然王充這幾句話把他所謂「朝鮮列水間，就人民論，久為諸夏」，或「朝鮮境內，並其東邊，……其本體之說中國語，當久在武帝之前」，（見東北史綱一卷三二頁）以及「夫餘，句驪，濊貊」在

古代『與中國大同』等等說法打得粉碎！

(己) 沙鍋屯居民與朝鮮居民的關係

總觀以上各節，可知傅斯年對於殷鮮同種所提出的主要證據或「最重要之材料」，都不能成立。至於其餘的議論，更值不得一顧，因為從沙鍋屯與仰韶村的居民屬於同一族的論據（據八幡一郎說，仰韶與沙鍋屯文化「有點使人懷疑，……含有很多的異質的原素。」——見禹貢七卷五期朝陽附近之新石器時代遺跡一八頁）中作不出商起東北的結論。現在即退一步，假定沙鍋屯的居民就是商民族，然牠未曾分佈於朝鮮，恰和牠未曾分佈於現今的黑熱之北一樣，（就目前考古學所獲得的成績講，那一帶是北方系——即塞克提亞系（*Scythian*）——的文化）我們上面所舉的證據固明白表現朝鮮遲至周代，在言語和習俗上猶與華夏不同，殷族既起於東北，以如此密邇比鄰，竟有這樣大的差異，試問有何理由硬說殷鮮同種？

(庚) 殷商神話與夫餘神話的關係

再就神話來研究，傅斯年首先用很大的排場告訴人們說：「神話之比較研究，乃近代治民族分合問題者一大利器。例如猶太民族，方言尙有差異，其齊一處反在其創世神話；又如希臘羅馬同爲印度歐羅巴民族西南支派，其關係之密切，可以其全神系統證之。中國東北歷代各部落之「人降論」，見於朱蒙天女等傳說者，分析之雖成數種傳說，比較之却是一個神話。」（見東北史綱第一卷一四頁）他於是詳列這種神話和商神話的材料，以資對比，並總結道：

「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之故事既明，然後持此故事以與本節所引朱蒙天女等傳說比較，其爲一個神話，更無可疑。此一線索真明白指示吾人，商之始業與秦漢以來之東北部落導於一源，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觸與混合也。」（見同書同卷二三至二四頁）

傅斯年用這樣大的氣力，找出夫餘（東北其餘部分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內）與殷商間的一線索，遂作成雙方「導於一源」的結論，這就是說，殷鮮實爲同一種

類。我們以為他此舉是太急性了。因為兩個集團的神話相同或相類似，固然可作同種類的證據，但有時又不過是一方抄襲地方的頑意見，絕非什麼「導於一源」。例如朝鮮始祖檀君降生的神話與印度佛教始祖佛陀降生的神話絕相似，我們能說朝鮮人所謂「神檀民族」（即貉族，詳見後）和佛陀所屬的雅利安族是「導於一源」麼？當然不能。朝鮮這種神話是佛教入朝鮮以後，受了佛陀在無憂樹下降生說的影響才產生出來的。（參看本書第四章一項）同樣，夫餘朱蒙的神話也是箕子入朝鮮以後，受了殷商神話的影響才出現的。傅斯年絲毫不顧及這種事實，竟咬定神話相同為雙方「導於一源」的證據，也未免太鹵莽了。

然他並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他於作過那樣的結論之後，實在有點心虛，所以很乖巧地補上一句「至少亦是文化之深切接觸與混合也」！單就朝鮮而論，他的真意如果只在這句話上，那就用不着大吹大擂，搬出如許證據，因為我們的史書上早已明白宣佈朝鮮對於殷文化的「深切接觸與混合」。（參着下面五項第一目甲）窺其

用意，這只是一句陪襯詞話，預備將來爲自己辯護用的，至於主旨所在，還是那種自欺欺人的雙方『導於一源』的結論。這不是『作僞心勞日拙』麼？

(辛) 結論

我們對於傅斯年般鮮同種的主張及其所提出的證據，已經詳細批評過，現在總說一句：他雖自認其主張

『係近代科學尋求所供給吾等之知識，有物質之證明，非揣測之論斷。』
(見東北史綱一卷二五頁)

但在實際上却恰恰相反，這是百分之百的『揣測之論斷』！般鮮同種說的虛偽，與日韓同種說沒有兩樣，我們不能因爲牠是戴着『近代科學尋求』面具的國產，而稍加寬恕，反之，正因爲牠是道地的國產，我們才不惜花費這許多篇幅，加以指摘，在一方面，免得國內少數『名高望重』的學者再入歧途，枉費氣力地向牛角尖上鑽；在另一方面，使一般讀者不致震於東北史綱作者們的大名，輕易地接受他們的

也許不無作用的意見。（按東北史綱的作者共有五人，即第一卷古代之東北也有李濟余遜參加著作。）

末了，傅斯年的主張既不能成立，和他『同一鼻孔出氣』，不過說得更明白些的姜亮夫的話自然也是如此。（傅氏在古代之東北中雖從沒有明白宣佈殷鮮同種，但他種種舉證的用意，無不在這一點上，他不似姜氏那樣痛痛快快說出來，不知其意何居？）即衛聚賢的說法也同樣沒有根據，不過關於衛氏的，我們要在下面一項第一目中才予以答覆。

（五）試解朝鮮人種之謎

（1）殷與東夷的問題

（甲）殷屬東夷的主張及其駁議

我們既已在消極方面證明傅斯年等主張的錯誤，現在應在積極方面力求解決朝鮮的種族問題。不過這裏仍舊要涉及殷族，因為朝鮮人屬於東夷，而中國許多學者雖不輕信殷鮮同種說，但認殷族也同樣屬於東夷，我們先要將這個問題弄明白，才能夠切實解決朝鮮的種族問題。林惠祥在他的中國民族史中對於殷族首先敘述時人的意見而加以按語道：

『孟子言舜，東夷之人也，今人推得舜爲殷人之祖，殷人爲東夷，興於東方，而殷亡後箕子東走朝鮮，朝鮮亦爲殷民族所居云。……按殷爲東夷之說，證據頗多。太誓之「受有億兆夷人」一語甚爲明顯。至於殷人與朝鮮民族之關係，則證據尙未充分。」（見林氏中國民族史上册八五頁，民國二五年商務出版）

我以爲這種說法完全不對。孟子注疏中的注稱：「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見同書八卷上，一頁）這是對的，否則便講不通了。因爲當殷周

之際，殷的文化較周爲高，傅斯年並且說：「謂殷商爲中國文化之正統，殷遺民爲中國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見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附錄一，傅氏周東封與殷遺民八九頁）「中國文化之正統」與「重心」均操在東夷的手中，華夷的現象這樣倒置，試問有無此情理？

豈止於此。孟子又說過：

「文王，西夷之人也。」（見孟子注疏八卷上一頁）

如果也照時人的解釋，則殷周兩族同屬夷種，而孔子自稱爲「殷人」，（見禮記注疏七卷檀弓上一四頁）竟高唱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見左傳注疏五六卷三頁）

孟子在答公都子的問話中竟贊美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見孟子注疏六卷下，滕文公下六頁）

這不獨是忘却祖宗的本來面目，而且也沒有意義，因爲中國遍地是夷，根本無所謂

華夏，（因此，林惠祥的中國民族史所首先標出的華夏系，自然也是錯誤的！）也無所謂後來的漢族；雙方的爭鬥至多不過是夷攻夷，夷制夷的同種相殘的悲喜劇，值不得大吹大擂來誇耀的！試問這是不是和當時的實際情形相符？！

至於引「受有億兆夷人」一語作為殷屬東夷的證據，也同樣謬誤。我們應當注意，這是秦誓中的一句話，而秦誓上的一句是「受有臣億萬」，這一句是指殷族的人，前一句是指素來和殷族接近，此時陷於同一命運，因而願為牠的後盾的東夷。孟子稱「周公和武王，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奄固然屬東夷，就是這五十國中有許多屬東夷，也是絲毫沒有問題的。在另一方面，我們來看牧誓，武王所謂「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獫，狁，微，盧，彭，濮人」，這裏「及」字以上是指同族的人，「及」字以下是指西南夷。這樣對比一下，就知道殷周兩族是招致了牠們各自接近的東北夷和西南夷來決一死戰。又逸周書明堂篇稱「周公和武王伐紂夷，定天下，」這是

對紂一種醜詆之詞，恰和同書商誓所謂「命子小子肆我殷戎」，詆殷爲戎一樣。
(周書康誥則稱「殪戎殷」，而大誥則詆爲「蠢殷」。)但人們如果要拘執字義，說「紂夷」又是殷屬東夷的證據，那麼，「殷戎」便是殷屬西戎的證據，是殷又屬西戎。這不獨在實際上絕不如此，並且也和所謂殷屬東夷的說法相抵觸了！

可是懷有成見的人們，無論如何，總有法子把殷和東夷拉在一起，例如傅斯年又說：

「中國人對漠南游牧族自始少同情，而戎狄胡虜，皆成醜字醜詞，獨于東夷，名之曰仁人，稱之曰君子，班陳謝范，異口同詞。如非同類，決無是言。是則中國人自覺與東夷爲一類，歷殷周秦漢而然。」（見東北史綱一卷一四頁）

像這樣淺薄的議論也拿來做中國人——這就是說，殷族——與東夷爲同類的證據，真有些令人驚訝！「班陳謝范，異口同詞」稱贊東夷，正因其肯接受箕子的教

化，所以班固於敘述此事之後，總結一句道：

「可貴哉，仁賢之化也！」（見前漢書二八卷下，一四頁）

范曄說得尤爲明白：

「昔箕子遠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見後漢書一一五卷六頁）

這裏明白表見他們的同情東夷，實因其能中國化，所謂「夷而進于中國也」，至于「中國人自覺與東夷爲一類」的主張，連影子也看不見一點！

（乙）周出于西戎的學說及其批評

這裏所談的是殷與東夷的問題，就題目看，不應當扯到周與西戎上去。不過我們知道構成漢族的主要分子是殷周二族，周如果是出自西戎，證實了孟子所說的「文王，西夷之人也」那句話，也就連帶證實了他的「舜，東夷之人也」一句話，

而殷鮮同種或同系的主張仍舊成立，所以我們不得不把和牠對峙的一個問題，在此連帶討論一下，我們的理由如果能夠否定此一問題，則我們在前面的說法便愈加牢固而不可破了。

專門研究史地的大名鼎鼎的顧頡剛于一年前在九州之戎與戎禹一文中高唱「華戎一家」論，恰與傅斯年等的殷鮮一源，或林惠祥等的殷鮮同系，遙遙相對，真是無獨有偶。我們的所謂華夏系或漢族就這樣由他們分配給東夷與西戎，至少說得上一句平均公道！據顧氏在那篇論文的結論中說：

「……由戎之宗神禹，演化而爲全土共戴之神禹，更演化而爲三代之首君。州與嶽隨民族之疆域之擴大而擴大，「禹迹」又隨州與嶽之擴大而擴大；此皆向所視爲純粹之華文化者，而一經探討，乃胥出于戎文化。且姬姜者向所視爲華族中心者也，禹，稷，伯夷者，向所視爲創造華族文化者也，今日探討之結果，乃無一不出于戎，是則古代戎族文化固自有其粲然可觀者在，……夫

戎與華本出一家，以其握有中原之政權與否，乃析分爲二。」（見禹貢七卷六七合期九二至九三頁）

這裏所謂「華戎一家」實在是華出于戎，並且是從有史以後的禹起，爲期至爲短促，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開始批評了。

所謂「華戎一家」，就遠古講，也許可能，因爲人類本出一源，何況黃種中的各支族。不過關於華戎在遠古的狀況，我們既還沒有從地下的發掘找出何種證據，可加以比較，自然無從談起。（關於殷鮮或殷與東夷在遠古的情形也是如此）至于有史以後，尤其是禹以後，華出于戎一事，實不可能。怎樣見得呢？

周與西戎風俗習慣，言語飲食，都不相同，王制篇說：

「西方曰戎，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意，通其欲，……西方曰狄。」（見禮記注疏十二卷三十頁）

就是遲至春秋時代，這種狀況仍沒有改變，所以戎子駒支于襄公十四年對范宣子

說：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見左傳注疏三

二卷十二頁）

像這樣的差異，真不是一個短時期內所能造成的，試參看世界人種出現時期的久遠，就可以推知一二。

查白種和黑種的出現約在二萬五千年前，黃種形成的時期雖未經考定，然其或遲或早，總不會相距過遠。黃種向各處分佈，因環境的關係，再分成言語習俗各不相同的若干支族，固然是二萬五千年以後的事，但其進程必然遲緩而長久，決不是一千年上下所能辦到的；其彼此間的距離也必定相當地遠，決不是境域相接所能形成的。不幸自禹至周，不過千年，在如此短促的期間內，竟由一個唯一的祖先發生支族，就地域講，是密邇比鄰，就原因講，是以「握有中原之政權與否，乃析分為二」，以致彼此言語不同，習俗各別——我想就是一個稍有科學常識的中學生也不

會相信這樣魔術式的奇蹟！以極端疑古的一派人，爲着「毋再牽纏于不平等之眼光」，（引顧頡剛語，見禹貢七卷六七合期九三頁）或和童書業贊頌馬培棠的「三代民族東遷考略」所說的一樣，「打破舊日狹隘的種族觀念」，或「根本摧毀……舊日狹隘的夷夏觀念」，（見同書同期二頁）便不惜輕信古人無稽之談，高唱有史以後的「華戎一家」論，不，高唱禹以後的華出于戎的學說，這真是過渡時代的中國學者的特色！

（丙）結論

我們既已指出禹以後的華出于戎的學說完全是沒有科學常識的信口開河，現在回轉來講殷與東夷的關係。王制篇同樣告訴我們說：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意，通其欲，東方曰寄。」（見禮記注疏十二卷三十頁）

關於東夷的，還可參照我們在本章四項第四目戊所引王充的話。此外，遲至後

漢，漢族和東夷的交通，猶是

「眇眇偏譯。」（見後漢書一一五卷六頁）

卽在三國時代，猶有賴于

「譯人傳辭。」（見三國志魏志三十卷五頁）

這樣看起來，殷與東夷的風俗習慣，言語飲食的不同，恰和周與西戎一樣，所以殷與東夷沒有淵源，也恰和周與西戎一樣。這樣的對比，不獨使我們的問題愈增顯明，同時對於衛聚賢「高麗本爲夏殷混合種的漢人」的主張，也給予一種確切否定的答覆了。

在另一方面，史記，世本和帝繫姓均認殷周同出帝嚳之後，此事固然不可信；在短短的幾百年內，由一個祖宗繁殖下來，成爲兩大集團的人口，就當時遲緩的人口生殖率看，是絕對不可能的。可是殷周非異類，似乎沒有疑義；因爲就文字講，只有演變上的不同，就習俗講，也沒有表見絕大的差異，總說一句，我們至今還沒

有發見牠們在風俗習慣，言語飲食上，有和東夷及西戎那樣大的區別，因此很難說牠們不是出于共同的祖先。

殷周既應有一共同的祖先，而古籍上也告訴我們，原有這麼一個人——帝嚳。不過時代太近，有些不像，否則牠們除掉天然的繁殖外，應有其牠方法，吸收異族的人口，（如在戰爭中獲得俘虜，使爲奴隸之類）擴大自己的集團。學者們不注意這些事項，却貿然宣佈殷周原屬東夷與西戎，而東夷西戎原各有很高的文化。也許如此。不過最奇怪的是，東夷一經產生殷族，西戎一經產生周族，自己就變成老父老母，表見退化的樣子，至少是沒有進步，而子孫們却很快地文明起來了！這還不要緊，可以「世界進化，後勝于前」，或「中原得天獨厚，適于發展」爲解。最奇怪的是，子孫們與老父老母——也許應當說老祖宗——爲鄰，甚至于雜居一起，並且不斷地交通着，而古代的人又是以最富于保守性見稱的，在短短的幾百年或千年間，竟變得習俗不同，言語各別，以致子孫們要和老祖宗打交道，須先請好翻譯

員！雖則傅斯年知道此事不妙，極力說明雙方本是一家，可以直接談話，有北燕朝的方言區爲證。但生在一千九百年前的王充偏偏『不識相』，預先負責證明『沒有的事！』（因爲那種方言區只是就少數自中國移居朝鮮的原中國人講的。）這種『遼古炮製』的老巴掌，打在人們的臉上，不會不痛的呀。『不要緊啊。』既是這樣，我們也無話可說，只能叫一聲奇怪奇怪真奇怪！

像上面的疑問，我們想來想去，總想不通。愚笨的我們只能根據史實這樣想：就前面所提起的東夷，殷，周，和西戎講，東夷有一種來源，殷周共有一種來源，西戎也有一種來源，到了周秦之際，雖漸次合流，但牠們決非『導于一源』！

末了，我們還要來一點餘興，以便附帶作一種聲明。本書第二章四項第一目曾徵引木宮泰彥的話，宣佈『漢人思想，每喜謂四方夷狄之祖先，與己等同族。』這是古代漢人的老花樣，現在花樣翻新，恰恰趨向一種相反的主張，可以說『漢人思想，每喜謂東夷西戎之祖先，爲己等種族所自出！』子孫們敢這樣和老祖宗對抗，

恐怕古板的祖宗要氣得不來享受他們的「冷豬肉」了！

不過我們嚴厲批評殷屬東夷，周出西戎的主張，並不是「牽纏于不平等之眼光」，或「牢守春秋時人之成見，蔑視其人爲顛蒙僂昧之流。」（引顧頡剛語，見禹貢七卷六七合期九三頁）因而「數典忘祖」，否認我們的本源。「好漢不怕出身低，」東夷西戎如果真是漢族的祖宗的話，我們當坦然自承，有什麼可拒絕的理由？生物學家已經證明人是由人猿進化而來的，東夷西戎已經是人，比人猿進化多了，有什麼可羞辱的地方？當此科學昌明的時代，已經不容許我們開倒車，自詡爲「神明華胄」，而蔑視牠族的「出身微賤」，像明治的史家黑川真賴那樣鬧笑話！（參看第二章六項）將來如因地下的發掘，找出確切的證據，證明東夷與西戎是我們的老祖宗，我當然毫不遲疑地接受真理，拋棄自己的主張。不過像現在那樣東挪西扯，似是而非的議論，實在與歷史常識及科學常識不相容，故不得不盡力加以駁斥。

(2) 貉爲東夷中的重要種族

可是殷族雖絕對不屬東夷，却因境域接近的關係，和東夷有最密切的接觸。不獨殷墟的發掘發見大宗鹹水貝以及鯨魚骨等等，爲殷與濱海東夷交易的證據，而殷周大戰中，紂得東夷的幫助，殷亡，箕子又去朝鮮，是殷與海內外東夷的關係密切，尤爲顯明。

在東夷中貉族（又稱爲濊貉，或單稱濊，濊也作蕨或穢，又稱爲貊）是一個重要分子，遲至周代，仍居留于渤海沿岸和中國的北方，所以我們的古籍上時常涉及牠，試舉數例如下：

一、『至于海邦，淮夷蠻貊。』（見毛詩注疏二九卷魯頌闕宮三五頁）

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見同書二五卷大

三、「北至于孤竹，山戎，濊貉。」（見管子八卷小匡篇四頁）

四、「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見史記一一〇卷匈奴列傳

二頁）

五、「燕北迫蠻貉。」（見同書三四卷燕召公世家四頁）

據正義對於第二項的註釋說：

「以經說貉，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方所獲，」是貉者東夷之種，而分居于北；故於此時貉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貉，莫不率從，」是于魯僖之時，貉近魯也。至于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于并州之北，無復貉種。」（見毛詩注疏二五卷八三頁）

這裏明白表現貉族屬東夷，而又曾居山東河北沿海一帶及其北部。牠在東北諸族中是首先傳播中國文化的。孟子說：

「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饗，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見孟子注疏十二卷下，告子下，九頁）

這樣拿中國的文物和貉去比較，自然使牠表現非常落後，但和北方的遊牧民族比較，牠已達到農耕，算是很進步的了。

(3) 貉爲朝鮮的土著

貉族不獨蔓延于中國沿海的東北部和北方，並且也是古朝鮮的基本居民。時人因爲周秦時代貉族逐漸向東北遷徙，遂認朝鮮的貉族就是原居中國的貉族，例如蒙文通說：

『殷周間事，惟知有肅慎，朝鮮，不聞有他國。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地，則前世無此三國，而朝鮮，挹婁境相接可知也。於後朝鮮，挹婁之間突有

三國，攘朝鮮地而居之，是諸國皆後自外來也。……夫餘，句驪，濊貊……沃沮……皆徙自中國之北，而漸居挹婁朝鮮之間者也。」（見禹貢七卷六七合期蒙文通古代民族移徙考三四至三五頁）

此外，馮家昇在原始時代之東北一文中也認「原始東北無貊與濊慎」，他以為「漢魏文獻之夫餘，高句驪，沃沮，總稱曰貊，此貊亦即秦漢以前之貊或貉。」（見同書六卷三四合期二二頁）

我以為這種說法不大可靠，只有一極小部分是真實的。因為箕子走朝鮮時，該處已有居民，這種居民既非中國學者所主張的般的同族，也非日本學者所謂通古斯族（詳情見後），而是原居中國東海濱和北方的貉族的同族。至于在中國的貉族必有一部分早與原中國人同化，仍留在中國，（律以後來「秦併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見後漢書一一五卷東夷傳一頁——的例子，此事是無可置疑的）僅有一部分因被壓迫而逐漸遷入朝鮮，依附其同族。如認兩漢時所建立的夫餘，句驪，

濊貊，沃沮等國的貉族『皆徙自中國之北』，便完全錯誤。否則箕子所佔領的只是一種沒有人煙的荒地，而後漢書講到朝鮮，也不應當說：

『東夷悉皆土著。』（見同書一一五卷東夷傳三頁）

不過關於這種土著的記載，朝鮮的史籍，很少可用的材料。我們在第一章三項引用神檀民史所說的九夷，其來源雖仍爲中籍，但是自行加以整理的，牠稱這些九夷定居於朝鮮一帶，還在伏羲之前，也許有幾分可信。但此書前面所列的民族系表，將朝鮮半島所有的各族統括在倍達族之下，表見極其紛亂。其實所謂倍達族就是披上神衣的貉族。關於這一族在上古的史料極少發見，我們現在只能將漢以來的史書所紀，撮要介紹如下。

一、『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

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見後漢書一一五卷東夷傳二頁）『其印

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見三國志魏志三十

卷五百

二、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見後漢書一一五卷三頁）

三、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見同書同卷同頁）

四、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又有北沃沮，……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見同書同卷四頁）

五、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蒼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見同書同卷同頁）

據以上五項看來，所有夫餘，高句驪，句驪，東沃沮，北沃沮，南沃沮，和濊

等均係同種，即均屬貉族，而其定居是遠在箕子去朝鮮之前，所以同書又說：

『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見同書同卷同頁）

倘若沒有這個貉族爲朝鮮的土著，箕子之教便沒有對象，無從實施，所以我們說貉族在箕子之前即爲朝鮮的土著，並不是自周以來，完全由中國的東北方遷入的。

(4) 東夷的種屬問題

講到東夷的種屬問題，又是很麻煩的，王桐齡的中國民族史固認東夷的族屬不明，卽林惠祥也說：

『東夷之種屬至今未明，貉之住地既與夷接近，在種族上不知有無關係？在古史上亦以貉屬東夷，卽廣義之東夷，正確言之，固不能卽目爲同類，然由間接推之，似亦有關係可言。』（見林氏中國民族史上冊八五頁）

其實中國古代對於異族的區分非常紛亂，有的並不從種族上着眼，僅從方位上着眼，對於東夷，也是如此。凡在東方的異族，不論人種是否相同或相近，均被稱為東夷。如貉族曾居中國北部的東海濱，故說文羊部有「東方貉從豸」的話，至於朝鮮為貉族定居的大本營，我們的史籍將朝鮮列入東夷中，尤為顯明。東夷既不止包含一個種族，也不是一個民族，現在要問貉族到底屬於什麼種族？

這個問題在中國似乎還沒有人提出過，我們現在因史料的缺乏，要想得到一種滿意的解答，自然也十分困難。不過斯密特（P. P. Schmidt）和達爾科里塞衛慈（J. D. Tallo-Hyppowicz）都說東三省一帶最初為古亞細亞人（Palaeoasiatics）所居，這和朝鮮史籍傳說的小海以南為九夷在遠古時的根據地頗相符。又據謝斐科講斐夫北中國的人類學一書所載，當紀元前四千年頃，東亞方面有第一次的人種大遷徙，紀元前二千年頃有第二次的人種大遷徙，紀元一至四世紀有第三次的人種大遷徙，在第一次大遷徙之前，揚子江北岸沿海一帶一直達到朝鮮半島和東三省以及貝

加爾湖至東海濱，均爲古亞細亞人所居，在第二第三次人種大遷徙的時候，中國揚子江北岸沿海一帶已經沒有這種人的踪跡，但朝鮮半島則始終爲他們的居留地，（參看同書一〇九，一一一和一一三頁）這種說法如果真實可靠，則所謂貉族當然就是古亞細亞人。雖則就中國的貉族而論，與史實不符，然這是作者的考核不精，不足爲病。可是我現在對於所謂古亞細亞人不能獲得較多的材料，難下最終的判斷，故僅備一說于此。

除掉貉族外，東夷中還有通古斯族，牠也是構成朝鮮民族的一分子。據謝婁科溝婁夫說，這一族在第一次人種大遷徙之時，是被原中國人從黃河與揚子江下游驅向東北走，在第二次人種大遷徙時復被原中國人驅向西北走，不過有一部分始終留在東三省一帶，（參看北中國的人類學一〇九，一一一，和一一三頁）即所謂北通古斯和南通古斯。查夫餘的東北有肅慎，就是這個南通古斯族所建立的，後來又另立名稱，據後漢書說：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自漢興以來，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便乘船，好寇盜，隣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紀綱者也。」（見同書一一五卷東夷傳二至三頁）

依照謝婁科 溝婁夫 北中國的人類學所刊的三幅人種遷徙圖看，南通古斯族雖逗留在東三省一帶，却始終沒有侵入朝鮮，證以肅慎，挹婁的建國都在朝鮮的東北，自漢以來臣屬夫餘，而種衆又少，則通古斯族雖構成朝鮮民族的一分子，並不佔重要位置，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學者宣稱通古斯族於紀元前一二〇〇和六〇〇年頃兩次由朝鮮渡日，是有些不可靠了。

此外，朝鮮半島的南部，古爲三韓國，除掉一部分中國人（尤其秦人）和日本人外，多爲原馬來人。

以上貉族，通古斯族和原馬來人都是組成朝鮮民族的主要成分，統稱為東夷。又日本人和琉球人也同樣在東夷之列，可見所謂東夷既不止包含一個種族，也不止包含一個民族，實在是很龐雜的了。

(六) 朝鮮民族體質上的特點

構成朝鮮民族的各族既如上所述，我們現在對於這個民族在人種學上異於中日兩民族的特點應當說一下，藉以表現牠和兩者不同的地方。關於這種特點的描寫，只有郎佛爾比較正確，雖則他對於所謂「來自滿洲和滿洲以外」的「北方人」，沒有指明係何種人，未必和我們所說的相符，然也不限定一定有什麼衝突的地方。據他說：

「在耶穌紀元之前，半島漢江以南的人口在言語，風俗，德育和體育的特徵上，與漢江以北的人口各不相同。在南方的人口……原來是由馬來羣島出發

的，而北方人則沒有疑義地來自滿洲和滿洲以外。南北兩方的人在時代的進程中參入大量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血統，大羣的中國移民於耶穌紀元前後的幾世紀中因自己國內的紛亂，擁入這個國中，同時日本人在南方一巨大的部分建立了永久的居留地。在以後的時代中，巨大數目的各級高麗人移居日本，將他們自己的血注入日本的上等和下等階級中。中國和日本對於高麗人民無論發生了怎樣體質上的影響，但不能阻止他們保持很顯明的相貌上的特點，這些特點使他們顯然不同於中日兩國的人民，中，日，韓人雖都具有高顴骨，斜眼睛和褐色皮膚這些蒙古種的特點，但凡知道這三種人的人，不會把一個高麗人當作中國人或日本人。在另一方面，高麗人的鼻子却沒有日本人那樣塌，而日本下等階級中常見的掀鼻孔，在高麗也很少發見。高麗人的身材較日本人為高，男子平均的高度為五呎四吋，通常具有較優良的體格，不捲曲的黑髮在中國人和日本人中十分普遍，但在高麗有時變成近於褐色，甚至近於一種較淺的顏色；高麗

人的手足較小，而其容貌表現所指出的智慧，較高於中國人或日本人。……鬚鬚是普遍的，高麗人在這一方面對於中國人或日本人剃得光光的面孔，也表現一種顯著的對抗。」（見佛爾高麗紀事三〇頁）

根據我們上面所描寫的朝鮮半島及其東北的各族，再參照佛爾這裏所說的朝鮮民族的特點，便知道牠的組成分子，既與中日兩民族的各不相同，而牠的體質上的特點，也與兩者大有差異。所以兩方對於牠的統治，無論在過去或現在，既沒有消滅牠的特質，使與任何一方面同化，此後也就不能藉口於虛偽的同種說去宰制朝鮮，剝奪牠的自由與獨立的機會。這是我們這一章所探討的最正確的結論，應當在這裏鄭重聲明的。

第四章 朝鮮半島與中日關係下

(一) 檀君的朝鮮

我們對於中日雙方所爭執的朝鮮半島的種族問題既在上面一章獲得一種相當的解決，現在便要進而敘述牠的簡單的歷史和牠對雙方的關係了。

據徐居世等的東國通鑑所載，東方初無君長，有神人降於太白山的檀木下，國人擁立爲大君主，是爲檀君，國號朝鮮，時爲唐堯戊辰歲；（堯卽位的二十五年）初都平壤，後徙都白岳，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爲神。又據古記說，檀君御國一千餘年，周武王卽位，己卯，封箕子於朝鮮，檀君便移居唐藏京，後還隱於阿斯達山爲神，壽至一千零四十八歲。

此外，關於檀君還有種種不同的紀載，大概不脫神話的色彩。林泰輔以為這種神話是『後世佛教家附會之辭』，（見陳清泉譯的林泰輔朝鮮通史三頁，民國二十三年商務出版）確有理由，因為所謂有神降於檀木下，是仿照佛陀降生於無憂樹下的故事編成的。然認此為氏族社會會長傳說的轉變，當更無疑義。自此以後，沒有史實可徵，金暉中所謂『吾邦自檀檀以來，迄於羅季，上下數千年，事多闕略，文獻難徵。』（見金氏朝鮮史序一頁，昭和十一年京畿道芝山書室出版）確是實情，而以檀檀以後一千餘年為尤甚。朝鮮李朝的儒臣權近有兩句詩道：『傳世不知幾，歷年曾過千。這就是對檀君以後一個長時期中的寫照。當時的貉族至多不過達到氏族社會的階段，未曾建立國家，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二）箕子的朝鮮

（1）箕子能往朝鮮的前因

我們在上面一章已經指出貉族爲朝鮮的土著，而散居中國東北沿海和北方的貉族有一部也逐漸向朝鮮方面遷移。當殷商時，中國北部對朝鮮一帶的交通，當已確立。就後漢書東夷傳看，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與夏代卽有交通，「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見同書一一五卷一頁）這是否可靠，固難斷定，但商太戊時，有所謂「九夷來賓」，大概就是這種夷人，證以同書所謂「至於仲丁，蓋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見同卷同頁）等語，當沒有錯誤。並且最後這幾句話如果真實可靠，不獨貉族有遷入朝鮮的，就是朝鮮和東三省一帶的九夷，於殷時也有遷入現今山東江蘇等處的。無論如何，殷與海外東夷的交通固確實存在，不容加以否認。

殷族與海外東夷有幾百年的接觸，而其文化又爲他們所景仰，是牠和他們確有淵源，不過不像傅斯年，林惠祥等所說的同種同系的淵源罷了。既是這樣，則牠於

緊急之際，到他們那裏去找避難所，正是勢所必至的。

(2) 箕子往鮮朝是否集團的行動？

『武王勝殷，……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見四部叢刊初編尙書大傳三卷三六頁）

就上述的情形看，箕子『走之朝鮮』並非一樁偶然的事。他是殷之太師，紂之諸父，並爲殷廷『三仁』之一，當然具有強大的政治勢力，所以他的走決不會是單身獨馬的。關於這一點，可惜中國的古代史籍沒有記載，僅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朝鮮部叢考一參照朝鮮史略，說『箕子率中國人五千入朝鮮。』近來黃炎培對於此事又輕率地予以否定，以爲

『東史謂箕子走朝鮮，率五千人以來，此說殊少根據。』（見黃氏朝鮮三六頁，民國十八年商務出版）

講到「根據」，恐怕只是朝鮮的傳說，要從中國引經據典，是沒有希望的。不過我們仍可憑着中國古代的史料，加以推測。

殷周之際的一戰，其規模的宏大，在中國史上是空前的。張儀告訴秦王道：

「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見戰國策上冊秦策一六頁，按此文與韓非子初見秦篇大體相同，到底係何人所說，還有待於考證。）

這裏對於紂的兵力顯然是說得太多，對於武王的兵力又說得太少，我們再來聽太史公的報告罷：武王

「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見史記四卷周本紀四頁）

這段話對於雙方兵力的描寫，和上面一段較，雖有程度上之差，然恐怕仍不免犯了上面同一的毛病。不過單就紂一方面講，即再打一個對折，也還有三十五萬，武成篇所謂「受率其旅若林」，人數的衆多，可想而知！

殷周的戰爭歷時極短，紂衆雖被殲滅一部分，殺得「血流漂杵」，但遺留的當仍佔最大部分，武王的兵力既較少，自然無力加以堵截，使不致漏網。所以箕子率領一部分敗兵和不甘做奴隸的殷民逃往朝鮮，是完全可能的。所謂「率中國人五千人入朝鮮」，當非虛語，否則他對於久爲貉族所佔據的朝鮮，不見得那麼容易侵入，即能侵入，也不見得那麼容易反客爲主，做起君主來。

箕子一個集團爲戰勝的周族所壓迫，前往朝鮮，這是古代中國民族史上向外發展的第一件大事，也是中國人大規模地直接與朝鮮接觸，間接與日本發生關係的開端，值得大書特書的，故我們於這一集團未去之前的情形，不得不作一番較詳細的敘述。

(3) 箕子到朝鮮後的設施及其影響

現在再看他到朝鮮後的設施是怎樣的。據說他

「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價殺，相傷以穀價，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見前漢書二八卷下地理志一四頁）

我們從上面一段話可以看出幾個要點：一、朝鮮的人口比較衆多；二、以農業爲主要產業；三、私有制和階級制已經成立。當時朝鮮發展的程度大概能和殷族的文化勉強相銜接，故能接受中國物質和精神的的文化，如果雙方相距過遠的話，決不會這樣順利進行的。

不過朝鮮在傳世不知幾，歷年曾過千的局面下，不見得成立過原始的國家，至

多不過達到氏族社會的末段，要經箕子集團的努力，才有上述的成績。我們並且由此成績中又可以證明箕子的去朝鮮是集團的多數人的，決不是單獨的或少數人的，因為這種多方面的領導工作，非少數人所能夠擔任而獲得成就的。他們挾着優越的武力和較高的文化，在朝鮮建立一個征服的國家，使朝鮮得早日踏上文明的途徑，這雖是一種進步的行動，但對於貉族本身畢竟是一種侵略與壓迫。

在日本崛起之前，海外的東夷是以朝鮮爲巨擘，牠因接受箕子的教化，故神話習俗，多與殷族相同。（如後漢書東夷傳所載夫餘始祖東明的神話和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所載夫餘「以殷正月祭天」，「在國衣尙白，……出國則尙繒繡錦罽」是。）所以梁書和南史異口同聲地說：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見梁書五四卷八頁和南史七九卷一頁）

「東夷之國」既是「朝鮮爲大」，而又能接受中國的文化，故中國人對於東夷

全體都發生一種好感，稱其爲君子，爲仁者，說他們『天性柔順，易以道御。』其實朝鮮的基本居民，和我們屢次提及的一樣，是貉族，而說文羊部固明言『東方貉從豸』，（又豸部說『貉，北方豸種』）是直不以人類視貉族，但牠一經吸收股族的文化，表現柔謹的風度，般人的後裔孔子所持的態度就不同了，所以他說：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見論語集注下冊八卷三頁，

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

這正是蠻貊『易以道御』的一種說法。

（4）箕子的都城及其國土所在的問題

（甲）日本學者的議論

這種『易以道御』的基礎是箕子首先安下來的，而朝鮮又是中國文化最初輸入日本的橋梁，所以箕子事業的重要性，沒有人能夠加以否認。可是日本資產階級的

學者現在正在進行一種『過河拆橋』的工作，並且首先向奠定這座橋梁基石的人進攻，此事在論定箕子都城的問題中表現得最明白。例如著朝鮮四千年史，經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寺內正毅品題的青柳南冥，根據史記，前漢書，後漢書，魏略，魏志和晉書等等的材料，參以地理的形勢與兵略上的據點，證明箕子的都城有三處，一在現今河北的黎昌，一在遼寧的義縣或錦縣，（青柳氏的書作義州錦州）一在遼寧的北鎮縣，（原書作廣甯）並且算定其遷徙的時期如下：

『箕子居黎是在武王十三年和成王十年之間的十五年，遷到義州，是在成王十二年開始經略東北之際，由義州遷往廣甯，是在成王二十一年周公薨之前，他居義州約五六年。』（見朝鮮四千年史箕子朝鮮一二頁）

青柳氏經過這樣苦心孤詣的『精密的』『考證』之後，便擺出嚴正的面孔，大發學者的脾氣，說箕子的都城斷不像朝鮮史家所說的一樣，是在平壤，否則他必不能遠道朝周，『可恨朝鮮的史家急於事大，眼光如豆，將自家的命運，托庇於大國

的羽翼之下，半島的思想是如何可憐！」（見同書一七至一八頁）又平壤的箕子廟想必出於唐宋策士的懷柔朝鮮政策，然也是朝鮮儒生諂媚大國的產物。」（見同書一九頁）

青柳氏稱這個問題爲「國家疆域的大問題」，所以引經據典，大做其文章，至於我們呢，爲着歷史的真理，認這並非小事件，因此也不能不稍微多說幾句，以求得一個「水落石出」。他所根據的最主要的材料是史記朝鮮列傳衛滿所都的王險城注釋和前漢書地理志險瀆縣的注釋，計有三種：

一、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

二、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

三、薛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沮水之東，此自是險瀆也。師古曰：讚說是也。

青柳南冥從上列三項材料中作出箕子的三個都城及其三次遷都的時期的結論。

他曾斥「半島的思想是如何可憐」，我們現在也覺得這島國的思想是如何奇特！因

爲就現在所能發見的證據看，牠們和箕子的都城沒有絲毫直接的關係，僅有一種間接的關係，而此間接關係又早已被證明爲不正確，特簡單說明如下。

箕子的都城，中國和朝鮮的史籍通常指明在平壤，但平壤的古名爲朝鮮，所以箕子的都城既不名王險，又不名險瀆，試問上列三項材料和牠有什麼直接關係？

至於間接關係呢，就在括地志認平壤城卽王險城，後漢書注也是這樣說，後來的中鮮學者都據爲定論。但楊守敬的王險城考已經證明平壤城非王險城，是連這種間接關係也沒有了。

像這樣既沒有直接關係，又沒有間接關係的兩種地名，青柳氏怎能使之連結在一起，作成他的結論呢？幸而——其實是不幸——應劭有「朝鮮王舊都」五個大字可作他的根據。但稍微考察一下，這種根據完全是虛偽的。因爲這裏所謂「朝鮮王」絕對不是指箕子，只是指衛滿。怎樣見得呢？第一，武王得天下，「貶帝號，號爲王」，他自己既是王，決不會封箕子爲王，魏略稱「昔箕子之後朝鮮侯……」

（見三國志魏志三十卷八頁小註），是信而有徵；第二，史記的應劭注雖是上列五字，但前漢書地理志遼東郡險瀆縣下的應劭注却作「朝鮮王滿都也」。（見同書二八卷下五頁）我所用的是乾隆四年校刊的本子，再查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的前漢書，（見中冊二八卷下五五〇頁）也是如此。但青柳氏所引的漢志應劭注的原文仍是「朝鮮王舊都也」，（見朝鮮四千年史一一頁）這大概是他故意加以改竄，不見得真有這種版本。因為在史記敘述衛滿事蹟的正文下，索隱引應劭注，改為「朝鮮王舊都」，所謂朝鮮王自然是指衛滿，但在漢書地理志險瀆縣下，應劭如果也用同樣的句法，則所謂朝鮮王便不知是指誰了。現在假定某種版本的漢書上真有這句話，也扯不到朝鮮侯箕子的名下！因為在青柳氏所引用的前漢書地理志同頁樂浪郡朝鮮縣下，他最看得起的「堂堂的儒生」和「支那大陸的學者應劭」（見朝鮮四千年史一七頁）固註有「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八個大字。

現在即退一步，承認箕子的都城即王險城，也應當以第三項材料為根據，因為

這是後來考證的東西。關於這一點，青柳氏在對於淇水行過一次手術之後，的確也是同意的。他以為淇水原是現今的遼河，王險城（即地理志的朝鮮縣）是現今的海城，而此海城是箕子的朝鮮為燕所破東遷後的都城；直至隋唐時代，「支那史和朝鮮史認淇水為朝鮮的大同江，……郡縣山川的地理名稱，紛紛改變，這正是支那政治的文士野心的表現。」（見朝鮮四千年史一七頁）但他這樣的抗議對於本問題是絕對無用的。遼東和遼西二郡係秦時所置，顯因遼河得名，在東方的一郡稱遼東郡，在西方的一郡稱遼西郡，這自然沒有疑義。可是青柳氏為着要把淇水從朝鮮半島西北部搬到遼河，所以許多地名都由他「紛紛改變」：最好笑的是他對於上面第二項應劭所引的遼東二字下面注有「今之遼西」（見朝鮮四千年史九頁）四字，古時的「東」會變成現代的「西」，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變」！況且史記和漢書都告訴我們，當燕全盛時，「管略屬真番，朝鮮，……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淇水為界。」（見史記一一五卷一頁，前漢書九五卷八頁）是從遼河至淇水

明明夾着一個遼東郡，試問這郡的兩端的二條河如何能合而爲一？凡此種種都是秦漢時代的史實，與隋唐時代「支那政治的文士野心的表現」應當沒有關係罷？

總之，依照青柳南冥的『考證』，箕子的都城不獨與現今的朝鮮未曾發生關係，並且還不在遼東郡，僅止於遼西郡。但他的說法不獨不能表彰史實，並且一味毀滅史實，老實說一句，這只是日本「政治的文士野心的表現」，絲毫沒有價值可言！

(乙) 中國學者的議論。

可是返觀我國，學者間對於箕子都城的所在也有發生疑問的，例如呂思勉說：

「箕子立國朝鮮，昔人皆以爲卽今朝鮮之地。近始有疑之者。謂箕子初封，當在廣寧附近。予謂朝鮮初地，究在何處，殆難質言。然必不在今朝鮮境，度其大較，當在燕之東北，與貉雜居。」（見呂氏中國民族史一三六頁，民國二三年世界書局出版）

呂思勉這段話代表一種懷疑的論調，認箕子初封，當在廣甯附近，却沒有提出理由，令人殊爲失望。他在隔這段話兩頁的地方又重行聲明：「箕子初封，必不在今朝鮮之地。」這樣看來，他的建設的工作雖一點也沒有，但他的破壞的工作却堅強無比。他所注重的是「箕子初封」，我們所看出的要點是「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前漢書二八卷下地理志一三頁也說：「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這就是說，逃避戰勝的周族的壓迫。所謂「封」即使真有其事，也不過是武王對於箕子因勢力不及，無可如何，不得不做一個「順水人情」，這就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見史記三八卷宋微子世家四頁）的骨子裏的原因。此事對於箕子本身是絕對不重要的。（據朝鮮鮮于氏，奇氏譜牒所載，箕子不受周封，其子松始受周命爲侯。）凡是「封」的地方應爲中央政府的勢力所能支配的地方，所以地點不能過遠，凡是逃避的地方應爲這種政府的勢力所不能達到的地方，所以地點必定遼遠。我們只要認清這一點，對於箕子所走的（不是「初封」的）地點應該離中

國遠或近，也就可想而知了。呂氏雖不肯說出其斷然否定箕子立國於現今朝鮮的理由，但大概不外過於遼遠這一類的大道理。可是最奇怪的是他很高興稱述他所考證的貉族浮海渡美洲，首先發見新世界的事，（參看他的中國民族史一四八至一五〇頁）而對於殷族的近走朝鮮半島，又覺得不可能，這真令人不能以常理相猜測了！

（丙）結論

箕子立國於現今的朝鮮一事，史籍相傳，已歷三千年，本來沒有什麼大問題的，不過一經中日學者的否定，雖一則別有作用，一則不說理由，我們也不能不多費筆墨，加以討論，藉明究竟。

箕子的都城究在何處，朝鮮的範圍到底怎樣，這個問題當然值得探討，但誰都知道，這是非常困難的，否則根本就不會有甲乙兩類的議論出現。不過我們從各方面綜合來看，也未見得不能獲得一種大體的結論。

首先看山海經所說的朝鮮是怎樣的：

「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見同書一二卷六頁）

列陽在什麼地方呢？據說「列陽屬燕」，而下面的小註是：

「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帶方，帶方有列口縣。」

這裏明明指出朝鮮是在現今的朝鮮半島，雖係後人的註釋，但既有列水和列口等地名，至少可供我們的參考，不能完全視作無稽之談。現在再看山海經的本文罷：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見同書十八卷十頁）

畢沅以爲「此似釋海內北經朝鮮也」，的確，牠供給我們的材料較前爲多。由此可以知道朝鮮的地方不小，並且不止一面臨海，因爲牠固明明跨有兩個海，由此可以證明呂思勉的朝鮮「當在燕之東北」的說法，完全不能成立。

我們再把史記，漢書，國志等所有的材料參合來看，可以相信箕子的朝鮮當在鴨綠江（古稱馬訾水）的兩面，即跨有遼東半島的全部或一部與朝鮮半島的北部。這樣的朝鮮既與山海經地臨東海和北海的說法相符，又與前漢書人口衆多的描寫相合，而地復僻遠，足以達到箕子逃避周族壓迫的目的。

上面一段話是從最古的史料所作出的切合實情的結論，牠的正確性是容易被人們否定的。此外，還有管子對齊桓公所說的幾句話足以增強我們的論證，就是：

「……八千里之吳越，……八千里之發，朝鮮，……八千里之禺氏，……

八千里之崑崙之虛。」（見管子二三卷管子輕重十三第五頁）

這裏將朝鮮和吳，越，禺氏，崑崙之虛並舉，又皆冠以八千里的形容詞，可見其被當時視爲極遠之地。由此更足以證明箕子的朝鮮絕對不在青柳南冥所指派的關內和遼西郡一帶，也不限於呂思勉所擬定的「燕之東北」或「廣甯附近」，而是達到現在的朝鮮半島，否則齊去燕不遠，管仲對桓公豈能當面扯謊？

可是尚書大傳和史記都載有箕子朝周的事，後人因此又據爲口實，說箕子立國，大概不在朝鮮半島，否則何能遠道來中國？但我們根據他遠走半島，不肯受封以及武王不以臣下相待等事看來，不相信他有朝周一回事。況且兩書所載箕子朝周的時期又復兩歧。據史記說：『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陳洪範，「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其後箕子朝周。」（見同書三八卷四頁）然尚書大傳却說：『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見四部叢刊初編尚書大傳三卷三六頁）像這樣傳聞異辭的說法，不能不令我們懷疑到「朝周」一事的真實性。不過即使真有此事，也並非不可能，因為「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柶楛矢，……康王之時，肅慎復至。」（見後漢書一一五卷一百）論肅慎的地望大概還在箕子國土的北方或西北方，肅慎既能遠道來中國，箕子當然也辦得到。他原兼有遼東郡的全部或一部，最初的都城也許還在這個範圍以內，沒有遷入朝鮮半島，倘若真是這樣，他來到中國，不是更加容易麼？

現在總括起來說：我們既經把箕子的國土所在的範圍大體確定了，對於他的都城的地點也不難推測到。他所率的一個集團前往朝鮮，也許要經過好些階段，不是直截了當地達到的，因此他在中途恐怕要逗留若干時期。不過他終於達到朝鮮半島，並擴充他的勢力於鴨綠江的南北兩面，這可以從後漢書東夷傳和魏志東夷傳所描寫的夫餘，高句麗，東沃沮，濊等等的習俗多受殷族的影響一事中看出來。由此可以知道古代的朝鮮和現代的朝鮮，疆域是不相同的：前者進展到鴨綠江的北部和遼東郡，而對於鴨綠江以南，則僅佔半島的北部，其南部並不在內，後者在北方是以鴨綠江爲界，包括整個半島。但古朝鮮雖只佔半島的北部，平壤既相傳爲箕子的都城，我們在沒有獲得反證之時，是不能並且也不當隨便否認的。

(5) 箕子的後裔

自箕子在朝鮮立國後，其子孫的狀況如何，中籍很少記載，至于朝鮮古籍，據

說經衛滿之亂，悉數亡佚，而後來的追述多不可靠，沒有採用的價值。幸而魏人魚豢所作的魏略還告訴我們一鱗半爪：

「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爲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及秦併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于西方。」（見三國志魏志三十卷八至九頁小註）

又據史記說，當燕全盛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見史記一一五卷一頁）由這些事實看來，不獨箕子系的朝鮮仍舊與中國息息相通，中國且嘗努力要使朝鮮變成自己的一部分。加以燕，齊，趙民視朝

鮮爲避難所，不斷地前往，愈足以增加中國的力量。魏志所引的魏略雖只說「稍稍亡往準」，然牠的本文却說：

「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見魏志三〇卷八頁）

文獻通考也說：

「及秦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見同書三二四卷四裔考二頁）

這兩種不同的說法到底那一種對呢？依我們的判斷，後一種比較可靠，因爲觀于在半島南部立國的辰韓人，其「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見後漢書一五卷東夷傳五頁）一事，可知在秦亂前即有大批的人前往，在亂中逃去的當更多，決不止于「稍稍亡往」。

(三) 衛滿的朝鮮

漢高祖時因國內新經喪亂，無暇經營朝鮮，「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淇水爲界，屬燕。」（見史記一一五卷一頁）旋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爲胡服，東渡淇水（按即淇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爲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以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見三國志魏志三十卷九頁所引魏略）

衛滿既擊敗箕準，「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附屬，方數千里。傅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

見，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闓弗通。」（見前漢書九五卷朝鮮傳八頁）

武帝對於這種情形，忍無可忍，乃于元封二年（紀元前一〇九年），「使涉何讓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都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見同書同卷同頁）

是年秋，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漢兵雖是這樣水陸並進，但楊僕與荀彘既不相呼應，又不相能，反爲右渠所敗。旋「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己，故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見同書同卷九頁）

(四) 漢魏郡縣的朝鮮

(1) 漢武帝經營朝鮮的遠因與近因

中國到了漢朝，各方面都呈空前的發展：牠遠承周代人口繁殖，文物興盛的成果，近繼秦始皇統一天下，融合黃河流域以及淮涇間各族的偉業，進而逐漸促成黃河長江兩流域各族的融合，國力日見膨脹，元帝永光四年的詔書所謂

「四方同軌，蠻貊貢職。」（見前漢書七三卷韋玄成傳五頁）

並非虛語，且不自元帝時為始。加以武帝「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情存遠略，志闢四方，」（見後漢書一二〇卷鮮卑傳五頁）且認匈奴為當前唯一大敵，要徹底予以打擊，當

「東伐朝鮮，……以斷匈奴之左臂。」（見前漢書七三卷八頁）

所以他的乘機經營朝鮮，是勢所必至的了。

可是武帝在以武力侵入朝鮮之先，已有一番布置，而打先鋒的是商人：

「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見前漢書二四卷下食貨志三頁）

然朝鮮內部的變化更是此事實現的一個重要原因：

「元朔元年，濊君南閔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見後漢書一一五卷東夷傳四頁）

同書同頁又指明：「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是蒼海郡在現今朝鮮的東北境與吉林的東南境。

武帝在朝鮮既已獲得相當的根據地，而朝鮮王右渠對於母國復侮慢不恭，「未嘗入見」，並且背信毀約，阻礙半島南部蠻夷的入覲，這自然不是實力充足，躍躍欲試的武帝所能容忍的，所以他終於挾其強大的兵力，殲滅右渠，將朝鮮變成郡縣

了。

(2) 武帝經營朝鮮的意義

武帝此舉是朝鮮史上一件大事，因為箕子系和衛滿系雖均以漢人統治朝鮮，但仍各自成立一個國家，對於中國至多不過是一種所謂「外臣」罷了。自有武帝的郡縣政治，朝鮮遂直接隸屬於中國，變成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其疆域並且比箕子系和衛滿系所統治的朝鮮擴大了。因此有人要把朝鮮與南粵甌閩等量齊觀：

「漢武所伐國，如本為諸夏之遺，則永世安平，南粵甌閩是也；如其地本非中國，則雖略其城，固不能終有之，大宛是也。朝鮮一定之後，終西漢魏晉，為中國之郡縣，直至晉失其馭，然後慕容氏兼有幽營，如朝鮮本非漢人所居，武帝之功或不易如此其速成而持久。」（見傅斯年東北史綱第一卷三〇

朝鮮經過箕子系和衛滿系的統治，以及秦末燕，齊，趙數萬人的移殖，已經替中國安下一種堅固的基礎，武帝挾着強大的兵力，使之變成郡縣，不過是再進一步，這種「速成」原不足驚異。可是所謂郡縣政治，疆域代有變遷，歷時也不過四百年，談不到真正的「持久」，尤其不能與「南粵甌閩」，相提並論。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自漢代以來，漢族對於閩粵各族不斷地使之同化，對於朝鮮半島的各族，不獨自始即不注意推行這種政策，甚至於「反其道而行之」，所以魏志告訴我們說：

『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見三國志
魏志三〇卷東夷傳八頁）

所謂「胡漢稍別」，不知如何「別」法，但牠和同化政策不相容，是可想而知的。迨五胡亂華，雙方的聯繫中斷，朝鮮半島的各族更得因利乘便，自由發展，並向獨立民族的前途邁進。所以我們對於朝鮮不能因武帝曾有一種郡縣政治的設施，而視

牠應永遠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和「南粵甌閩」一樣：牠既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即應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

(3) 四郡的位置及其合併

關於武帝在朝鮮所設置的四郡，位置何在，中日學者間頗多爭執，這裏不得不稍微加以討論，以明究竟。

青柳南冥說：「昔漢武帝伐朝鮮，設四郡，本是遼東之地，與三韓的故地何預。」（見朝鮮四千年史一七頁）這是含有政治作用的話，我們雖應提及，藉以表現東鄰學者處心積慮的一斑，但卻沒有反駁的必要，一因我們在討論箕子的都城時已經做過此項工作，二因彼邦較爲公正的學者也已經加以否定了。例如木宮泰彥即認樂浪郡爲現今朝鮮「平安南道，黃海道，京畿道之地」，眞番郡爲「鴨綠江上流附近一帶之地」，玄菟郡爲「咸鏡南道之地」，臨屯郡爲「江原道之地」。（見中

日交通史萬有文庫本第一冊一五頁。

木宮泰彥雖比青柳氏進了一步，承認四郡是在現今朝鮮境內外，而此說雖爲日本學者間一種通行的學說，但仍不正確，因爲眞番郡並不在朝鮮的東北，而是在其西南。關於四郡的位置，以稻葉君山所說的爲妥善，卽武帝

「於漢水流域衛滿朝鮮之根據地及大同江流域置樂浪郡；於樂浪郡之南方忠清道一帶置眞番郡；於北江原道一帶置臨屯郡；於咸鏡道及跨越鴨綠江上游一帶地方置玄菟郡。」（見東北叢刊第五期楊成能譯的稻葉君山滿洲發達史三頁）

不過像這樣的說法並不是稻葉君山獨自的發見，楊守敬在他的前漢地理志圖中卽已說明了。

「至昭帝始元五年〔紀元前八二年〕，罷臨屯眞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

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紀元三〇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見後漢書一一五卷東夷傳四頁）

武帝對朝鮮的膨脹政策，本在斷匈奴的左臂，並非當時經濟發展上的自然結果。昭帝「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見前漢書七卷昭帝紀五頁）因朝鮮守尉之費不貲，且「爲夷貊所侵」，（見後漢書一一五卷東夷傳四頁）不得不從事緊縮；光武以開創之主猶無力兼顧，而至於棄地，使「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見三國志魏志三〇卷東夷傳七頁）這正是中國對朝鮮的統治力削弱的具體表現。然現在竟有人認昭帝以來疆土無所失，「其統治不使者，又付之士侯，故不列郡國之籍焉。東漢光武帝時尤好以士侯代漢官，歲時朝賀依然，邊境兵革鮮用，此經濟的政策也。」（見傅斯年東北史綱第一卷三八頁）這真是一種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之談！

但朝鮮自入中國版圖以後，是在逐漸進步，而不是退步，所謂「風俗稍薄」，一則因人民脫離從前渾樸的狀態，（後漢書一一五卷四百稱「其人性愚慙，少嗜欲，不請句。」）開始從事爭鬥，二則因中國「賈人往者，夜則爲盜」，（見前漢書二八卷下地理志一四頁）使當地的風俗變壞了，所謂「法禁亦浸多」，正是爲着應付這種人事日繁的局面而起的。作史者不懂得這種道理，專從道德的觀點去下批判，以致表現朝鮮是在開倒車了！

（4）公孫氏的割據遼東與對朝鮮的新建置

當後漢「桓靈之末，韓馥疆盛，郡縣不能制，」（見三國志魏志三〇卷東夷傳九頁）漢室的威力復不能及於郡縣，而爲地方割據者所左右，這種割據者就是公孫氏。

公孫度本遼東襄平人，曾任玄菟郡吏。後「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

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遂肆意誅殺，郡中震慄。並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旋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曹操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括符中語見三國志魏志八卷公孫度傳五至六頁）

「度死，子康嗣位，」曹操「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封康平襄侯，拜左將軍。」（見同書同卷六頁）公孫康於中原多故，無暇東顧的時候，對於朝鮮竟有一種新的建置，當獻帝建安中，他分

「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見三國志魏志三〇卷九頁）

公孫康死後，子晃淵皆小，衆立其弟恭爲遼東太守，後爲淵所殺。魏明帝旋「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書徵淵，淵遂

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爲燕王，……侵擾北方。」
(見同書八卷七頁)

公孫淵父祖三世乘中原多故，據有遼東，經營朝鮮，並隔斷東夷，使不得通於諸夏。景初元年淵既抗魏自立，二年春，魏卽大興師旅征淵，六月軍至遼東，擊破其衆，疾趨襄平，八月淵突圍走，爲追兵所斬，傳首洛陽。

(5) 魏明帝的收復朝鮮與毋丘儉的平高句驪

魏明帝於派遣數萬大軍，掃蕩遼東公孫氏的勢力後，「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見魏志三十卷四頁)

但歷時不久，高句驪侵叛，毋丘儉於正始中，「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宮連破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

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順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穿山溉灌，民賴其利。」（見同書二八卷毋丘儉傳三頁）

毋丘儉平句驪所樹的碑石之二，於清光緒三十年發見於奉天輯安縣板石嶺的西岔，碑文共七行，下節雖殘缺不全，然由此可以窺見高句驪的背叛是在正始三年。又就上節所引的事實看，毋丘儉兩次出師，屠殺甚慘，但能以母國的水利制度實施於高句驪，使民受其惠，仍不失為一種威德並行的統馭政策。

（五）五胡亂華時代的朝鮮——慕容氏的進攻

自漢武帝在朝鮮設置四郡，後來或縮為二郡，或又擴為三郡，疆域雖時有變更，但這種局面維持至四百年之久，一直達到晉初。惠帝永興元年（紀元三〇四年），劉淵建號稱王，自此一百三十六年間為五胡亂華的局面，中國遭遇空前的外

禍，自無餘力經營朝鮮，於是向來的郡縣制度自然而地被放棄，朝鮮自立的各國便得乘機發展了。

可是朝鮮在這個時代雖不受中國的統治，却也常爲五胡之一的慕容氏所宰制，這裏須約略說明一下。

鮮卑族的莫護跋於魏初率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懿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以慕容爲氏。子木延從毋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孫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見晉書一〇八卷慕容廆第一頁）迨會孫廆立，將修先君之怨於宇文鮮卑，表請晉「武帝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於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見同卷同頁）懷帝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元帝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慈「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

三國伐虜，虜用離間之策，使自相攜貳，大破宇文。後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見同書同卷二和三頁）

慕容廆在位時，雖割據一方，猶屢受晉封，具有「求諸侯莫如勤王」的心理，對晉室頗獻慙懃。及遼卒，子皝嗣位，連這種心理也消滅了。他於成帝咸康三年自稱燕王，因高句麗乘晉亂向北方進展，擬首先加以殲滅。「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人，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高句麗王劍戰敗，「單馬而遁。皝抽劍父利慕，戴其屍，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見同書一〇九卷三頁）

（六）高句麗

我們由漢魏郡縣的朝鮮一直說到五胡亂華時代的朝鮮，已經走得相當遠了，現在當回轉去追述郡縣時代的朝鮮另一方面情形。當着這個時代，朝鮮並沒有完全

變成郡縣，還有高句麗，穢貊，東沃沮，北沃沮等雜處其間；漢江以南更有三韓的編起。所以中國的郡縣政治不獨沒有達到朝鮮半島的南部，並且未曾普及於北部，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關於上列諸部落，我們只能擇其中比較重要的略說一下：即建立國家的高句麗（又省稱高麗）和三韓。高句麗的創造者朱蒙（又稱鄒牟）係夫餘王子，建國於漢元帝建昭二年（紀元前三七年），「其地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穢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麗爲縣，使屬元菟。……武帝昭帝賜其人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元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王莽初，發句麗兵伐匈奴，其人不欲行，迫遣之，相亡出爲寇盜。莽令嚴尤誘高麗侯入塞斬之，更名高句麗王爲下句麗侯。……光武建武八年，遣使朝貢，詔復其王號。」（見文獻通考三二五卷四裔考二第一頁）魏明帝正始中入寇西安平，爲毋丘儉所破，後又爲慕容氏所攻略。然「自東晉，宋望于齊，梁，後魏，後周，其

主皆受南北兩朝封爵，分遣貢使。」（見同書同卷二頁）魏書所謂「高麗歲修貢職，東藩之冠，」（見魏書一百卷高句麗傳六頁）可以代表牠對中國慇懃的態度，並表現中國對牠的好感。

隋初高句麗王高元猶受冊封，旋寇遼西，文帝命漢王諒率水陸三十萬衆加以討伐。「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見隋書八一卷東夷傳二頁）至煬帝大業八年，因高元不肯來朝，聲罪致討，御駕親征，分左十二軍，右十二軍，「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互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見同書四卷煬帝紀下二頁）可是因坐誤戎機，結果只落得敗績班師四個大字！九年，煬帝復親征，本可奏功，因楊元感反，再班師；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軍多失期，饑饉疫疾，相繼出現，於是死亡遍野，師勞無功。同時高句麗也困於守禦，遣使乞降，才得收場。

唐高祖「武德三年，遣使者封其王高建武爲遼東郡王。太宗時，其東部大人蓋蘇文作亂，殺建武，立其弟之子藏爲王，帝遣使拜高麗王。會新羅上書言高麗侵擾，遣使諭止之，不從。於是帝自將伐之，攻開安市城，不克而還。乾封元年，蓋蘇文死，九月，以李勣爲行軍大總管，率師討之，三年二月，師圍平壤，以九月克之，執藏等獻俘闕下。」（見續通志六三五卷四夷傳一第一頁）而高句麗遂亡了。
高句麗本是一個相當強大的國家，牠的滅亡對於當時的各小國和後來的高麗，朝鮮，是一種殘酷的教訓，所以渤海的大門藝說：

「昔高麗全盛之時，強兵三十餘萬，抗敵唐家，不事賓伏，唐兵一臨，掃地俱盡。」（見舊唐書一九九卷下北狄傳八頁）

因此，因高句麗滅亡，獲得其餘衆及一部分土地而漸趨強盛的渤海，對唐至爲恭順，朝貢不絕，（五代時爲遼所滅）即後來高麗，朝鮮的事大主義也不能不說是種因於此了。

(七) 三韓

現在再回轉去說半島南部的三韓：所謂三韓，就是馬韓，辰韓和弁辰（又稱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名之爲秦韓。……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見後漢書一一五卷東夷傳第五頁）

由此可見三韓在很早的時候即與中國人發生過密切的關係。後來馬韓變成百濟，辰韓變成新羅，弁辰變成加羅，任那，而百濟和新羅尤為強盛，今特述其梗概如左：

(八) 百濟

百濟即後漢末夫餘王仇台之後，為馬韓五十四國之一，「後漸強大，兼諸小國。晉時句驪既略有遼東，百濟亦略有遼西晉平。自晉以後，吞併諸國，據有馬韓故地。……自晉代受蕃爵，自置百濟郡，義熙中，以百濟王夫餘腆為使持節百濟諸軍事。宋齊並遣使朝貢，授官封。……每王立，必遣使詣江南請命，俱授以鎮東大將軍，都督百濟諸軍。百濟亦遣使稱藩奉貢于魏，尋為高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梁普通二年，王餘隆復遣使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通好。隆卒，子明嗣，北齊時，亦通使焉；齊亡遣使通周。隋開皇初，遣使貢方物，拜其王餘昌上開

府帶方郡公百濟王。……餘昌卒，子餘璋大業時遣使入貢，……後隋亂，貢使遂絕。唐武德四年，王夫餘璋遣使入貢，且訟高麗梗道，太宗貞觀初，詔使者平其怨。又與新羅世仇，數相侵，帝賜璽書和其怨。……璋卒，子義慈立，……與高麗連和伐新羅，取四十餘城，發兵守之；又謀取黨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帝遣使齎詔書諭解，開帝討高麗，乃取新羅七城，久之又奪十餘城，因不朝貢。高宗立，乃遣使者來。……永徽六年，新羅訴百濟，高麗，靺鞨取北境三十城。顯慶五年，詔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等發新羅兵討之，……平其國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戶七十六萬，乃析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見文獻通考三二六卷四裔考三第一至二頁）

（九）新羅

新羅爲辰韓十二國之一，「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國小不

能自通使聘，符堅時，其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至隋文帝時，遣使來貢，其王姓金名真平，文帝拜爲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屬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至強盛；因襲加羅，任那諸國，滅之。……初，百濟伐高麗，來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後獲百濟王殺之，結怨滋深。唐武德四年，王真平遣使入朝，後三年拜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見同書同卷三百）
迨高宗滅百濟和高句麗，新羅因利乘便，逐漸竊併兩國故地，統一半島。但玄宗時，大同江以北有渤海的興起，因此這種統一只限於半島的南部。至唐末國亂，將軍甄萱據西南部，自立爲王，稱後百濟；而王族弓裔也據東北部稱王，奄有全國三分之二，國號泰封。

（十）高麗

後梁時，弓裔的部將王建被羣臣推戴，代弓裔爲王，國號高麗，新羅和後百濟

皆來降，又形成一個統一的局面。自是對中國朝貢不絕，屢受冊封。然至宋時因有遼金的崛起，且曾爲遼所蹂躪，遂降遼，故雖對宋朝貢，「通使不絕，然受遼冊封，奉其正朔；及金滅遼，以事遼之禮事金。」（見續通志六三五卷四夷傳一第二頁）及元興，數侵高麗，高麗又屈服於元，且被利用爲對付日本的工具，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說及的，這裏暫且從略。

（十一）朝鮮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高麗三軍統制使李成桂廢恭讓王，卽王位，經太祖的認可，改國號爲朝鮮，奄有半島的全部。從此又臣服於明，至神宗萬曆二十年，因日本的豐臣秀吉進兵朝鮮，明朝也出師東征，歷時七年，這也是要留在以後詳細說明的。

熹宗天啓七年，朝鮮降將張弘立等勾引滿洲太宗，侵入朝鮮義州，初意在驅逐

明守將毛文龍，旋即深入內地，責備朝鮮對滿洲失禮。未幾雙方議和，並訂兄弟之盟。這在朝鮮方面已經是一種屈辱，因為牠向來鄙視滿洲，斥爲「北虜」，「奴賊」，現在這種「虜」「賊」竟與之分庭抗禮了。

可是屈辱的事正在層出不窮。滿洲的勢力愈趨膨脹，對朝鮮的要求也愈加苛刻：牠不獨徵求明的兵船糧食，並且要革從前兄弟之盟，改訂君臣之約。迨要求被拒，清太宗於思宗崇禎十年，親率十萬大軍，侵入朝鮮，使仁祖對他北面而朝，行三拜九叩首之禮，並奉清正朔，與明斷絕一切往來。此外，又於太宗駐蹕之處，立碑頌清帝功德，直至中日戰爭後，朝鮮對清脫離關係，才毀去此碑。

朝鮮降清雖最早，但所受的待遇也很苛嚴，凡新王立，王及王妃均須經清帝的認可，並受其冊封誥命。世祖順治二年以前，每年遣使朝貢至四次之多，從這一年起，每年遣「冬至使」一次，一直至中日戰爭爲止，未嘗間斷。

然中日戰爭的結果，朝鮮完全脫離中國的羈絆，朝鮮王李熙卽皇帝位，改元光

武，國號大韓。迨日俄戰爭後，韓國完全受制於日本，旋成立日韓合併條約，於是韓國又改稱朝鮮，恢復最初的名稱了。

(十二) 任那與日本

以上是就朝鮮半島的立國及其對於中國的關係講的，現在再說牠和日本的關係。這種關係遠在有史以前，自不待言。不過牠的證據只是所發掘的古物，別無真實的記載可言。即自日本國家成立以後，雙方的交接見於史籍的也寥寥無幾，與朝鮮的關係較，要鬆懈得多了。

在這寥寥無幾的事件中，最初而又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崇神天皇晚年，朝鮮半島南端的任那小國遣蘇那曷叱知上奏：國東北有三已汶地：上已汶，中已汶，下已汶，地方三百里，土地民亦富饒，與新羅相爭，彼此不能攝治，兵戈相尋，民不聊生；臣請將軍令治此地，即為貴國之部也。據說鹽乘津彥命旋奉勅鎮守任那。這

是現今「萬世一系」的皇室所建的國家在朝鮮半島獲得政治地位的開端，然較箕子的經營朝鮮，已經遲一千三百七八十年，即從漢時倭奴國領有所謂「拘邪韓國」算起，（參看第六章六項第七目）也要遲一千一百多年。

「仲哀帝九年，神功皇后西征，三韓底平，始置內官家。己巳歲，將軍荒田別鹿我別伐新羅，取比自焯，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後又取斯二岐國，卒麻國，古嗟國，子他國，散半下國，乞食國，稔禮國。總言任那，置日本府，統制諸韓國。又別有王及旱岐，各治本國。」（見源光國大日本史第八冊二三七卷任那傳三二四頁，昭和四年東京出版）

這樣一來，日本在朝鮮半島南部的直接的政治勢即便鞏固起來了。然欽明天皇二十二年，新羅伐任那，異年，滅任那的日本府，掃蕩了這種勢力。後來歷欽明，敏達，崇峻，推古諸朝，日本雖準備出師，或實行出師討新羅，企圖恢復任那及日本府，但終沒有達到目的。

(十三) 新羅與日本

自神功皇后親征新羅（仲哀天皇九年），使之屈服以來，新羅對於日本有所畏懼，不得不以朝貢相敷衍，但究非出自心悅誠服，常延不履行，故在神功、應神、仁德，欽明諸朝，均受譴責，且於所謂仁德天皇七十九年被討伐，光緒初年在奉天省輯安縣通溝東岡村出土的高句麗好太王碑所說的

『倭以辛卯年來渡海，破百殘□□□羅，以爲臣民。』（見好太王碑有正書局拓本）

就是指這一回事。所謂百殘卽百濟，而「羅」字上面所缺的一字當爲「新」，也沒有疑義。但自此以後，歷敏達，推古，舒明，孝德，天武，文武，元正，聖武，孝謙，光仁諸朝，都有一次以至數次朝貢，算是比較相安；尤其自唐滅百濟和高句麗後，新羅想蠶食兩國故地，遂厚結日本。但至聖德王獲得唐所賜淇江以南的地帶

後，對日本的態度又轉驕傲了。當仁明天皇承和九年，太宰府上奏：

『新羅朝貢，其來尚矣。而起自聖武皇帝之代，迄於聖朝，不用舊例，常懷奸心，苞茅不貢，寄事商賈，窺國消息。』（見源光國大日本史第八冊二三卷新羅傳下二七三頁）

這正是聖德王以來新羅對日本的態度的寫照。一直至新羅滅亡爲止，這種態度是沒有改變的。

（十四）百濟與日本

繼着新羅而對日本朝貢的是百濟，第一次是在所謂神功攝政四十七年，自此歷應神，武烈，欽明，敏達，崇峻，推古，舒明，孝德，天智諸朝，均有貢獻，且態度較新羅爲恭順。因爲牠北與高句麗戰爭，東與新羅衝突，不得不用遠交近攻的策略，極力與日本接近，藉以鞏固自己的勢力。結果，牠屢向日本乞援，也常能獲得

後者的幫助。

總之，以日本和新羅，百濟較，大小強弱，相去甚遠，故新羅百濟的文化雖較高——尤其是新羅的文化且較百濟和高句麗爲高——也不得不屈服於日本的武力之下，或依賴其武力，而勉盡事大之禮：

『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恆通使往來。』（見文獻通考三二四卷四裔考一第七頁）

這裏第一是武力的問題，第二才是貨利（通商）的問題。這和牠們對中國的情形比較，便不相同，內中雖毫無疑義地同樣雜有武力的問題，然主要的却是由於慕化，所謂

『高麗之臣事中朝也，蓋欲慕華風而利歲賜耳。』（見同書三二五卷九

頁）

卽新羅，百濟又何嘗不如此？像這樣的分別，也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十五) 高句麗與日本

新羅、百濟因接近日本，須仰其鼻息，故「倭通使往來」，但位于朝鮮半島北部的高句麗却不如此，所以前面所徵引的一段話沒有涉及牠。日本史上雖屢次記載高句麗對日本的臣服與朝貢等事，（如神功皇后征服新羅後，高句麗王親來日本營前降伏，應神，仁德諸朝，遣使朝貢是。）然並非史實。牠因為日本常援助百濟，與之作戰，故對日本取一種仇視與對抗的態度。關於這一點，前面說過的好太王碑完全表現出了：

「九年己亥，百殘違誓，與倭相通，王巡下平穰，而新羅遣使白王云：「倭人滿其國境，潰破城池，以奴客爲民。」歸王請命。太王……以口口十年庚子，教遣步騎五萬，往救新羅。從男居城至新羅城，倭滿其中，官兵方至，倭賊退口……十四年甲辰，而倭不軌，侵入帶方境，……王懂要截盪刺，倭寇

潰散。十七年丁未，教遣步騎五萬，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合戰，斬殺盡，所獲鎧鉀一萬領，軍資器械，不可勝數。」（見好太王碑，有正書局拓本）

高句麗與日本數次作戰，都是日本潰敗，可見牠的實力頗為雄厚。至於作戰的原因是與日本爭取新羅和百濟，因為高句麗對於兩國野心勃勃，至少是以保護者自居，觀於『百殘新羅舊是屬民，由來朝貢，而倭以辛卯年來渡海，破百殘口口口口羅，以爲臣民。』（見好太王碑）數語，就可以知道。然到了隋朝的時候，高句麗初則因寇遼西，開釁中國，繼則因被隋征討，心懷恐懼，對於日本遂改變態度，派遣使節，表示親善；後來爲唐所攻擊，更求援於日本，雖獲得日本的援救，但大勢已去，終不能免於滅亡。

（十六） 渤海與日本

高句麗滅亡不久，南通古斯族所建立的渤海國國勢漸盛，其疆域東達日本海，對於日本通使聘問的誠懇與頻繁，遠在新羅，甚至於從前的百濟之上。但渤海常是被責朝貢愆期，日本太政官送中台省牒，明言『小之事大，理難自由，盈縮期程，那得在彼。』（見源光國大日本史第八冊二三九卷渤海傳下三五〇頁）可見當時日本對弱小國家的氣燄了。

然渤海對於日本爲什麼要這樣慇懃呢？仍舊不出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兩點：即畏日本的武力並貪其貨利，不過在這裏，似乎是後者的成分較前者爲多。據稻葉君山說：

「渤海與日本之交相聘問，約亘二世紀之久（西紀七二七至九三〇年），蓋其所得於與日本交通之利益甚大，故能維持永久耳。依日本之記載，自西元八七一年以來，渤海使者與日本之貿易有如下之報告：

朝廷命設內藏寮以收容渤海之賈客及買其貨物，當時算給彼等之款額爲四

十萬。」（見東北叢刊第十六期楊成能譯的稻葉君山滿洲發達史一一頁）

（十七）高麗與日本

自王建建立高麗，吞併新羅和後百濟，統一半島後，對日本的關係，逐漸發生變化。『朱雀帝承平七年，建遣使奉書，因請入貢，廷議不許其所請，送報牒。天慶二年，遣使又請之，遂不聽，令太宰府移牒其國廣評省。但至通商之事，准舊不禁。』（見大日本史第八冊二三四卷高麗傳二八五頁）

日本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高麗有三十餘年對日不遣使節，至圓融天皇天祿三年，「其國南涼府使齋牒至對馬島，」而一條天皇長德三年，「其國遣使來，牒文乖例，朝廷疑其有詐，不報。」（見同書同冊同卷二八六頁）自是又隔八十三年，（白河天皇承歷四年）高麗禮賓省因向日本求醫，才因日本客商回國之使，移牒太宰府道：

「當省伏奉聖旨，訪聞貴國有能理療風疾醫人。今因客商王則貞回歸故鄉，因便通牒，及於王則貞處說示風疾緣由，請彼處選擇上等醫人，於來年早春發送到來，理療風疾，若見功效，定不輕酬者。」（見同書同冊同卷二八八頁）

這樣一來，把日本激怒了，「廷議以牒文無禮，令太宰府移牒，卻還其信物，」道：

「……牒狀之詞，頗賤故事；改處分而曰聖旨，非蕃王可稱；宅遐隅而跨上邦，誠彝倫道數！况亦託商人之旅艇，寄殊俗之單書；執圭之使不至，封函之禮既虧，雙魚猶難達風池之月，扁鵲何得入鷄林之雲？凡厥方物，皆從卻還。今以狀牒。」（見同書同冊同卷二八九頁）

此時高麗對日本的態度，顯然是以對等國自居，而日本偏視爲屬國，故發生衝突，雙方除貿易外，又斷絕使節的往來。隔了一百四十七年，高麗因譴責日本，才

又移牒太宰府。其起因由於後彌河天皇嘉祿二年，「肥前松浦黨誘對馬島民，乘戰艦數十艘，侵高麗全羅州，掠略人物。國人出戰，松浦兵死者且半，餘衆掠銀器等物而還。」（見同書同冊同卷二九〇頁）異年，高麗使至，少貳武藤資賴自知理屈，具事聞於關東，捕斬姦民九十人，並對高麗送出報牒。於是廷議又以「高麗牒文無禮，資賴不由官議，捕斬島民，私送報牒，大損國體，命吏治其罪。」（見同卷同頁）

自是以後，兩國國交又復中斷，四條天皇仁治元年，高麗牒使曾一度至對馬。當龜山天皇，後宇多天皇，和伏見天皇時，高麗受蒙古的指使，常遣使來日或派兵攻日。後村天皇時，日「西邊浮浪之徒，以船數千艘侵高麗及元地，屢掠略人物以爲常。時屬兵亂，朝制不及遠，無能禁之。數年之間，彼緣海郡邑荒蕪，民居殆盡。」（見同書同冊同卷二九一頁）因此，高麗又遣使持國書及元中書省書至攝津兵庫津，請禁邊民侵害。足利義滿雖「贈答信物，不送報書，但以當時屬國亂，制

御不及爲辭。」（見同書同冊同卷二九二頁）後龜山天皇時，高麗三次遣使至日，請禁海寇且通信，但日本正在南北朝爭持的時期，實無力禁止這種海寇，至多不過將他們虜來的高麗人放還若干罷了。

（十八）朝鮮與日本

當李成桂卽位（號太祖）之初，便遣僧覺鑊來日，復請禁海寇結好。此時正是後小松天皇時代，日本南北對峙的局面已經統一，足利義滿幕府遂命僧中津報書，其大意如下：

「海隅小民，毀壞教化，不遵制教，實我君臣之所恥也。當申命鎮西守臣，禁遏賊船，放還俘虜。至其通信結好，我亦所欲，然而我國將臣，古來無海外通問之例，故不克直答來教，令僧代報，非慢禮也。」（見同書同冊同卷同頁）

太祖旋又遣使至日通好，日政府一面殲滅海島的殘寇，一面向朝鮮求大藏經，雙方的關係，算是比從前改善一點了。

後小松天皇應永十六年，朝鮮的使者又至，足利義持幕府遣僧周護答禮，並求大藏經。稱光天皇時，幕府求此愈迫切，遂由朝鮮贈以大藏經，並請還俘虜。日方於送還俘虜之後，又進一步求大藏經版，但沒有達到目的。

朝鮮對於日本中央政府雖有使節的往來，表示親善，但對於對馬却又另持一種態度。對馬係倭寇的巢穴，常渡海來侵，高麗末葉已經出兵直接攻擊這個賊巢，太祖五年（後小松天皇應永三年），復遣兵征壹岐，對馬，世宗元年（應永二十六年），又發兵船二百二十七隻，兵一萬七千餘人進擊對馬，初雖得勝，終於大敗而還。

朝鮮這樣直接征討對馬，並沒有和牠長久斷絕交通，世宗旋許日人移住三浦，（即熊川的齋浦，東萊的釜山浦，和蔚山的鹽浦。）從事貿易，（中宗時此項移民

達四百四十六戶，計一千六百五十人。）二十五年（後花園天皇嘉吉三年），更與對馬島主宗貞盛訂約：開三浦，每歲給以米豆二百石，貞盛每歲得派船五十艘，經營商業。

後柏原天皇永正七年（中宗五年），對馬島主宗義盛憤朝鮮不依向例接待他的使者，特派宗盛弘率兵三百渡海，聯合三浦的日人，襲擊釜山浦，壽浦，熊川，東萊等處，旋爲朝鮮京畿，忠清，江原的三道兵所削平。於是對馬對朝鮮的貿易又告中止。宗義盛迫不得已，請足利義稹幕府遣使求和。朝鮮於兩送賊徒首級的先決條件之下，才接受和議：其結果爲將前此歲遣船五十艘減至二十五艘，廢除三浦的居留地，另造倭館於釜山，以爲接待使臣之所。後因對馬故態復萌，交通復中斷，再經過和議，又定新約。

然自中宗末年起，倭寇的勢力復張，侵擾朝鮮西南沿海各地，並及於中國整個海岸線，殺人越貨，無所不至。至宣祖二十五年（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豐臣秀

吉忽掀起一個軒然大波，因朝鮮不允其假道侵明，特派二十萬大兵和九千餘水師進攻朝鮮，弄得朝鮮天翻地覆，並與明兵交戰，前後亘數年之久；迨媾和以後，朝鮮在表面上對日本雖表示和好，實則心懷怨恨，歷久不忘。

當後水尾天皇寬永四年，即滿洲軍第一次侵擾朝鮮的時候，德川家光使對馬宗義成送鎗三百枝，焰硝三百斤，和長劍三百柄給朝鮮，表示願為援助；六年，又遣僧玄方宣稱願為朝鮮伐滿洲，一雪城下之盟的恥辱。但朝鮮終以介於兩大之間，雙方的兵馬往來，於己不利，沒有接受此議。

至明治維新初，日本曾遣使朝鮮，請廢對馬貿易船的先例，正式通商，為朝鮮所拒。日本非常憤慨，西鄉隆盛等大唱征韓論，他們的主張雖沒有實現，然朝鮮卒因李鴻章的勸告，於李太王十三年（明治天皇明治九年），與日本訂立修好條約。十九年，朝鮮京城發生兵變，並襲擊日本公使館，旋又與日本訂約修好。二十一年，京城變亂又作，牽涉中日兩國，明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訂立天津條約，但終

不免於甲午之役。

(十九) 大韓與日本

中日戰後所訂的馬關條約第一條說：「中國確認朝鮮獨立，完全脫離中國之羈束，成獨立國。」的確，朝鮮是離中國而獨立了，國號也改爲大韓，君主且自稱皇帝，在朝鮮半島的歷史上，這好像是三千年來未有的盛事。再就外交講，日俄協約既認兩國對牠立於對等地位，不得有獨占的行爲，而日英同盟復保障中韓兩帝國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局勢的順利似乎無以復加。

但這種局勢並非韓國內政外交的改革造成的：牠在名號上雖煥然一新，然內政的腐敗如故，外交的俯仰依人如故，民族運動的消沉也如故，總之，牠未嘗表現一點生機。牠的「獨立」是日本國力膨脹的結果，是日本要攫爲已有的第一個步驟，這完全是虛幻的，沒有根基的。果然，光武八年（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一開戰，

日本即與韓國訂立日韓議定書，使牠變成日本的被保護國，旋又訂日韓新協約，使韓國的政權悉落入日本的手中。異年九月日俄平和條約成立之後，十一月再結締日韓協約，日本即撤廢駐朝鮮的公使館，而代以統監府了。

日本挾戰勝的威力，對韓國一步緊逼一步，自非「獨立的」大韓皇帝所能堪，他於無可奈何的時侯，特派密使向一九〇七年六月荷爾海牙所開的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伸訴。結果，不獨沒有絲毫效果，並且受到更大的壓迫，只得讓位於皇太子。

皇太子圀即皇帝位後，又來一次日韓協約，使韓國所受日本的宰制日益加深。

隆熙三年（一九〇九年）十月，前任統監和高唱「日韓一家」的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車站爲韓志士安重根所殺，舉國震驚，韓國一進會會長李容九等遂被利誘威脅，代表一百萬會員上書韓皇，統監曾根荒助及總理大臣李完用，陳述日韓合邦的利益；以爲如此，皇帝可享萬世的尊榮，人民共躋一等強國國民的班列。至異年五月，日本陸軍大臣寺內正毅代曾根荒助爲統監，八月與李完用簽定日韓合併條約，經日韓

兩皇帝裁可。結果，韓國又改稱朝鮮，統監府改爲總督府，大韓皇帝由日本天皇册封爲王，世襲罔替，而具有三千餘年悠久歷史的朝鮮就這樣結束了！

第五章 秦以前的中日關係

(一) 中籍所紀有史以後最初的接觸

中日關係的正式開始，有確切紀錄可徵的，雖始於漢代，距今不過二千年左右，然雙方的交通由來已久，這已經可以從上面各章窺見一二。我們現在在這裏將秦以前的中日關係約略敘述一下，作為雙方正式發生關係前的一個引子。

我們所居的東亞大陸在有史以前，因人種的遷徙，或沿海居民的漂流，大概就有人前往日本羣島，不過這種史前的事件須待將來雙方地下的發掘，才有微實的機會。至於在有史以後的上古時代，一方面因年代久遠，文獻無徵，不知埋沒了雙方多少交接的事實，然另一方面，正因為這個緣故，後人也可以隨意作偽，憑空添出

許多事實來。例如宋朝張君房說：

「又有騰黃神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出日本國，壽二千歲，黃帝得而乘之，遂周旋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見四部叢

刊初編雲笈七籤一〇〇卷六七七頁）

這雖可算是關於有史以後中日最初接觸的一種紀錄，但究其實際，只是道家一派的胡說，沒有絲毫史實的影子。

其次，據帝王世紀所載，舜時，東倭重譯而納貢，這自然也是同樣靠不住的。至周代又傳有倭人來貢的事，除掉我們在第一章六項所引王充佚國篇的話外，他在儒增篇又說：

「周時天下太平，……倭人貢鬯草。」（見論衡上冊一五四頁）

他自稱「淫讀古文，甘聞異言，……幽處獨居，考論實虛。」（見論衡下冊自紀篇二五九頁）這樣重言倭人貢鬯的事，必有所本，決非虛構。國語載仲尼對陳惠公的

使人說：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求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見同書五卷魯語下十一頁）

我們從這幾句話中至少可以看出兩個要點：一、這裏所謂九夷決不是海內九夷，而是海外九夷，所以肅慎有楛矢之貢；二、當時的九夷大概已包含日本在內，武王既「使其各以方賄來貢」，總有直接或間接的使人前往日本，日本因道遠的緣故，遲至成王時才來貢鬯草。這樣看來，王充鄭重告訴我們這件事，其真實性和可能性是相當大的，與上述兩事絕不能相提並論了。

到了戰國時代，燕和日本更發生過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關於這一點，我們在第一章六項所引山海經「南倭北倭屬燕」一句話中，已經有所論列，這裏當然不用再說。

(二) 徐福東渡的問題

(1) 中國方面

(甲) 史籍的記載

在秦以前的中日關係中，雙方傳說最盛的，莫過於徐福東渡的問題，因此，我們這裏也不能將牠省去不提。

秦始皇自兼併六國，統一區宇以後，志得意滿，無復顧慮；惟有一事使他不能安心的，就是死。於是繼齊威王宣王和燕昭王之後，遣方士入海求神仙了。當始皇二十八年，

「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見

史記六卷秦始皇本紀八頁

這就是徐福（即徐市，市乃古馘字，馘福相通，並非兩名。）入海的起緣。至三十七年，「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見同書同卷十二頁）

最後這幾句話表見徐福的去而復來，但漢初伍被諫淮南王安所述的徐福故事，與此又不同，據他說，始皇

「使徐福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至東南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

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見同書一一八卷淮南列傳四頁）

同一史書所記的同一事件竟兩歧，可見傳聞異詞。由最初的紀事看，「發童男女數千人」在第一次，由後來的傳說看，「遣振男女三千人」在第二次，這似乎無關重要，但第二說如果確實，則初時以方士資格去求神仙的徐福後來實懷有避秦苛政，向海外殖民的計畫了。

現在即假定此事真實可靠，也還不能牽涉到日本去，因為所謂「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見史記二八卷封禪書五頁）去日本還遠着呢。可是後漢書東夷傳在敘述倭國一段的末尾却說：

「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瀛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治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

移至檀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見同書一一五卷六頁）

會稽在今浙江，所謂「會稽海外」本來扯不到日本，不過古代的地理知識常是不正確的，當後漢時，說到倭國，總認「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見同書同卷五頁，一直到明代，猶是如此。）所以這裏把徐福所居留的地方隱約和日本連結起來了。

後漢雖在三國之前，可是後漢書爲劉宋時（五世紀前半）范曄所編，而三國志則爲晉初（三世紀後半）陳壽所撰，出書的次序恰恰相反，故上面一段話實抄自三國志而略加改竄的。這是孫權傳中黃龍二年關於夷洲和賣洲紀事的一個中段，其首尾是：

「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賣洲。賣洲……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見三國志吳志二卷九頁）

這一段話明言徐福等留在賣洲，孫權所遣的甲士萬人未能達到，但得夷洲數千

人還。可是隋書和北史的東夷傳所紀述的又不相同。隋書倭國傳的末尾說：「大業四年，

「上遣文林郎裴濟使于倭國，……迴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于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見同書八一卷七頁）

北史對於此事的記載係直接抄自隋書，用不着再加介紹。這裏所謂秦王國似乎還是指徐福等所建立的國家，然竟是夷洲而不是寶洲了。此外，號稱東方朔集的十洲三島（實爲六朝人之作）又說：「秦始皇

「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見四部叢刊初編雲笈七籤二六卷一九四頁）

這裏所說的人數和洲名不獨與正史不同，並且愈演愈奇，說到「君房後亦得

道「了」！洞仙傳所記的徐福事與此相同，不過所率的童男女不是三百，而是五百，自徐氏成仙後，

『逮沈羲得道，黃老遣福爲使者，乘白虎車……來迎。』（見同書一一〇卷七五四頁）

像這樣荒誕不經的胡說，各書還有記載（如太平廣記），自然不在我們研討之列。現在要說的是，自從後漢書，隋書，北史把徐福所居留的地方與日本輕輕地聯繫之後，後人遂視爲確切不移的史實，並極力加以附益，例如宋初編訂的太平御覽引外國記說：

『周詳泛海，落紵嶼，上多紵，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僮男之後，風俗似吳人。』（見太平御覽七八二卷六頁，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裏雖沒有指明所謂「紵嶼」的地望，然附在關於日本的記載之後，當然是在日本。所以吳萊論倭，以爲：

「旁又有夷州，紵嶼，人莫非倭種。」（見傅雲龍游歷日本圖經十八卷四
十頁）

（乙）文人的吟詠

像這樣逐漸演進的「史實」，再加上文學家的吟詠，那真是有聲有色，使徐福東渡後的種種事蹟活現在我們的眼前了。首先做到這一着的當然是歐陽修的日本刀歌，他在這首歌裏對於徐福的故事不獨盡情渲染，並且加入一些重要的「史料」，我們試聽他說：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非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鑿澀短刀何足云？」

（見歐陽文忠公全集第五四卷七頁）

徐福第一次入海求仙固在焚書之前，但第二次入海求仙已在焚書之後，即使他所留的地方真是日本，這種『令人感激坐流涕』的事也只是文人想像力中的空中樓閣，否則既是『逸書百篇今尚存』，何以『令嚴不許傳中國』？可見後一句不過是爲掩飾前一句而設！但此事一經這位有名的文人道及，便成爲典故，所以明豐存叔的謙齋記說：

『徐市避秦航海，攜古詩書以去，實出坑焚之前，歐陽公所謂「令嚴不許傳中國」是也。』（見傅雲龍游歷日本圖經一八卷六一頁）

到了明初，日本僧絕海於觀見太祖時，太祖曾指日本圖垂詢海邦遺跡，絕海賦詩道：

『熊野峯前徐福詞，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見大日本史講座十七卷中山久四郎支那史籍上的日本史三一頁）

太祖和韻道：

「熊野峯前血食詞，松根琥珀亦應肥；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見同書同卷同頁）

至清光緒二十五年，駐日公使黎庶昌作有訪徐福墓記的長文，和自奈良至新宮訪徐福墓絕句十二首，今介紹其中比較重要的二首如下：

「繼岸風濤著舳艫，里人猶自說秦須，三千入海童男女，知否當時盡到無？」

猶存七冢壓田厝，故老相傳福所親；嫡裔如雲飄散盡，更從何處問秦人？」（見大日本史講座十七卷三三至三四頁）

黎氏這二首詩都有註釋，前一首的註釋是：「古老相傳：福初到時，在新宮東北海岸七里許（日本里），故其地名秦須。尙有碑志，地甚狹隘，乃徙於此。」後一首中「所親」與「秦人」的註釋是：「旁有七冢，皆相距數百步，今僅見其二。」或言福之子孫多姓秦者，今皆散處各處；或言藤澤驛福岡平一郎係福之後，後人

嘗有贈物寄新宮神社；或言徐姓在和歌山充醫士，皆疑莫能明。」

然在黎氏之前，清駐日公使館參贊黃遵憲所作日本雜事詩已有詠徐福的詩道：

「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別日天；鏡璽永傳笠縫殿，尙疑世系出神仙。」（見大日本史講座十七卷三四頁）

黃氏這首詩和歐陽修的日本刀歌一樣，又加入一些重要的「史料」，並且還提出了新的問題。

（丙）學者的議論

黃遵憲的詩所含的意思在下面一段話中盡量發揮出來了：

「史記稱燕齊遣使求仙，所謂白銀宮闕，員嶠，方壺，蓋即爲今日本地。君房方士，習聞其說，故有男女渡海之請，其志固不在小。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徵也。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又周秦語也。自稱神國，立教首重

敬神；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有罪則誦禋詞以自洗濯，又方士之術也。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計徐福東渡，已及百年矣。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黨徒歟？」（見黃氏日本國志一卷二頁）

這真是一種極勇敢的主張，並且也還有幾分理由，得以自圓其說。自後漢書把徐福的事牽引到倭傳內，至日本國志依據日本的文物制度，證明徐福的影響，這樣的演進真是達到極點，如無其他地下發掘的證據，不能再進一步了。可是時人對於徐福東渡的事所抱的見解，多與此相反（雖則也有贊成的），例如陳樂素說：

「若徐福入海之事，其與日本無關，早成定論，中日詩人雖喜引爲材料，現在日本雖尚有徐福之祠之墓，其爲附會傳說所造成之跡，本與史實無關也。」（見日本研究一卷三號陳氏日本古代之中國流寓人及其苗裔五四頁）

這種否定的話雖十分堅決，可惜沒有提出反證。此外。陳恭祿也說：

「史記無徐福至日明文，陳壽亦無此說。范曄作後漢書於宋時，抄襲陳壽

倭人藉之大意，且妄解其文身，而武斷其爲秦伯之後，尤不足信。揆之當時情況，徐福之船能涉風浪東渡否？東渡後童男女能耕種或漁獵否？又能與土人戰爭否？漢時能如陳壽所述「立國通使」否？以余觀之，未必一一能然也。加以言語單音雙音之不同，是中國文化猶未輸入，斯可斷此說之無根據矣。」（見陳恭祿日本全史一一頁，中華書局出版）

陳恭祿這段話不獨火氣太重，並且根本有些糊塗，因爲范曄從未提到「秦伯之後」的事，究竟是誰「妄解」和「武斷」？至於反對徐福東渡所提出的理由也十分粗淺，而沒有深刻的體會。不過我們現在無暇作批評，還要看一看日本方面對於徐福的傳說。

（2）日本方面

（甲）史籍的記載

中國方面對於徐福東渡的事既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日本又怎麼樣？情形也沒有兩樣，並且還要紛亂些。因為當徐福泛海時，日本還在野蠻時代，沒有文字，即使達到，也不能有所紀述。我們已經說過，日本最古的史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作於唐睿宗末年和玄宗初年，內中並無徐福的紀事，直至元順帝至元五年（一三三九年），北畠親房所著的神皇正統記才載有秦始皇好仙，求長生不死之藥於日本，日本要求五帝三王的遺書，始皇悉如所請，由徐福送至日本。

後來林羅山的羅山文集也記載徐福到日本在始皇焚書坑儒前六七年，所攜蠅蚪篆籀，韋漆竹牒，後經兵燹喪失，以致不傳。

又據和歌山縣的和歌山縣史蹟名所誌說：

『秦徐福的墓在新宮町，墓前建一石碑，刻「秦徐福之墓」五字，爲李梅溪手筆。相傳往昔秦始皇帝時，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攜五穀種和耕作農具來日本，在熊野浦登陸，從事耕作，並養育童男女，子孫遂爲熊野之長，平安度

日。又徐福所求不老不死的仙藥地名蓬萊山，在由此往東三町許之處，樹木蒼鬱繁茂，山形如盆，自成仙境之觀。」（見大日本史講座第十七卷中山久四郎支那史籍上的日本史三一頁）

此外，如孝靈通鑑，寬文雜記，紀伊續風土記，野崎左文的日本名勝地誌和高谷瀨夫的日本史等等對於徐福的種種事蹟都有所紀述，然除掉關於所謂徐福墓，徐福廟，或徐福祠這一類的文字外，大都脫胎於我國史籍的記載，沒有介紹的價值。

（乙）學者的議論

關於徐福東渡的事件，日本方面除地點，徐福捕鯨，或徐福紙的傳說外，既不能供給我們新的材料，現在且看一般學者的持論是怎樣的。仁井田好古的徐福碑有大體如左的一段話：

「後之視古，其猶月夜望遠耶！視其有物，不能審其形；以爲人則人矣，以爲獸則獸矣，以爲石則石矣。雖其形不可定，而其有物也信矣。求諸熊野新

宮之地，有徐福墓。又其墓側有七冢，相傳葬徐生所親信者，或曰瘞其所齋。

考之國籍：長寬勘文引熊野社記曰：「往昔甲寅年，天台山王子信之舊跡也。」社記又曰：「漢司符將軍嫡子真俊勸請權現於板木」。又曰：「孝昭帝時，南蠻江賓主乘船而來，會惡風而船壞，獲免者僅七人，三人者造船還本國，留而事神者四人，取魚供權現祠，子孫繁昌，遂爲新宮氏人。」上古悠邈，形影難追，其存沒多少，誰得詳之？宜乎或以爲王子信，或以爲漢司符將軍，或以爲南蠻江賓主，豈非月夜望遠之說乎哉？當此之時，皇國未有漢字，後人得之曖昧而筆之，雖其名稱不相合，而其斥徐生必矣。」（見大日本史講座第十七卷中山久四郎支那史籍上的日本史三一至三二頁）

這裏根據各種記錄，考證所謂徐福墓，終於取了一種否定的態度，這也是必然的，因爲除掉一坏黃土外，別無文字或遺物的證據，一定說是徐福墓，頗難令人置信。又有所謂徐福祠，據那珂通世的外交釋史說，係後人假託，而以其想像地比定

平原廣澤，尤爲無稽。此外，源光國作大日本史，賴襄作日本政記對於徐福東渡事絕不道及，雖則其動機別有所在（爲自尊國體起見），然可見否定此事的，實大有人在。

(3) 結論

我們對於中日兩方所發表的徐福東渡故事的材料與評論，已經大體介紹過了，現在應當作出一種結論，藉以了結二千多年來中日間這一重公案。

就中國的史料看，所謂徐福東渡的故事是逐漸演進的，所以人們對於牠的真實性不能不抱一種懷疑的態度。紀述徐福入海事最早的史記僅說他「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並沒有指明在何處。繼此出現的三國志說到賣洲，以爲「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遠。」而後漢書則說：「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但兩書同時聲明「所在絕遠」，後漢書且

指明在「會稽海外」，可見徐福所居留的地方另是一處，並非史記所說的三神山。怎樣見得呢？

我們在第一章已經說過，所謂三神山，史記明說相傳在渤海中，並且

「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見同書二八卷封禪書五頁）

像這樣的境界是地濱大海，富於冥想力的燕齊人士腦袋中的發明品，一望而知；遲至唐時，人們獨認這可望而不可即的「仙境」是有些虛幻，所以白居易有名的長恨歌說：「忽聞海外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即使海中真有這樣的山不過被人仙化了的，那也一定「去人不遠」，因爲據呂祖謙說，距始皇第一次求仙的六十四年前，即周赧王三十二年，「燕昭王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見呂氏大事記五卷六頁）可見這原是燕齊方士出沒之所，就當時的航海術講，與大陸必不會相距過

遠，徐福第一次入海，也許達到這種地方（如果真有的話）而無所獲，也許沒有達到（根本沒有這種地方），故「還爲僞辭」，騙得大批人衆和給養，另到「所在絕遠」的瀛洲，夷洲去避禍了。

不意主張徐福東渡最力的黃遵憲，連這一點都沒有弄清楚，竟認「所謂白銀宮，員嶠方壺，蓋卽爲今日本地。」而在日本方面也宣言「徐福所求不老不死的仙藥地名蓬萊山。」像這樣強作解人地穿鑿附會，反使徐福整個故事的結構傾覆下來了！

老實說一句：如果用嚴正的科學態度來考察徐福故事，後漢書，隋書，北史，太平御覽的記載已經不大可靠，至於後來文人的吟詠，學者的附會，更沒有根據，不過是一種演義式的小說罷了。有史以後中日間最初的一重要事件，鬧了二千年還沒有最終的解決，而其真相不過如此，豈非「滑天下之大稽」？我們花如許篇幅，結果只落得一場空，不是更不值得麼？

但問題並不是可以這樣簡單否定的，我們還須作更精密的全般的考察。

就上面的材料看，徐福泛海至少有兩次，第二次泛海時，他既想避禍，當然要到較遠的地方，爲他們那大羣的人找一安身之所，所以這一回飄海的目的地決不是那「去人不遠」的三神山，也不是中國沿海一帶的島嶼，因爲這是始皇的勢力所能——至少是容易——達到的地方，對於他們是不安全的。那麼，他們唯一的出路是往東方走，結果固然應首先達到朝鮮半島的西部，但如前進不已，也可沿半島西海岸南下，折而東向，逕抵日本。日本和傳徐福是在紀伊的熊野浦登陸，紀伊位於本州的西南海濱，此事如確，他們一定是直達日本。總之，徐福等爲習於海上生活的齊人，以大規模的華備而飄海，我們不能斷定他們都溺死在海中，或終身處於任何荒島上。既是這樣，他們當時或經過若干年月所達到的地方，不是朝鮮半島，就是日本羣島；但朝鮮從無徐福登陸的傳聞，至於前往日本的傳說，見於我國正史的也已有一千多年，所以徐福東渡的事在科學的假設上，也是能夠成立的。

還有一層，我們在第四章已經說過，當秦亂時，燕，齊，趙人避往朝鮮的有數萬口，這數萬口中必有一部分乘船前往，決非全體陸行的，可見當時泛海至朝鮮，並非難事。又半島南部的「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故或名之曰秦韓。」可見「秦之亡人」達到朝鮮半島南部的，原不在少數。更據日史所載，中國人移居日本的，以秦人爲最早：

「秦酒公，秦始皇後普洞王子也，曾祖曰功滿王，仲哀帝八年來歸。祖弓月君，應神帝十四年自百濟來，奏曰：「臣以百二十縣人口歸化，（姓氏錄作百二十七縣伯姓，或作二十七縣百姓。）而爲新羅所梗塞，皆留加羅國。」帝乃命葛城襲津彥往召之，三年不還，再造平羣木兔等率兵召之，竟以弓月人口與襲津彥俱來。……仁德帝時以諸秦氏分處諸郡，使養蠶織絹以貢，帝以其所獻絲綿絹充御服。」（見源光國大日本史第五冊一〇七卷一六頁）

這裏所說的是秦滅亡以後的事，但栗山周已經指出「秦氏一族浮海而來」，是在

日本有史以前，秦氏由朝鮮半島大舉南下，是以紀元前二〇六年爲中心。（參看第二章四項第四目）

現在再回到我們的問題上去，徐福的一羣倘若當時只達到朝鮮，則辰韓或秦韓耆老中未必沒有他們的成分，而紀元前二〇六年——即秦亡的一年——前後由半島大舉往日的秦人中也未必沒有他們的成分。所以徐福等最初即使僅達到朝鮮，然於後來大批秦人前往日本之際，加入其中，這在科學的假設上也是同樣能夠成立的。

由以上兩項假設看來，徐福東渡的事不能由人們輕易加以否定。這件傳說一千多年的事並不是沒有意義的。黃遵憲將日本最初的文物制度都歸功於徐福等的措施，將崇神以來的乘政者都視爲他們的子孫或黨徒，雖有誇張和不正確的地方，但也不能說完全是捕風捉影之談。

現在即退一步，假定將來有新的證據出現，證明徐福達到的不是日本而是其他地方，（如那珂通世認琉球的八重山諸島爲夷洲，沖繩島爲亶州；市村瓚次郎認台

灣爲夷洲，瓊州爲亶洲。）但就現有的文獻講，秦人首先移住日本，有助於牠的精神和物質文化的發展，是確切不移的事實。更就日本已經出土的銅器講，如對馬國一粗濕石板做的棺中的銅劍及「一向稱爲劍柄的套子」，安藝國兩石塊中發現的一銅劍及銅劍外的一銅鐸，長門國一簡陋石板做的棺中的二銅劍及一三鈕的銅鏡，不是出自中國，就是爲日本所做製，而其時代都在漢武帝經營朝鮮以前，那至少應爲秦代。原田淑人於敘述遼東朝鮮出土的銅器和上列三項後，總括起來說：

「以上所說遼東，朝鮮，日本各種銅器，有的是中國傳來，有的是本地製造，總之時代很早，至少在漢武侵略朝鮮，設置四郡以前，即有一種文化的流，或許漢時或稍後仍在流着，於此種文化流之成，至少當在設置四郡以前。」（見清華週刊三三卷五期原田淑人講，錢稻孫譯的由考古學上看的中日文化底交涉五八頁）

徐福東渡的事將來即被否定，而現有文獻和出土銅器所表現的證據，所指出的漢以

前文化的流，是不會連帶被否定的。至於現在呢，我們雖無法完全肯定徐福的渡日，但也沒有充足的理由可加以否定，他至少可作為首先幫助日本發展文化的秦人系的一種象徵，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第六章 漢魏西晉時代的中日交通

(一) 前漢時的交通

(1) 關於私人的

就人種的遷徙看，中日交通當遠在有史以前，即就日本出土的銅器看，中日交通也在秦以前。到了漢代，這種交通可說是較前更加增進，尤其是因漢初工商業的發展，雙方的貿易當已出現。稻葉君山說到衛滿的朝鮮，曾涉及此事：

一 又如日本與中國人民間之私相交通，斯時亦早已開始。雖一部分之史家有謂自九州方面出發者，然亦頗難推斷，要之，古代漢人與東方諸族之往來，

頗爲活潑，在漢人固極思他種族之天產品，而他種族亦思獲得漢人之財物。大而國家，小而個人，應經濟上之必要而交互行動者固極迅速，而爲之居中阻礙者，卽衛滿朝鮮也。」（見東北叢刊第四期楊成能譯的稻葉君山滿洲發達史二頁）

這雖不是一種採自何種史籍的記錄，但却是一種切合實情的記錄，因爲古代兩個國家或兩個區域和平的交通，大都以貿易爲先導，范曄論到箕子的朝鮮，說：

「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見後漢書一一五卷東夷傳六頁）

其實不僅朝鮮是如此，卽中日又何獨不然。不過此項貿易是在私人間進行的，所以很難獲得一個機會，被史官採入正史中。像這樣的史實真不知道埋沒了多少；然我們萬不可因正史的失載而否認牠的存在，或不加以注意。

(2) 關於國家的

(甲) 前漢書的記載

像上述私人的交通，對於中日關係的發展，固然十分重要，甚至於比國家的交通還重要得多，但這一類不見於載籍的史實終久令人難於捉摸，所以我們迫不得已，仍須以史籍爲依歸。查中日交通見於正史可資查考的，是從漢代起，並且是在武帝經營朝鮮以後，因此本書對於這個時期以前雙方的交通，雖已在前面提及，但命名則爲二千年中日關係發展史，以示依正史的紀錄，正式從漢代說起。

「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見前漢書二八卷

下地理志一四頁）

這是中國正史上關於中日交通最古的記載，牠把倭人與所謂「樂浪海」聯繫在一起，一方面固由於當時地理知識的不正確，但另一方面也就指明樂浪郡與倭人的往來交通，與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所謂「倭韓遼屬帶方」，（見魏志三十卷九頁）具有類似的意義。據前漢書地理志所載：「樂浪郡戶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萬六

同卷一七頁）

我們能說這些國的「獻見」都是不可靠的麼？牠們處在遼遠的地方都來獻見，倭人有樂浪郡的連鎖，爲什麼反不能「以歲時來獻見」呢？宣帝即位初的詔書說：

「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百蠻率服，款塞自至。」（見前漢書七卷夏侯勝傳二頁）

在這種狀況之下，倭人「以歲時來獻見」，實在情理之中。至於他們不見於列傳，上述那些國家也不見於列傳，只有朝鮮既載於地理志，又見於列傳，這不過是在當時重要與不重要的關係，並沒有別的緣故。我們在第二章八項已經說過，日本各處原始國家的成立是由於與前漢交通促進的，所以當時的倭人至多也不過才脫離野蠻時代；他們自己既還在原始狀況中，又遠居海表，雖「以歲時來獻見」，在中國史籍上當然佔不到重要位置，故前漢書把他們和東鯷人等一律看待，不爲他們特別立傳。但我們對於他們在前漢時「以歲時來獻見」的事實，却不能因此持一種懷疑的

態度。

(乙) 後漢書與魏志的記載

然倭人的與漢交通不僅見於漢志，後漢書更說：

「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見後漢

書一一五卷東夷傳六頁）

魏志也說：

「倭人……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見三國志

魏志三十卷東夷傳十頁）

魏志所說的與漢志相似，木宮泰彥以為「乃撰者推測之辭，惟大體亦近於事實。」（見中日交通史萬有文庫本第一冊一六頁）既是「大體亦近於事實」，便不能目為「推測之辭」，而應視為事實。至於後漢書的說法，木宮氏以為「無價值之可言」，（見中日交通史第一冊一六頁）因為

『魏志倭人傳所謂「漢時有朝見，今使譯所通三十餘國」之「今」字乃指魏而言者；後漢書東夷傳誤解爲漢代之事，遂謂「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

（見中日交通史第一冊二五頁）

但問題不是這樣簡單的。范曄自稱他的書爲『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見宋書六九卷范曄傳七頁）這雖是他在獄中與諸甥姪書的『稱情狂言』，未免矜誇一點，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他的書是集晉宋以來八家後漢書的大成，確係一部精心之作。因此無論他怎樣笨或粗心，也不致看不出魏志那樣淺顯的文義而發生『誤解』：他不是有心作僞而改竄魏志的文字，就是另外取得材料而據實紀錄出來，『二者必居一於此。』

現在已有人在罵他的『倭傳幾完全抄襲魏志倭人傳而妄意改竄，謬誤可笑。』

（參看日本研究一卷一號陳樂素魏志倭人傳研究一六頁）試把後漢書東夷傳和魏志東夷傳關於倭人的記載對比一下，在描寫倭國內部的狀況一點上，頗有這種嫌疑。

向來中國的史家對於四裔總是認識不足，凡關於他們的記事，大都輾轉抄襲，甚於於隨意改竄，這是我們史家的通病，不能獨責范曄，（他所犯的這種嫌疑，並不像好些中日學者所幻想的那樣重，我們以後將隨時加以說明。）即陳壽對於倭人的說法也是以魏略的記載為藍本的。至於倭人通漢的事實，當取材於本國的紀錄，無待外求，更不必——並且也不能——抄襲後一代的史實。否則有心作偽，便引起史家嚴重的責任問題了。查後漢書所說的「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魏志則為「今使譯所通三十國」，木宮泰彥的引文且作「三十餘國」，不知出自何種版本？然北史也說：「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見北史九四卷倭國傳一一頁）這兩代中交通的國數既不相同，似乎不能硬指為剽襲。況且范曄和內藤氏所說的一樣：「為支那史家中最能文者之一，他的刪潤方法極為巧妙，引書的痕跡，泯滅殆盡。」（見內藤氏讀史叢錄九頁）他如存心作偽，儘可把相差的數目改得更大一點，以免露出破綻。漢志說倭人「分為百餘國」，與朝鮮半島最接近而往來又頻繁的九州已經近

二十國，故自武帝以來，「使驛」應爲「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並不是不可能的。

還有一層，漢志所謂「百餘國」，以及後書所謂「三十許國」，在實際上只有極少數是原始的國家，而最大多數必仍爲氏族社會的部落，決不是名副其實的國家（參看第二章七，八，九三項），所以即使真有「三十許國」來獻見，除掉日本方面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外，（與高度文化國家交接，得提高自己文化的水準。）在中國方面正和與四周的蠻夷接觸一樣，是十分平淡無奇，沒有特別價值可言的。

(3) 日本出土銅器的證明

上面所述公私兩項的交通，可以找着實物上的證據。原田淑人說：

「日本九州北部銅器時代遺跡中出許多前漢以至後漢式鏡，與銅劍同出。並曾出玻璃製的璧的殘片，還有玻璃製的珠飾。」

九州北部筑前境內三雲所出之物，銅鏡銅劍同出，劍形與以前所見的不同，形式進步，鏡一爲前漢式，一爲前漢乃至後漢時物，筑前之須玖去三雲不遠，也出有劍和鏡。劍之形式稍古，鏡均爲前漢式，此種銅劍早就有了，當時由漢輸入鏡來，與劍同時存在，故劍之形式稍古。一鏡之斷片，亦前漢式，與方才所說的鏡劍同時出土。（見清華週刊三三卷七八期合刊原田淑人講，錢稻孫譯的由考古學上看的中日文化底交涉二〇至二二頁）

濱田耕作也說：

『至於在九州發見的漢代物，有漢委奴國王印，漢式銅劍，鏡，玉璧等，又像九州，山陰出土的王莽貨泉，除中國史籍所記之外，可以考古學的遺物，證明其交通。』（見楊鍊譯的濱田耕作東亞文明的曙光四五頁）

發見前漢的遺物地點，從九州起至本州的山陰止，範圍可說是相當地廣大，由此足以證明當時公私的交通的確存在，而後書所謂「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更

完全是可能的。

(二) 後漢時的交通

(1) 光武朝倭奴國的奉貢與受封

當前漢時，分爲百餘國的倭人「以歲時來獻見」如果還引不起我們史家的注意的話，到了後漢，因爲他們急速發展的結果，情形便不相同了。光武中元

「二年，……東夷倭奴國遣使奉獻。」（見後漢書一卷下光武帝紀十頁）
或如另一處更詳細記載的一樣：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見同書一一五卷東夷傳六頁）

這是中國正史重視倭人，大書特書的開端。這裏雖不過兩三句話，但因此所引

起的問題是費去日本學者，甚至於中國學者許多筆墨的，我們現在只能儘可能簡單地說一下。

一、「使人自稱大夫，」這不自後漢始，至少起於前漢，所以魏志說：「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見魏志三十卷十頁）晉書更說：「倭人……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見晉書九七卷東夷傳三頁）這種名稱出自中國，黃遵憲以為係周秦語，為徐福派所傳播，（參看第五章二項一目丙）雖未必可靠，然倭奴國以及前此的倭人的使者「皆自稱大夫」，可見其受中國人——尤其是秦人系——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二、「倭奴國……倭國之極南界也。」這句話不合邏輯，因為倭國只是倭奴國的省稱，故杜佑便直截了當地把倭奴國寫作倭國，而成爲

「倭國……倭國之極南界也。」（見通典第一八五卷邊防一，東夷上第五

頁）

由此可見倭奴國的不能居『倭國之極南界』，就和倭國的不能居『倭國之極南界』一樣。但這種錯誤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後漢書東夷傳曾說：『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見同書一一五卷五頁）這是一個主要的國家，具有代表其他國家的資格，故常被加上日本羣島一切國家的總名稱——倭奴國或倭國。可是人們也許要問：這裏所謂倭奴國怎能證明一定是邪馬臺國？因為魏志歷數倭人的諸國，『南至邪馬臺國』（見三國志魏志三十卷十頁，按「壹」係「臺」之誤）為止，可見這確是『倭國之極南界』。

邪馬臺的位置何在，按照我們的史籍所指的方位去求，本來不算是一樁很難的事，但在日本國內却鬧了一千多年，還沒有定論。自紀元七二〇年出版的日本書紀認定邪馬臺國爲畿內的大和國以後，松下見林的異稱日本傳繼承其說，遂成定論。不過當足利氏末葉，釋周鳳的善隣國寶記對此已發生疑問，至德川末葉，本居宣長的馭戎慨言便力反此說，以爲邪馬臺係九州的熊襲國。於是九州說盛極一時，如鶴

峯戊申，管政友，吉田東伍，星野恆，久米邦武，白鳥庫吉，橋本增吉諸氏都作此主張，不過在九州の某一處，意見却不一致。此說一直流行到明治末年，而內藤虎次郎霹靂一聲，復主張畿內說，由是高橋健，笠井新也，中山太郎，山田孝雄，三宅米吉，志田不動齋諸氏也作同一主張。像這樣的兩派對峙，爭論不休，煞是熱鬧。不過證以魏志的「南至邪馬壹國」和後漢書的「倭國之極南界」兩語，則邪馬臺是在九州（大概在九州の肥後菊池郡山門地方）而不在畿內，絕無疑義。至於畿內の大和和九州の邪馬臺在日文中同爲『ヤマト』（Yamato），應如何解釋，真是「言人人殊」！我們以爲大和或邪馬臺的語源既出於蝦夷族（參看第二章六項第二目丙），仍應追源，才是正道。此族曾佔據九州，後又退往東方，也許他們在九州時，造成這個地名，後來往東退走，又挾着牠同走，使牠留在畿內。但反轉來說，也有理由，因爲此族原自東北而來，他們先在畿內造成這個地名，後來達到九州，也挾着牠同來。真相如何，還待證明。至於人們認「日本史籍上的大和國乃爲九州

之耶馬臺國東遷後而始產生的。」（見師大月刊第十八期王輯五耶馬臺國方位考二一九頁）並非史實，因為耶馬臺國是被滅亡，沒有東遷，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面就要談到的。

三、光武賜以印綬，光格天皇天明四年（一七八四年），有人於筑前國緒屋郡志賀島叶崎掘地得一石室，中藏一印，文爲「漢委奴國王」五字，計方七分八厘，厚二分，高四分，重二兩九錢，係蛇紐金質，陰文篆體。

日本學者對於這類金印發表過不少的論文，如青柳種齋，龜井道載，朝川士脩，村瀨之熙，藤井貞幹，伴信友，上田秋成，藤原芳樹，管政友，星野恆，久米邦武和三宅米吉等前後都刊佈過這一類的文字，而以三宅氏的解釋與考證爲學術界所公認，所以木宮泰彥說：

「三宅博士謂應讀爲漢之委（倭）之奴之國，「奴」卽書紀中所見之「雛」，卽後之「那珂」云，此說今已爲學界之定說。」（見中日交通史萬有

文庫本第一冊一七頁)

至關於取得此金印的人爲誰的問題，日本方面的議論，不出稻葉君山下面一段話所歸納的：

「爲究此種漢印果係何人所領受，則其結論大致分爲兩種：其一謂係當時九州之七豪與漢交通時所得，……近世之日本人囿於國家體面論者，多作此種主張焉。其二即謂當時大和朝廷朝貢漢廷之時，請受此印，以爲紀念，與漢代諸外國之立場相同，故遂得此印記也。」（見東北叢刊第十六期楊成能譯的稻葉君山滿洲發達史二頁）

我們對於上面的解釋考證和兩種結論，都不能首肯，因爲牠們和事實相去是太遠了。第一，倭奴本是一個國名，竟被分作兩個，使奴國隸屬於倭國，而倭國又隸屬於漢，這種辦法只有日本學者想得，至於我們中國人真是連影子也沒有！然究其實際，不過是「近世之日本人囿於國家體面論者」故意使此事表見不重要的一種

勾當，簡直可以列入稻葉君山所說的第一種結論中，一起來討論。

日本學者作此主張時，只看見日本古代有「奴」國，「羅」國，九州有土豪，所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絲毫沒有顧到中國是一個文物之邦，最懂得「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這種垂教的。試看朝鮮半島的重要國家如高句麗在王莽時仍不過一侯國，至光武始復其王號，即可見一斑。日本方面領受漢印的如真爲「倭之奴」國，或「九州之土豪」，則光武決不錫以王號與金印，（按蠻夷之印爲銅印）今既發見此印爲蛇紐金印，明係一種曠世的殊榮，領受牠的人應爲日本當時最重要的國家的君主，這還用得着懷疑麼？

這樣說起來，便歸結到第二種結論上去了。這就是說，一班不「囿於國家體面論者」一直率承認現今「萬世一系」的皇室曾於「朝貢漢廷之時，請受此印」。但光武中元二年係紀元五七年，依照我們的計算，崇神天皇卽位約在二二七年頃，卽魏明帝卽位三年（太和元年），而崇神以前的九個天皇又全不可靠，（參看第二章七

項第五第四目）況且大和朝廷在東方，而倭奴國明明在西方，則所謂「大和朝廷朝貢漢廷」的事直是「子虛烏有」之類，日本學者在這裏的直率承認，的確是沒有用處。

可是無論如何，倭奴國必為當時一個強有力的和進步的原始國家，對於後漢表示極端的向慕與誠摯，故能得光武特殊的優遇，馬上取得王爵的封號，打破漢代對四夷的先例。

(2) 安帝朝倭國獻生口

過了五十年，我們的東鄰又來一次奉獻：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倭國遣使奉獻。」（見後漢書五卷安帝紀二頁）同書另一處記載得較為詳細：

「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見同書一

一五卷東夷傳六頁)

這裏雖也不過簡單的一句話，但在日本已做過不少的文章，我們爲表見事實的真相計，不得不概括地介紹一下，然後加以說明。

「內藤博士謂北宋版通典有「倭面土國王師升」，日本古版後漢書亦有「倭面土國王師升」，「倭面國王師升」等，又異稱日本傳所引之通典有「倭面土地王師升」之名。蓋原爲「倭面土國王」，後省稱爲「倭面國王」，又略爲「倭國王」，或誤爲「倭面土地王」者。博士謂倭面土國當讀作セマト國，卽大和國云。竊謂或與倭奴國同，當讀爲「倭」之「面土國」，卽北九州之一地，亦未可知。」（見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萬有文庫本第一冊一七頁）

這段話表見日本學者對於我們古史的解释是何等紛亂而穿鑿，得不着要領。我們已經說過，邪馬臺和倭面土同爲 Yamato (セマト) 的音譯，這個國是當時一個強有力的和進步的原始國家，足爲倭人的代表，故取得倭奴國或倭國的稱號。因此

古本通典和後漢書稱牠爲倭面土國，今本通典和後漢書稱牠爲倭國，在實際上並不衝突，也都沒有錯誤：一則從牠固有的名稱，一則從牠代表全體倭人的名稱。這個國仍舊是光武時取得王爵封號的倭奴國，所以隋書倭國傳說：

「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見隋書八一卷六頁）

北史倭國傳也有同樣的記載（九四卷一二頁），魏志東夷傳也是如此（一九四卷七頁），可見牠不是什麼大和國，更不是什麼「倭之土面國」了！

倭國所獻的生口達一百六十人，這真是一種空前絕後的數目。後漢書雖說「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魏志雖說「今使譯所通三十國，」但在漢魏兩代，除所謂倭奴國，倭國，或倭面土國外，（其實這只是邪馬臺國的不同的名稱）始終沒有看見其他國家來奉獻，（雖則魏志東夷傳曾舉出倭人的三十一個國名）在實際上恐怕不是牠們未曾來，而是我們的史家只記出代表牠們的國家的名稱。（牠們如果單獨前來的話，大概也是不吝的。）例如這一次送來如許生口，不見得是代表倭國的邪

馬臺國單獨的奉獻，牠們一定也有參加的。可是如果真有這樣的事實，後漢書爲什麼不做照魏志對於元帝景元

「二年……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濩，緬各率其屬來朝貢」（見魏志四卷陳留王本紀十三頁）

的書法，載明出來？這又不能不令人懷疑了。至於所謂「生口」，日本某學者猜想爲「留生學」，麥多克則譯作「生人」（*Living Persons*——見麥氏日本史第一卷三六頁），這都是外國人的猜測之詞，並不中肯；我國通常稱俘虜爲生口，大概這種人不外俘虜奴隸之類。

（三） 魏時的交通

（1） 明帝朝倭女王國遣使朝獻

(甲) 朝獻的年分與朝代的問題

自後漢安帝永初年間至魏明帝景初年間，相距約一百三十多年，倭國又遣使朝獻：明帝

「景初二年」〔紀元二二八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見三國志魏志三十卷東夷傳十一頁）這裏首先要提出來講的是年分的問題。我們在第四章已經說過，公孫氏于漢魏之際據有遼東和朝鮮，當景初二年六月，帶方郡還在公孫淵的手中，他於是年八月才伏誅。（參看第四章四項第四目）難升米等詣郡，正是指帶方郡，當時既非魏的勢力所能及，劉夏怎能到任，又怎能「遣吏將送詣京都」？這樣看來，景初二年的「二」當爲「三」字之誤。的確，梁書說：

「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見梁書五四卷東夷傳一一頁）

又神功皇后紀的三十九年，引魏志說：

「明帝景初三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斗米等詣郡。……」（見內藤虎次郎讀史叢錄一五頁）

可見古版魏志原爲景初三年，陳壽自己並沒有弄錯，而是後來的版本轉訛的。

不過雖是這樣，仍有問題。因爲明帝崩於景初三年正月，廢帝於他未崩之前的同月卽位，這一年內雖仍用明帝的年號，但在實際上，除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見三國志魏志四卷齊王芳本紀一百）以外，一切詔書都是以新皇的名義頒佈的。（參看同書同卷同頁）然就魏志東夷傳所敘述的倭女王遣使朝獻事來看，於「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師」之下，接着就是「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這明明表見爲明帝的詔書，但在事實上却是廢帝所發的詔書。雖則書中一再使用「我甚哀汝」，「國家哀汝」的詞句，顯出異樣的悲哀，然這不見得是以明帝的名義或「詔遣」的形式頒發的。我們在沒有得到確實證據以前，對於此事不

能不懷疑。

(乙) 卑彌呼爲何人？

倭女王國的女王卑彌呼是誰，這在日本已經討論一千多年了，凡是講到邪馬臺的，總要提及她。日本書紀的作者認定卑彌呼爲神功皇后，因此把神功的時代提早一百多年，使適合於後漢書和魏志東夷傳所描寫的卑彌呼的年代，以致日本史上在隋以前的各天皇年代都錯亂了。在另一方面，內藤虎次郎以爲卑彌呼就是垂仁天皇之女倭姬命，而太田亮則認她爲大和朝廷的屏藩，僭稱大倭王。

此外，還有形形色色的說法：有的認卑彌呼爲天照大神，有的認她爲熊襲的女酋長，有的認她爲筑紫的女酋長，有的認她爲筑後，肥後的女酋長。總之，令人看了，頭頭是道，無所適從！

但自我們看來，卑彌呼不是皇后，不是皇女，不是大和朝廷的屏藩，更不是大神，也不是女酋長，而是百分之百獨立的邪馬臺國的女王，即一向代表倭奴國的邪

馬臺國的女王。她的世系和她本人的事蹟雖因文獻不足，無從詳考，但下面一段話也已經畫出一種輪廓了：

「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按此爲住字之誤〕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感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見三國志魏志三十卷東夷傳十一頁）

卑彌呼以前既是以男子爲王，則女酋長之說不能成立，況且侍婢千人，又有人持兵守衛，更非女性本位的社會所能有。至於大神，皇后，皇女，或屏藩之說，也同樣無稽，因爲她和「萬世一系」的皇室固然沒有血統的關係，也沒有隸屬的關係（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說到的）。她是九州北部一個主要國家的君主。她是一個兼政教於一身的女王。這種事實就足以說明她是誰。

(丙) 封爵與賜物

卑彌呼既於景初三年六月，遠道遣使來朝獻，在當時正是「海表謐然，東夷屈服」的一種標誌，自然要視爲一件盛事，而加以優遇；況且後漢對於這個國家原有先例。魏室遂於是年十二月特降詔書，封卑彌呼爲親魏倭王，（「親魏倭王」印拓本見宣和集古印史）並賜予大批的中國特產，其內容如下：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縹粟罽十張，舊絳五十四，青紺五十四，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四，金八兩，

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見三國志魏志三十卷東夷傳十一至十二頁）

魏代以如許絲織物，毛織物，刀，銅鏡，眞珠，鉛丹等珍貴物品賜給卑彌呼，使她宣示國中，在當時不過認爲中國哀憐她，故鄭重賜以好物，但自我們現在看來，此舉實在是將中國的物質文明灌輸到日本去，引導牠向文明的途徑邁進，所以具有一種更重大的意義。

(2) 廢帝朝魏倭使節的往來

(甲) 東倭重譯納貢

就史籍的記錄講，中日的交通至魏時忽趨密切，並且幾乎完全集中在廢帝芳的一朝。

「魏正始元年〔紀元二四〇年〕春正月，東倭重譯納貢。」（見晉書一卷
宣帝紀六頁）

像這樣的史實不見於魏志齊王芳本紀（即廢帝），也不見於東夷傳，而載在晉書中，頗覺奇怪。但我們不能因此認爲不真實；這一句下面還有「焉者，危須諸國，弱水以南鮮卑名王，皆遣使來獻」的事，也都不見於魏志。晉書宣帝紀所以追敘出來，是由於「天子歸美宰輔」，所謂宰輔，就是司馬懿。（晉武帝受禪後，上尊號爲宣帝。）幸有此一追敘，這種重要史實才得表見於世，然因缺乏這樣的機會而被湮沒的同類事項，正不知道有多少啊！

我們的東鄰來中國奉獻，恰和上面所敘述的一樣，不是稱爲倭奴國，就是稱爲倭國或倭而土國，這一次却叫做東倭，名稱有些異樣了；再仔細考查一下，這個東倭似乎不是向來奉獻的倭奴國，這就是說，不是邪馬臺國。怎樣見得呢？

明帝景初三年六月，倭國遣使詣帶方請朝獻，再由太守劉夏遣使護送至洛陽，

路上所歷的時間，以前一年司馬懿征公孫淵所估計的「往百日，還百日」（見晉書一卷宣帝紀四頁）爲例，至少需三個月，是倭使達到洛陽當在九十月之交，甚至於還要遲些，因爲他們在帶方也許還要耽擱一些時日。是年十二月才頒發詔書，異年（即廢帝正始元年）帶方太守才遣使奉詔書詣倭國，而倭王復因使上表謝恩。倭國對於牠的朝獻的使臣還在中國未歸的時候，決不會再遣使臣來納貢，所以正始元年正月納貢的東倭，決非前一年朝獻的倭國，應沒有疑義了。

然這個東倭到底是那一國呢？從晉書上所留下的六個大字去找，自然是找不出來的。不過我們也有兩種合理的推測，不妨寫在下面。

第一，魏志東夷傳載卑彌呼所統治的共有三十國，除掉她自己的邪馬臺國外，還有二十九個國，計：狗邪韓國，對馬國，一大國，（「大」爲「支」之誤，梁書東夷傳和北史倭國傳均作一支國。）末盧國，伊都國，奴國，不彌國，投馬國，斯馬國，伊邪國，己百支國，都支國，彌奴國，好古都國，不呼國，姐奴國，對蘇

國，蘇奴國，呼邑國，華奴蘇奴國，鬼國，爲吾國，鬼奴國，邪馬國，躬臣國，巴利國，支惟國，烏奴國，奴國。所謂東倭，說不定就是這二十九個國中的某一國或某幾國。

第二，魏志東夷傳又說，女王國——即邪馬臺國——的南方「有狗奴國，男子爲王，……不屬女王。」（見魏志三十卷十頁）豈獨「不屬女王」，並且是她的勁敵。這個國也許是偵知卑彌呼於景初三年六月遣使至帶方轉往中國，使同樣派遣使臣追蹠而至，所以於相距三個月的光景，也達到洛陽。

這兩種可能性到底是那一種大呢？我們以爲後一種的可能性大。因爲遠道通使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女王國既已於景初三年遣使前往中國，牠所屬的二十九國便沒有跟着遣使的必要，否則牠們儘可加入牠的使者團。至於狗奴國則不然。牠正和女王國爲敵，後者既和新近伸張勢力於朝鮮半島中部的魏室交通，說不定將有不利於牠的舉動出現，牠爲防備敵人起見，當然要急起直追，對魏室輸誠納貢，藉此獲得

諒解，使不致左袒女王國。況且日史稱牠和朝鮮及中國交通，並吸收中國的文明，（詳情見下面五項第二目乙）是通使一事自爲題中應有之義。

還有一層，狗奴國屬於印度納西亞族，即日本古史上所謂「隼人」，他們的語言大概和久通中國的邪馬臺國不同，所以在交通上更感困難，晉書對於東倭的納貢，特標出「重譯」二字，並不是沒有原因與意義的。查後漢書，魏志對於倭奴國——即邪馬臺國——的納貢從沒有冠以「重譯」字樣的，因爲據日本學者的推測，當

「卑彌呼時代，倭女國王似已略解中國語，稍識漢字矣；如魏人素知之難升米，使魏二次之掖邪狗等，實有此等智識之人才也。魏志倭人傳所載，「倭王因使上表，答謝詔恩，「倭使「詣郡說相攻擊」，魏使到女王國「爲檄告諭之」等語，雖不無文飾之辭，然已證明倭人內有能解中國語，有稍識漢字者矣。」（見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萬有文庫本第一冊二五頁）

這些話是很有理由的，女王國的使者大概略懂漢文，其道中國，也許無須經過繙譯，至少是無須『重譯』。但狗奴國因為位於九州南部，與朝鮮半島和中國交通，既沒有那麼方便，而言語又十分隔閡，所以須經過『重譯』。專就這一點看，也可斷定納貢的東倭是狗奴國，而不致蹈穿鑿附會之嫌。

(乙) 帶方使者兩次赴倭

在中日關係上，廢帝正始元年另一可記的大事是帶方

『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雋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並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見魏志三十卷東夷傳十二頁)

這件事本來是平淡無奇的，但梯雋等在有記錄的中日交通史上係代表中國政府前往日本的第一次使者，這就值得我們注意了。中國與四裔的交通，大概是『來而不往』，因為牠們是來貢方物，表示仰慕，我們對牠們雖有賜予，自然是給牠們的貢使帶回去，用不着鄭重其事地派專員前往。這一次因為封爵，要表示慎重，故令

帶方太守派人送去。光武對於倭奴國也曾封爵，但後漢書上僅有「賜以印綬」四字，恐怕是給牠的使者帶回的，否則也因記載不備，無從查考；因此梯檣等畢竟要算是第一屆使者了。

然魏室不獨對於卑彌呼錫以殊榮，即對於她的使臣也再加恩，正始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見魏志三十卷十二頁）於是帶方郡又要忙着遣派使者了。然這一次的使人不僅履行簡單的齋詔書的使命，並且負有調和九州兩個國家爭端的責任。當正始八年，帶方

「太守王頤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齋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諭之。卑彌呼以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梁書東夷傳和北史倭國傳均作臺與，宋本太平御覽七八二卷作臺舉」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諭壹與。壹與遣大夫率善中郎

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見魏志三十卷十二頁）

卑彌呼派人向帶方太守仲訴她和卑彌弓呼互相攻擊的事，可見她重視中國對當時日本的潛勢力。張政等依太守王順的指示，檄告壹與，雖不知結果如何，然就壹與特派大夫掖邪狗等二十人護送他們回來一點看，她的政府大概是不會漠視檄文的意旨的。這是中國以善意指導日本政治的開端，我們不要隨便看過了。

帶方派往倭國的使者，見諸明文的，雖只有上述兩次，然在實際上決不止於此，所以魏志東夷傳說到伊都國，明白指出

「郡使往來常所註。」（見魏志三十卷十頁）

所謂「郡使」自然就是帶方郡的使者，所謂「常所註」也就顯出那裏不是一，二次郡使往來註節之所，而是多次的使者的常註所了。

（丙）倭新舊女王的謝恩與兩次奉獻

卑彌呼既由魏室封爲親魏倭王，並賜以大批的珍品，派專使齎送，她得着上國

這樣的殊寵，心中極爲感激，故於正始元年帶方使者返國時，便「因使上表，答謝詔恩。」（見魏志三十卷十二頁）至正始四年（紀元二四三年），

「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緜衣，帛布，丹，木狝，短弓矢。」（見同書同卷同頁）

這是卑彌呼奉獻的第二次，所有使臣的人數與貢品的樣數，都比第一次增加，可見她是變成名實相副的「親魏倭王」了。至於魏室對她仍舊優禮有加，自不待言，就是掖邪狗等也得援第一次使臣的例，拜率善中郎將印綬。

迨卑彌呼死後，壹與繼立，於正始八年遣掖邪狗等二十人護送張政還帶方，

「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四匹。」（見同書同卷同頁）

新女王的政府對於魏室的貢獻較前女王更爲誠摯，把大量的珍品都獻出來了。

這大概是由於國內新經喪亂，而又南鄰強敵，依賴魏室之處正多，不得不如此。可

是自此以後，從未見女王使者的踪跡，豈不和這種傾誠中國的發展趨勢恰恰相反？但我們仔細考查一下，才知道並不是她的使者沒有來，而是魏志沒有記載。因為晉書提及卑彌呼，告訴我們說：

「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見晉書九七卷東夷傳三頁）

文帝就是司馬師，他作相在魏廢帝嘉平三年（紀元二五一年），從這一年起，魏室不過苟延十四年的殘局，女王國的使者竟「數至」，可見牠依賴中國的迫切了。

（四）西晉時的交通

（1）武帝朝倭人來獻方物

在魏代短短的四十五年中，日本羣島的國家，除掉嘉平三年起沒有分條寫出的「數至」不計外，前後奉獻四次，而卑彌呼的遣使至帶方伸訴還不在內；可是在西晉的五十二年（紀元二六五至三一六年）中，却只來過一次。即武帝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倭人來獻方物。（見晉書三卷武帝紀三頁）

或和另一處所說的一樣：

「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見同書九七卷倭人傳三頁）

我們上面的描寫表見當時的九州已有兩個系統的國家存在着，即邪馬台國與狗奴國。現在要問：武帝時來獻方物的是那一個國？原文既沒有明白記載，自難分別出來。就慣例講，本應認這是自後漢起至魏止屢來朝貢的倭奴國或倭國（即邪馬台國），和通典東夷上，通志東夷傳，文獻通考四裔考，及日文最新世界年表（大正十五年第十版）等書所載的一樣；不過就晉書異樣的書法看，這大概不是邪馬台國而是狗奴國。這要分兩方面來說。

第一，向來奉獻的總是稱爲倭奴國，倭國或倭面土國，只有魏正始元年正月納貢的稱爲東倭，這一次來貢的稱爲倭人；也只有這兩次用「重譯」字樣，表示他們的來很費周折，不是一樁容易的事，也不似常有往來的。我們對於正始元年的一次既有比較堅強的理由，斷定爲狗奴國，而這一次的書法與那一次又復相同，所以我們不能不作出同樣的結論。

但人們也許以爲這是望文生義，完全靠不住；如以倭國和倭人去作兩個對敵國家的分別，然魏志東夷傳關於倭的紀事，滿紙是倭或倭國，而劈頭一句卻爲「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見同書三十卷十頁）這又怎樣講呢？

我們的史家的書法本來是不大嚴正的，試看他們有時書作倭奴國，有時書作倭國，有時又書作倭面土國，就是一個顯例。如果說他們的心目中有個什麼明確的標準，一定要把邪馬台國一系的國家書作倭奴國或倭國，把狗奴國一系的國家書作東倭或倭人，那是絕對不會有的。不過他們如果知道當時奉獻的國家與向來的不同，

（雖則同稱爲倭國或倭人）在下意識上要弄點花頭以示區別，也並非不可能的事。兩相比較，終不能不令我們發生這種感想。況且我們作此主張，還另有一種理由。

第二，上面所說的女王國在魏時既屢來朝獻，晉武帝時納貢的也應當是牠，爲什麼反首先把牠除外？我們已經說過，單從書法上看，不像是指牠。牠大概從魏嘉平三年起「數至」之後，沒有獲得中國或帶方必要的援助，故於失望之餘，不再來了。

然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一點。據白柳秀湖說：

「邪馬台國雖這樣繼續存在至垂仁天皇的晚年，但一方受狗奴國激烈的壓迫，同時又因垂仁天皇的經營韓國而滅亡了。」（見白柳秀湖二千六百年史八九一頁）

依照我們從前的假定，崇神元年應爲紀元二二七年，（參看第二章七項第五目）末年爲二五八年，垂仁天皇在位也以二十九年計算，應爲紀元二五九至二八七年。

武帝泰始二年爲紀元二六六年，雖止當垂仁之世，還不算他的晚年。然白柳秀湖又說，女王壹與送張政還帶方，是「崇神天皇晚年的事」。（見二千六百年史八九一頁）此事的出現爲魏正始八年，即紀元二四七年，可見崇神的末年，還應略向前推一下。因此可以斷定二六六年納貢的不是邪馬台國；牠當時已被滅亡，否則至少也瀕於滅亡，無心——甚至於也無力——再向愛莫能助的中國奉獻。

我們綜合這兩方面的探討，認武帝朝來獻方物的倭人是狗奴國，不是邪馬台國，大概沒有什麼錯誤了。

(2) 倭人曾否參加晉書所謂東夷諸國朝獻的問題

當西晉時，倭人的奉獻見諸明文的，只有上面一次。這是什麼緣故？木宮泰彥解釋道：

「此無非朝鮮半島之形勢一變，塞斷倭國與中國之交通路；又因倭國歸大

和朝廷統轄之故。蓋第三世紀之末，鮮卑新起於遼西，使晉室與朝鮮半島領土之樂浪，帶方，斷絕連絡。於是出自鴨綠江谿谷之貊人併吞樂浪郡，復侵略帶方郡北部，而建設高句麗。馬韓中之百濟統一馬韓之地，復占帶方郡南部。而漢人在半島之勢力，掃地無餘矣。辰韓之新羅亦統一辰韓之地。於是半島中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足而立。此爲第四世紀之初之事。」（見中日交通史萬有文庫本第一冊三十頁）

這段話對於秦始皇以後倭國朝獻之事不復見於中國史籍的解釋，是對的，但同時又是不對的。對的地方在牠能說明西晉末的情形，不對的地方在牠不能解釋西晉初的狀況。因爲當西晉最初三十年，至少當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紀元二六五至二八九年）既是比較平靜的，而倭人經過朝鮮半島與晉交通的道路，又沒有被截斷，且九州的兩個主要國家之一既已於秦始皇初入貢，律以魏時那樣密切的交通，自不應僅止一次。然把晉書東夷傳關於倭人的記載翻開一看，只有三百六十八個字，而涉

及晉代的，不過上面所介紹的九個大字！再翻晉書的帝紀，也只有秦始皇二年的一次，即東夷傳中所說的一回事。這樣長久的時期中，雙方的交通並無障礙，偏偏只有一次，這是一個謎。木宮泰彥不獨未曾解釋這個謎，並且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個謎，所以他上面一段話便那麼大模大樣地跑過了。

但我們翻一翻晉書，發見許多材料足以幫助解決這個謎，並且恰恰集中在武帝時代，這也不是一樁偶然的事。例如

- 一、咸甯「四年……三月，……東夷六國來獻。」（見晉書三卷武帝紀七至八頁）
- 二、太康元年「七月，……東夷二十國朝獻。」（見同書同卷九頁）
- 三、太康二年「三月，……東夷五國朝獻。」（見同書同卷同頁）
- 四、太康十年，「東夷絕遠三十餘國……來獻。」（見同書同卷十一頁）
- 五、太熙元年「二月，……東夷七國朝貢。」（見同書同卷同頁）

此外，如「東夷二十九國歸化，獻其方物」，「東夷十七國內附」之類還多着，因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之內，故不備錄。然單就上列的材料看，所謂「東夷六國」，「二十國」，「五國」，「三十餘國」，「七國」，究竟是那些國？我們以為這是一筆糊塗賬，沒有法子算清楚的。據晉書四夷傳說：

「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見同書九七卷一百）

而東夷傳所列的國共有十五，即：

夫餘國	馬韓	辰韓	肅慎氏	倭人	裨離國	養雲國
寇莫汗國	一羣國	牟奴國	模盧國	末利國	蒲都國	繩余國
沙樓國						

可是不獨「東夷絕遠三十餘國……來獻」，已經超過四夷傳所謂四夷入貢的總數，即「東夷二十國朝獻」也已經超過東夷傳所列的東夷總數了。這樣一來，使我們完全墮入「五里霧」中，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那是些什麼國？裨離等十國不見於

魏志東夷傳，是新出現的，而『東夷絕遠三十餘國』也是新出現的，自無疑義。然單知道這一點，並不能解決問題。不獨不能解決問題，這簡直又是一個謎，以謎來解謎，寧有希望？

再查武帝紀，不獨秦始皇二年倭人來獻方物，大書特書，即咸寧五年十二月『肅慎來獻楛矢石罽』，（見晉書三卷第八頁）也是如此。此外，對於西南北各夷的來獻，有籠統書出的，如太康十年『西南夷二十餘國來獻』（見同書同卷第十一頁）是，也有個別書出的，如太康八年『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國各遣使來獻』（見同書同卷十頁）是。我們能不能從這樣的書法中發見一條規則？就是：凡重要的國家，換句話來說，凡在晉書四夷傳佔有地位的國家，如來獻，即個別地書出，凡不重要的國家，換句話來說，凡在晉書四夷傳未嘗佔有地位的國家，如來獻，即籠統地書出。但不幸地很，晉書中並沒有這樣的一條規則。例如東夷傳中關於馬韓一節敘述道：

『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甯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見晉書九七卷二頁）

這裏的敘述是紛亂的：咸甯本在太康之前，竟被扯到太熙之後，我們把這一段話去和武帝紀對比，咸甯三年沒有馬韓來朝的事，只有『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千餘輩各帥種人部落內附』（見同書三卷第七頁）一則，不見得和牠有關係。四年沒有對牠作單獨的記載，只有關於東夷來獻籠統的紀事，已見上文。此外，如太康年間和太熙元年都沒有特別提及牠，僅有關於東夷朝獻一般的敘述，已介紹如上。又這裏所說的太康「七年八年……又頻至」的話，武帝紀中找不着東夷朝貢的記載，七年只有『東夷十一國內附』（見同書同卷十頁）的明文，八年也只有『東夷二國內附』（見同書同卷同頁）的明文。這樣看來，凡在東夷傳中特別提及的東夷，在帝紀中也一樣籠統敘出，並不單獨記載的。

我們根據晉書武帝紀對於馬韓來獻籠統書在東夷幾國來獻裏面的例子，可以推知上列五項的東夷幾國朝獻，說不定有日本羣島的國家在內。當武帝時，晉書大書特書東夷若干國內附的，共有七次，歸化的共有三次，並且至多二十九國，十七國或十一國不等。這真是一種特別的現象，也是一種特別的書法。關於內附和歸化的國家，我們應向東北方去搜求（如裨離國之類），但朝獻的國家不見得也都在那一方面，所以在東夷傳個別列出的國家少而武帝紀籠統書出的國家多這種矛盾的狀況之下，我們認當時日本的某些國家至少在朝獻一項佔有一份子，不算是一種鹵莽滅的主張。不過這並不是說每次都有牠們的分，在那五次中也許牠們只來過一二次。總之，我們對於日本國家的參加朝獻一事，是傾於肯定而不願予以否定，這是一個主要之點。

我們的主張將來也許因新的材料的發見而予以證明，也許永遠得不到證明，但無論如何，牠的真實性是相當大的。牠雖不能據作確切的史實，然應能引起人們的

注意，並使大家知道，因史家一時的疏忽，以致許多本來應該明顯的史實都模糊起來，無從辨認了。

(五) 倭人朝獻的原因

(1) 一般的

凡一個文化低的部落或國家對一個文化高的國家朝貢，總不從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諸種原因；有時是由於其中的一種，有時是兼有其中的二種，三種以至四種。並且因這種文化低的部落或國家進化的程度以及當時所處的局勢不同，而其所表現的原因也前後參差互異，決不老是由於這一種或那一種，長久沒有變化的。我們現在要說明這個階段的倭人朝獻的原因，並不虛懸這種格式去加以歸納，而是分作一般的與特別的兩類，似乎更為便利而切實。試先談前者。

「契丹國……真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顯祖時使莫弗紇何辰奉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見魏書一〇〇卷契丹傳五頁）

這裏雖只是描寫契丹國和東北羣狄奉獻魏室的後果與前因，而建設北魏的拓跋氏雖屬於鮮卑族，不足以代表漢族的明文，但牠多少染了一點華風，這段話也把四裔最初向中國朝獻一般的原因概括說明出來了。

一國文化具體的表現，最容易爲人所感覺到的，是牠的物質的精製品，這是文化較低的部落或國家所欣羨與要求的。取得這一類物品最安全妥當的方法是交易，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所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集團的交通，除掉特殊的場所不計外，通常總是以交易爲媒介，而文化低的對文化高的，尤其是如此。我們在本章第一項所徵引的「通接商賈，漸交上國」一語，可以作爲一般的規則。因此，四

裔對中國的奉獻，通常是由於在交易中對中國先有一種粗淺的認識，然後來正式朝貢；而朝貢的目的也無非在鞏固或增進他們的交通，所謂「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正是此事的註腳。

日本與中國雖隔着大海，在航海術幼稚的古代，不容易發生經常的交通，然朝鮮半島却是雙方接觸的天然橋梁，所以雙方的交易也是以半島為集合地。日本西部在西漢末和南朝鮮地方從石器時代躍入鐵器時代，正是和漢代交通，輸入金屬器具與工具，並進而做造金屬器具與工具的結果。

倭人和漢代的交易，我們在本章第一項一目中已經大體說過了。他們藉交易的媒介，從中國獲得新的刺激，尤其是得輸入金屬工具去改造他們的生產，提高他們的生產力，因而增進財富，發生階級，形成一種原始的國家，遂踏入文明的領域。（漢族的移民對於這一點當然盡了更大的力量。）他們的部落或這種國家的奉獻，很顯明的是起于商業的交通，而其主要目的是在增進雙方的關係，藉以發展這種交

通。這是倭人奉獻的一般的原因。

(2) 特別的

(甲) 關於中國方面的

除掉上述一般的原因外，還有特別的原因，這可分爲兩方面來說，即中國方面和倭國方面。

在中國方面最重要的，自然是武力的懾服。漢武帝『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見後漢書一二〇卷鮮卑傳五頁）武功之盛，邁越前古。倭人與朝鮮半島早有往來，此時眼見半島的大部分爲武帝所征服，自然懷着幾分恐懼的念頭，要對漢室奉獻，表示服從，藉以達到自己的目的。范曄說，『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中日學者多加以否認，實則就當時『百蠻率服，款塞自至』（見前漢書七五卷夏侯勝傳二頁）的情形看來，此事不會是虛構的。然所

謂「三十許國」，在最初恐怕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國家，不過是一些部落罷了。

其次，光武時倭奴國奉貢的原因之一，也在於此。所以范曄說：

「王莽篡位，緬人寇邊，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震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緬，倭，韓，萬里朝獻。」（見後漢書一一五卷東夷傳一至二頁）

祭彤於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見後漢書五〇卷祭彤傳五頁）他因「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殺略吏人，遂利用鮮卑的震怖，示以財利，促其歲歲攻擊匈奴，使之衰弱，並令「擊破赤山，斬其魁帥。」「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見同書同頁）倭奴國雖沒有內附，然却是中國史籍上正

式記載的日本羣島前來奉獻的第一個國家，此事在中日關係上是十分重要的。

再其次，魏明帝時倭女王國的朝獻，也是以討平公孫淵一事爲其原因之一。此事我們在第四章四項第四目已經約略說過，現在還要提及的是，這一次統兵東征的大將爲司馬懿，他於朝鮮襄平外追斬公孫淵父子後，「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見晉書一卷宣帝紀五頁）這是魏室打破五十年來割據局面的一種有力的舉動，使中國中央政府的權力復直接達到朝鮮，所以倭女王卑彌呼也感覺到中國的威力，而有遣使朝貢之舉。

依據上述的事實，可以看出，自漢以來，中國的威力每次直接達到朝鮮半島，即間接達到日本羣島，而引起其間許多國家的奉獻。不過在另一方面，牠們的奉獻並不是每次都由於這種外來的衝擊，在牠們本身也自有其特別的原因。

（乙）關於倭國方面的

關於倭國方面的原因，因為史料的缺乏，不能作一種系統的敘述，只能根據中日歷史上的一鱗半爪，指出一二事實，以見一斑。

我們從魏志東夷傳所載倭女王卑彌呼於正始八年遣使詣帶方郡，伸訴與狗奴國王卑彌呼「素不和」及「相攻擊狀」，可以推知她的兩次來獻，是含有遠交近攻，或藉上國的聲威以自衛的意味。迨壹與繼立，奉獻之忱，有加無已，而司馬師作相後「又數至」，其原因不出求援自固，尤為顯明。

在另一方面，我們曾經推定魏正始元年重譯納貢的東倭是與邪馬台國對立的狗奴國，牠似乎是取攻勢的，尤有遠交的 necessity。這個狗奴國即熊襲，白柳秀湖說：

「熊襲位於邪馬台國的南方，在日向，大隅，肥後之間，屢與支那及朝鮮交通，而吸收其文明，經過七百餘年，可以說蓄積了對抗日本民族的實力。」

（見白柳秀湖二千六百年史八九二頁）

這個和邪馬台國及日本民族對抗的熊襲既「屢與支那……交通」，朝獻之事自

然不會沒有的，而其目的之一在獲得聲援，藉以侵略或抵抗鄰國，也毫無疑義。

像這樣的例子，一直至西晉時爲止，雖不大遇見，然在南朝時代便多起來了，因不在本章範圍之內，留在下面再說。

(六) 倭人在各方面發展狀況的一斑

(1) 一般的狀況

我們從第二章八項知道，當倭人未與漢代交通之時，還在野蠻時代，要與漢族密切接觸，才開始大飛躍，次第踏入明文的領域。據後漢書說：倭國

『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
暄，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鶻；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
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

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粉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躡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下，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遺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其殺之。」（見後漢書一一五卷東夷傳五至六頁）

這一大段話表見後漢時代倭人在國家與社會各方面一般的狀況，我們當擇其中最重要的各點，參照魏志和其他史籍，分類敘述於下，以清眉目。

(2) 農工業初步的興盛

後漢書稱倭國「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織布，」魏志則說牠「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縑絲，」而於兩個女王納貢時，更舉出各種精製品的名目，如「班布」，「倭錦，絳青縑，絳衣，帛布」以及「異文雜錦」是。可見漢魏時代倭國的農工業已有相當的發展，在魏時更呈出興盛而進步的形態來。

不過自漢至魏，國內尚無牛馬，這對於農耕方面有極大的影響，農業生產力的微小，也可想而知。所以牠的農業以至工業的興盛只是初步的，已無可疑了。

當漢以前，倭人還在石器時代，一到漢魏時代即有這樣的農工業，自然是直接受了中國的影響。然依我們的判斷，當時的工業實較農業爲發達，因爲從中國或朝鮮輸入工業技術和技術人員比較容易，所以牠的麻製品和絲製品，種類相當地複雜，至於農業方面，以牛馬難於渡海，不能提高生產力，發展當然較爲遲緩，而種類也較爲簡單。

(3) 漁業的發達

倭人以鯨而文身見稱，這種習慣是從漁業的生產中發展出來的，關於這一點，魏志說得很明白：

「夏后少康之子封于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沉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見同書三十卷十頁）

倭人烏居，自然多以捕魚爲業，不過魏志既言「倭水人好沉沒捕魚蛤」，又說，「好捕魚鮫，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見同書同頁）於是晉書倭人傳，隋書倭國傳，和北史倭國傳等等均以「好沉沒取魚」，「沒水捕魚」爲言，好像他們只有這一種唯一的方法。其實不然。當後漢末，鮮卑大人檀石槐

「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見後漢

書一〇卷鮮卑傳六頁

日本學者對於這件事有認為不可能而加以否定的，但提不出證據。其實後漢書這樣言之鑿鑿，決非憑空捏造。賴有這段史實，才把倭人漁業發達的真相，表現於世，否則在唐以前，他們老是用「沒水捕魚」的原始方法，是他們的主要產業之一，反不能與其他各業的發展並駕齊驅，未免太不相稱了！

(4) 商業的進展

世人每以後漢書的東夷傳全與魏志東夷傳雷同相誑病，但細心研究一下，魏志所紀，有全爲後書所無的，關於漢魏之際倭國商業狀況的描寫，就是一個顯例：

「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見魏志三十卷十一頁）

「國國有市」，足證商業的發達，又有監督機關，可見組織也頗嚴密。並且當時的商業不僅是倭國內的，而且是國際的，例如

「對馬國……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大國「大」爲「支」之誤」……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見同書同卷十頁）

從這兩個國往南固然仍是倭國，但往北，却到朝鮮半島了，所以這是一種國際貿易。這種貿易自然不限於糧食，其他物品也在交換之列，而製造生產工具和器具所必需的鐵實居其一，如弁辰。

「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見同書同卷同頁）

此事且不始於魏時，後漢書對於弁辰即已說過「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見後漢書一一五卷五頁）的話，可見由來已久了。

(5) 治亂相尋的政局

我們現在再來考察倭國的政治狀況。關於兩漢時代的倭國政情因史料的缺乏，

不能作一種系統的敘述，不過據後漢書說：

「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見同書一一五卷六頁）

而魏志則以爲

「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往之誤』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見同書三十卷十一頁）

據此，後書魏志對於倭國亂及卑彌呼立的時期相差約二十年。怎樣見得呢？宋本太平御覽七八二卷所引的魏志，不是「住七八十年」而是「靈帝光和中」，「查光和中元年距靈帝即位已經十年，光和的年代爲六年，故「光和中」與「桓靈間」相較，應有二十年上下的距離。這兩種說法到底那一種對呢？我們以爲魏志是對的。

隋書倭國傳，通典東夷傳上，和文獻通考四裔考一雖也作「桓靈之間」「桓靈間」，然梁書東夷傳，北史倭國傳，魏志四夷傳都是「漢靈帝光和中」，「靈帝光

和中』，按卑彌呼約死於魏正始八年（紀元二四七年），她既『能以妖惑衆』，立時當在二十歲以上，從正始八年回溯到光和元年（紀元一七八年），已是六十九年，即至光和末年，也有六十四年，再加入她即位前的歲數，她死時在八十歲以上，若依後書計算，當在百歲以上，自當以最先記錄的魏志爲正確可靠。

卑彌呼立的年限既經訂正，現在當進而談她的政績。一直要到她的時代，我們對於倭國才有一種比較明白的認識。她的國家在各方面都表現良好的現象，如

『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見魏志三十卷一百一）

『自女王國』等語以上的說法也許是指她以前的狀況，然自她即位後，權力增高，是十分顯明的事。前後漢書都說倭人分爲『百餘國』，至魏志則改稱『舊百餘

國」，可見強吞弱，大併小，已經消滅了好些，女王所統治的三十國曾吞併過許多國家或部落，是沒有疑義的。這些國家都受她的節制，而達到「畏憚」的程度，這足以證明倭國在她的治下統一的趨勢，與她所具的巨大的權威，因為她和我們的古代帝王一樣，是集政教於一身的。

然自她死後，因繼立問題又發生變亂，更相誅殺至千餘人。及壹與以一幼女繼承王位，才力經驗自然不及她，而所遇強鄰的壓迫，却有加無已，似乎只有一種悲慘的結局，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一章還要說到的。

(6) 等級森嚴的社會

當卑彌呼時代，一切方面都呈着空前的進步，所以社會的秩序比較良好，而閩與階級的界限也愈趨嚴格：

「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淺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

之恭敬。」（見魏志三十卷十一頁）

像這樣的事，我們在後漢書東夷傳中還沒有看見過，這一點又足以證明范曄的敘述相當地忠實，並不是一味抄襲他人現成品的。

（7）對朝鮮半島南端的經營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卑彌呼所統治的國不僅在日本羣島，內中有一個實位於朝鮮半島的南端，所以魏志說：

「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見同書三十卷十頁）

所謂郡就是帶方，而狗邪韓國則爲加羅，即現今的金海，所以同書又說：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見同書同卷八頁）

或和牠描寫弁辰時所說的一樣：

「其濟盧國與倭接界。」（見同書同卷十頁）

然倭國佔據朝鮮半島南端的一隅，還不自卑彌呼始，試看後漢書說：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見同書一一五卷五頁）

所謂拘邪韓國，不用說就是狗邪韓國。魏志說到邪馬臺國，馬上表明為「女王之所都」，後書却稱大倭王居此，即女王以前的王也建都於此，當時已據有狗邪韓國，可見倭人建國不久，即已侵入朝鮮半島。這個不幸的半島似乎是註定了要在一個歷史時期中變成中日兩國的殖民地。

（8）中國文化的影響

「中國乃東洋文化之母國，而有統一之國家組織者也；洛陽又以數千年文化為背景之莊麗都城也，倭人來至中國，目視其情形，必齎注若干新智識，而

對中國文化作熱烈之欽慕。極思於政治方面亦如中國有統一國家組織；於經濟方面，亦思如漢人有燦爛如花之生活也。」（見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萬有文庫本第一冊二三至二四頁）

的確，倭國自卑彌呼即位後，在政治，經濟方面都有充足的進步，恰如上面各目所述，這不能不認為牠與魏室交通頻繁，輸入中國文化的結果。

然中國文化對倭國的影響，在主持政教的卑彌呼本身上也表現得最為顯明而充分。例如她「以婢千人自侍，……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見魏志三十卷十一頁）木宮泰彥也明白承認為：

「殆亦由中國文化之所刺戟者。」（見中日交通史第一冊二四頁）

又如卑彌呼死後，「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見魏志三十卷十二頁）木宮氏對於此舉評論道：

「考九州地方當西歷紀元前後，無營墳邱者；當時只有考古學者之所謂甕

棺（屬彌生式系統之無袖大甕，以口部相合而爲棺。）與組製式石棺，（數石板並立，作長方形之區劃，上部以平石覆之。）埋於土中耳。而卑彌呼時代乃營徑百餘步之大墳，其與中國文化之關係爲如何乎！」（見中日交通史第一冊二四至二五頁）

由以上的例子看來，「東洋文化之母國」對於日本初期國家的發育，具盡了怎樣的撫育提攜的責任。

（七） 結論

自西漢初至西晉末，歷時五百二十二年，（紀元前一〇六至紀元三一六年）在中日交通上，是一個極重要的時代。一因這種交通雖由來已久，但有實物與文獻足資證明的，實起於西漢，這是雙方正式交通與密切接觸的開端，自然非同尋常的時代。二因日本羣島的西部由此輸入中國高度的文化，極迅速地由石器時代一躍而入

鐵器時代；倘若當時沒有這種交通，讓西部日本自然演進，那麼，牠要達到鐵器時代，至少要遲若干世紀，所以此事的重要，更是無與比倫。

我們所謂交通，自然不限於商賈的往來和使節的朝貢，而漢族——尤其是秦人系——的移民大批地達到日本，更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否則單靠前兩者為媒介，是很難在短時期內發生決切作用的。

本章對於這種交通的表現，因為材料的缺乏，自然是掛一漏萬。關於移民一項，在第二章四項第五目已經說過，當然不再提及。至於商業上的交通，除稻葉君山那一類的說法外，目前也沒有特別的材料。本章說得最多的是關於國家方面的交通，而可以具體指證的，也不過

後漢時

二次

魏時

四次

西晉時

一次

現在姑除去前漢不計，自後漢初至西晉末，共有二九二年，（紀元二五至三一六年）倭人來中國朝貢僅七次，平均為每隔四十二年弱來一次，內中有一次（即新女王壹與奉獻的一次）且僅至帶方。像這樣的交通真正不能算是密切的。不過我們在前面的已經說過，史籍所紀，實有漏落的地方，現在對於這一點，還須綜合說一下。

就前漢書，後漢書，魏志和晉書四史看，對於倭人寫得最詳盡的，首推魏志，次為後漢書，次為晉書，而前漢書反居末位。驟然看來，不免覺得奇怪，實則都是有原因的。當前漢時，倭人雖「以歲時來獻見」，甚至於達到「三十許國」，但因他們的文化程度甚低，根本引不起史官的注意，故班固於後漢初作史，對於他們僅描寫一二句。後漢緊接前漢而來，倭人的情況大概還沒有什麼大異於前，足以引起史官深刻的印象，替他們留下紀錄；因此，范曄於劉宋時作後漢書，也只能寫出他們兩次重大事件和一般的情形。到了魏時，倭女王國既呈空前的發展，並來朝獻，

而魏人 魚豢又草有魏略，已予以注意，以當時的人記當時的事，自然親切而詳盡。（不過魏略事止明帝）陳壽於西晉初作三國志，關於倭人的描寫多取材於魏略，計比後漢書同類描寫多三倍弱，比晉書多五倍強，比前漢書則幾多一百倍！然就是魏志，不獨對於牠自己所明示的『今使譯所通三十國』，沒有個別的記載，即對於重譯納貢的東倭（狗奴國），甚至對於牠曾用全力描寫的女王國於魏末使者『數至』的事實，也都沒有敘述出來。一部對倭人紀錄最詳盡的史書尚且如此，其他本來不注意他們來朝的史書，更可想而知了。然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本章所敘的史實，只是中日交通中的一些例子，決非其全體；要懂得這一點，才能夠了解這個時期雙方交通的真相。

末了，還有一點要說的是，普通談中日關係的書總是依中國朝代的順序，分成若干期，加以描寫。本書自然也不能例外，不過仍有不同的地方：如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以漢，魏為一期，以兩晉和南朝為一期，而本書則以漢，魏，西晉為第一

期。這樣分期的原因將在下面一章加以說明，這裏簡單說一句，就是：在這個時期中，是以九州爲中心的國家與中國交通，從東晉起，是以大和（在本州）爲中心的國家與中國交通，我們注重這一大區別，所以把西晉緊接在漢魏的下面，而不讓牠與南朝聯繫在一起。

這樣的劃分不獨絲毫沒有勉強之處，並且於同一時期中發見雙方一種共同的趨勢。卽自漢至西晉，中國是由極盛而趨於式微，致爲北方的外族所憑凌；日本九州方面的倭人則由野蠻而躍入文明的領域，欣欣向榮，終趨於衰弱，爲東方的外族所毀滅，專就這一點看，雙方的命運是有幾分相同的。

第六章 漢魏西晉時代的中日交通

643.1

4420

0531679

單位：總圖書館 CP

來源：李學智教授贈

日期：98.02.2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0531679